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03-04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推进 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基本经验

——基于阶级阶层关系处理的视角

宋小红^{1,2}

(1.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2.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在不同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创造性地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政治参与、思想文化关系, 不断增进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同, 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大众的革命热情, 促使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从而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总结并发展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各阶层共识、加速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 民主革命时期; 阶级阶层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 D231; A71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1

民主革命时期, 面对强大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必须统一革命思想和认识, 争取、团结革命力量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著里,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状况作了深入分析。根据实际, 科学分析、认识、把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矛盾变化、发展状况, 是正确处理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前提。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彼此之间的关系方面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本文拟从物质利益、政治民主、思想文化三方面加以梳理, 以期为我们当前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

一、立足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多样、利益差别、利益矛盾的实际, 注重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 满足革命群众的利益需要, 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物质基础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马克思主义只有赢得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认知、认同, 才能转化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人是现实的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利益, 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利益。“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 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热烈地拥护我们”^{[3](P137)}。民主革命时期, 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复杂多样、差别较大、矛盾突出, 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工人阶

[收稿日期] 2015-01-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710043)

[作者简介] 宋小红(1976—), 男, 贵州省遵义市人, 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在各阶级阶层中的认同,是进行革命的关键。

一方面,正确处理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经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根据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矛盾变化、发展,处理好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捍卫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革命最根本的出发点,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4]。为了协调好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领导阶级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5],让各阶级阶层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让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号召并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另一方面,正确对待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土地革命时期,为促进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中共中央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革命路线。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余人。在中央苏区,逐步消灭地主阶级让农民获得土地,强化农业生产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开展粮油调剂、合作等农业互助运动,兴修水利和改善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根本上维护、发展了苏区民众的利益,增进了革命团结,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众的信任。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要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3](P119)}。1935年,中共中央依据革命发展和需要,决定不没收富农的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减租减税。这从根本上协调、维护了富农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了其对革命路线、方针的认可,促成了革命抗日联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策,着实减轻革命群众的负担,有效处理了边区革命大众的利益矛盾,激发了大众抗日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将

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解决了解放区三分之二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应地,没收官僚资本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这些政策从总体上维护和发展了革命阶级阶层的利益,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全国获得了解放。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利益是产生革命精神的经济根源,是发扬革命精神的物质基础。只要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满足大众的利益需要,就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就会受到大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及党的廉政建设,保障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益,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政治基础

其一,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并带领各阶级阶层不断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推进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同。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思想性、严谨的组织性、彻底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1925年,中共四大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及其革命领导权问题,而革命武装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坚强支柱,三湾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组织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应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参与革命,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经过土地革命,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其革命觉悟和组织性大大提高,他们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参军参战。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因此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极为重要。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其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是我们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在与之建立革命联合中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中间势力在中国共产党同顽固派斗争时往往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中国共产党注重争取中间势力,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

派等,以扩大革命联合。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对各革命阶级阶层的领导,形成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革命的认同。

其二,注重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以推进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激发了大众的革命热情。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苏维埃都给予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政治参与更加广泛。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边区实现“三三制”的政治参与。从阶级阶层身份看,“三三制”包括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其他小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其中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三三制”保障了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利,为其政治民主诉求提供了制度平台,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华北及东北建立了以大行政区为主的人民民主政府,参与民主管理的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及海外华侨。同时,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和政府的各项监督制度,保障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民主。在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注重新闻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如当时的报刊《斗争》《红星》等,对党政干部的行为作风进行了有力监督。1947年11月,朱德在同冀中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监督、教育所有人员好好工作”^[7]。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人民监督委员会,加强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有利的民主监督,保障了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权益,增进了革命团结。

其三,注重党的反腐倡廉,使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和维护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权益,促进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革命路线的认同。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加强了反官僚、反贪污腐化等,纯洁了革命队伍。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4条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8]1941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

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9]这表明边区政府和执法机关要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从而大大提高了边区政府在大众中的威望。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明确规定:“降低干部生活水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11](P740)};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无产阶级政党反腐倡廉的立场和决心。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反腐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施行,获得了大众的赞誉和认可。

三、针对不同的客体层次,运用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加强对革命阶级阶层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思想基础

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通过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以争取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团结,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努力夺取革命的全面胜利。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和众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封建意识、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不时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队伍中。这些思想极易带来党内“左”、右倾的错误,妨碍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针对这种现状,中共中央提出把革命思想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第一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涉及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群体、个体,他们的经济状况、革命态度、思想文化、接受能力等不尽相同,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中共中央针对不同的客体层次灵活地采用多样的教育方式、手段,以促进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认同。

针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状况,列宁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1]。工人阶级的觉悟高、革命性强,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对话和说服的方法进行,以理服人。农民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农

民长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劳作、生活,其思想文化素质不高,封建意识浓厚。对农民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须与劳动相结合,利用农民空闲时间,采取开办扫盲班、夜校、民众教育馆等多种形式,并以一定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革命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引导群众以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型事例为题裁,创作新秧歌、新社火。如陕甘宁边区到处都有秧歌队,每到春节拥政拥军、爱民运动时,各地的秧歌队都大规模涌现在集镇、农村,群众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建设和军队发展,歌唱新生活,也教育和改造了群众自己。立足各时期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针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富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进行了革命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活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对敌军展开思想意识攻势,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影响着革命的发展,对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并就敌军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战场上,采取火线上喊话和发动白区群众特别是白军家属的形式,或派人打入敌军内部,向敌军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对作战之敌作全面、深入考察,针对敌军的历史背景、官兵的现实矛盾,广大士兵的思想情绪和痛苦的生活状况,用歌谣、民谣等多种形式瓦解敌军官兵士气,使其怠战、厌战、罢战。

依据不同的客体层次,采取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途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能以最有效的途径、方式贯彻到各阶级阶层中去,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增进了对党和革命的认同。

四、结语

民主革命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采取不同的策略处理社会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政治参与、思想文化关系,不断增进大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认同,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大众的革命热情,从而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总结其历史经验并在新的实

践中对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各阶层共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涌现了诸如社会管理者、职业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时,也要注意吸收和接纳新兴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成员入党,通过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注重自身反腐倡廉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努力建设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凝聚各阶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共识,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激发人民的壮志豪情,使之积极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才能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34.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73.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 [7] 朱德.朱德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9.
- [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年)[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317.
-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年)[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642.
-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年)[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740.
- [11] 列宁.怎么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07-06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

——基于青海省高等学校的调研

崔耀鹏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和法学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不仅关乎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与成才,而且关乎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对青海省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总体呈现积极、健康与向上的现状,多数能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但马克思主义信仰意识不足,且在不同大学生群体中呈现出差异性,信仰缺失、迷失、功利化、空泛化、宗教化明显,这既有大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也与青海省特殊省情和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有关。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应当从四个方面着手:理顺机制、明确分工,建设一支政治正确、信仰崇高、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队伍;理解内涵、把握本质,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论;科学探索、因地制宜,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特性;提高认识、积极行动,营造一个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和确立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信仰民族化;信仰宗教化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2

当代大学生能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关乎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与成才,关乎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加强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针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泛泛而论,缺乏实证研究。本文拟在对青海省在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

1. 调查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青海省部分高校在校本科大学生,具体为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

学的在校大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40份,回收有效问卷33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1%。调查问卷共包含16项内容,涉及信仰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价值的认识等不同类别的问题。

2. 调查结果分析

其一,多数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但马克思主义信仰意识不足。首先,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被调查对象中,有76.7%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其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78.8%的大学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其次,大多数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当问到“您对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2020年全面建成

[收稿日期] 2015-01-03

[作者简介] 崔耀鹏(1987—),男,河北省平山县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小康社会是否有信心”时,回答“信心很大”和“有信心”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82.4%。最后,大多数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充满信心。被调查对象中,有85.8%的大学生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有74.9%的大学生认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青海省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总体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状况,但在问及“您的信仰是什么”时只有33.0%的大学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多数大学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一种科学信仰来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意识在当代大学生身上不够显现,也说明加强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在不同大学生群体身上呈现出差异性:一是党员大学生比非党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更多、认识更深、信仰更坚定。二是女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了解程度虽明显高于男大学生,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率略低于男大学生。三是理科大学生虽对社会主义未来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充满信心,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了解十分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存在一定盲目性;相对而言,文科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总体状况更加积极健康。四是外省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了解程度略高于本省大学生。这是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落后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反映。五是受到宗教情怀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远低于汉族大学生。

二、当代大学生信仰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1. 当代大学生信仰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总体上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信仰来看,存在着缺失、迷失、功利化、空范化等问题。

其一,信仰缺失。调查表明,一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归属感,缺乏树立信仰的认知基础。当被问及“您信仰什么”时,被调查对象中有7.6%的大学生表示“说不清楚,没有信仰”。不少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匮乏,缺乏树立信仰的理论基础。被调查对象中有33.9%的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大了解”和“不了解”。还有一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怀有负面情感,缺乏树立信仰的感情基础。调查显示,有11.5%的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说不清楚”,有23.3%的

大学生认为“喜忧参半,不十分明确”。

其二,信仰迷失。调查显示,青海省高校大学生中信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高达22.7%,认为自己没有信仰的占7.6%,选择其他的占7.7%。这意味着约40%的大学生在决定精神世界核心的信仰问题上没有做出合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不高,仅有17.6%的大学生表示“平时关注红色网站或阅读马列类书籍”。还有一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认知,高达48.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甚至有4.6%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其三,信仰功利化。调查发现,有85.6%的大学生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当问及“您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时,有23.9%的大学生选择了“为了评优、升学和从政”,其中,汉族大学生占24.7%,少数民族大学生占22.8%;有3.3%的大学生选择了“看到其他人入党,随大流”。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对青年大学生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大学生入党动机趋于功利性和世俗化,而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相比,汉族大学生入党的目的性更明显。

其四,信仰空泛化。调查显示,虽有78.8%的大学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是当问及“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有指导意义吗”时,仅有16.1%的大学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我学习和生活的指南,能帮助解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知仅限于理论层面,存在着理论与个人实际问题相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说,当代大学生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等社会主流信仰,虽然在理论上知晓要坚定理想信念、人生价值必须同社会需要相结合等,但在涉及具体问题和具体利益时,又往往患得患失,致使理论认识与实际行动相矛盾。

其五,信仰宗教化。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有很大部分是宗教信仰者,存在着信仰宗教化问题。调查显示,回族、蒙古族、藏族、土族大学生中信仰宗教的分别为69.7%、66.7%、54.4%、31.2%,青海省大学生中信仰宗教的比例高达22.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族大学生中仅有3.6%的信仰宗教。

2. 当代大学生信仰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在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大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也与青海省的特殊省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关。

其一,大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升学、评优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占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时间来加强专业课的学习或考取对就业有直接作用的各种证书。大学生兴趣点从宏观政治理论向现实就业领域转移,政治理论和专业课学习时间分配比例失衡,以及重视就业技能训练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导致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而人的头脑一旦丧失科学理论武装,就会被非科学思想甚至落后思想占领,当代大学生出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迷失等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在剧变的现代社会中,大学生既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也要处理新的问题和面对新的挑战。有些大学生由于在新情况下不能很好地处理和协调因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学业、交友、生活等方面遭受挫折后未能进行积极的心理调适,也未能主动及时向学校老师请求帮助,因而会转向宗教和神秘主义,以此来获得精神慰藉。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对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而对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宗教却很迷信的现象。

一些大学生缺乏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即使是学习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和评优,表现出较强的世俗性和功利性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被动性,不但不能使大学生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反而让他们产生厌恶和排斥心理,导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困难。虽然有些大学生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但也是重书本理论而轻实践锻炼。

其二,受青海省特殊省情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体格、思想等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青海地处西北内陆,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地域区隔,掣肘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发展,而干旱缺水、高寒缺氧、超高海拔等严酷恶劣的自然气候环境又导致各种宗教思想的滋生与发展。

青海省总面积的98%都属于自治区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多文化交融的民族省份,其总人口约半数均为少数民族。青海世居的少数民族,如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等,均有信仰宗教的文化传统,宗教的教义、教规、信条和戒律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人生态度、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青海省高等教育水平偏低也是影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机制不畅。从高校外部看,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关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有效工作机制,普遍认为大学只是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场所,信仰教育不那么重要;从高校内部看,各院系、各部门、各学科教师也没有形成共同关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有效工作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孤军奋战的局面没有改变,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环节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脱节的。二是教师水平不高。部分教师只注重讲授课本知识,忽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部分教师只注重课题研究,忽视育人实绩,缺乏真切关怀。三是教材针对性不够。使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教材,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性有余,而注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殊规律性不足。四是课程建设不力。虽然各高校都按要求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但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课程。近年来,青海省主要高校所开设的选修课上没有一门是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的。

其三,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从国内看,第一,虽然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但是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仍在继续冲淡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观念、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影响,物质利益成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和对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参考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而精神文化领域问题鲜见受到大学生们的广泛关注,信仰被搁置,理想被抛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日益泛滥。第二,社会价值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主流价值主导地位的挑战,使其不可避免地发生动摇和淡化。第三,腐败问题严重,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1]。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理应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但实际上确有一些人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导致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淡漠甚至丧失信心。

从国际上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国际大环

境之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一种空想的观念,而是一种与现实密切关联的信念。革命的挫折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很大冲击,而革命的胜利则会极大地推动人们确立对它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普遍化和大众化。^[2]另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处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它们利用其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传媒,极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强势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庸,这种国际环境对中国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三、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应从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队伍、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特性、营造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优良环境四个方面着手。

1. 理顺机制、明确分工,建设一支政治正确、信仰崇高、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队伍

应积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上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应牢牢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理想信念教育”这一德育工作的生命线,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彻底扭转回避社会现实的倾向,正视重大社会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帮助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和世界,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积极推进教学实践创新,尝试构建校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资源共享机制,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深化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的了解和认知,不断提高其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

其他专业学科教师尤其是文科类专业教师要改变重专业课教学、轻德育课教学的倾向,把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学与管理全过程,既要发挥榜样的重要作用,以本学科学术发展史上的先进人物育人,又要发挥示范作用,以自身日常教学和生活中的崇高道德行为规范育人,努力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专职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专职辅导员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贯穿于对学生服务与管理的全过程,树立利益是“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与解决大学生自身实际利益问题相结合,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帮助大学生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心理和择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理论魅力。

2. 理解内涵、把握本质,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论

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内涵。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对象与内容,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指对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科学理论学说的信仰,而且也包含对其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内容的信仰。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主要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其次,要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态度。信仰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初期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到如今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是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如今越来越富强的新中国,也是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人中的优秀群体,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但有利于个人成长成才,更是实现其人生价值和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当代大学生要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成果的信仰。

再次,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地位。信仰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解读,是一个属于精神领域的概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群体根据其所处的时代对信仰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仰是“拜物教”,穆斯林的信仰是万能的真主,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圣的耶稣,而肩负全人类解放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信仰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对宗教信仰的扬弃,它“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4],从而实现了人类信仰史上的伟大变革。一方面,它吸收了宗教信仰中的合理成分,如道德规范、净化心灵和满足人们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诉求等;另一方面,它又在信仰情感的健康性、信仰内容的科学性、信仰对象的真理性、社会作用的积极性和信仰方式的理性化等各个方面彻底扬弃并从根本上超越了宗教信仰。

3. 科学探索、因地制宜,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特性

地域性教材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载体。当前各高校普遍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类教材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但这种普遍性教材对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实效性不太理想。调查显示,有55.2%的大学生认为当前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在满足自身价值需求上有所欠缺。因此,应整合、统筹学术资源,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编写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思想政治理论教材,努力做到既兼顾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普遍性,又突出地域性和民族性,使之成为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有效载体。

个性化教学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方式。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瓶颈。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现状使其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在各方面都异于汉族大学生,因此,凸显其民族性成为必然。民族地区高校应当采取对汉族大学生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差异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方法与措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应通过设立民族班,把具有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行为习俗等共同特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集中起来,创新教学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民族文化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切入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生活习俗和伦理道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因此,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少数民族文化间的结合,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落地生根。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角度看,应发掘少数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相通之处,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文化向马克思主义信仰靠拢,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文化心理和情感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4. 提高认识、积极行动,营造一个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和确立的良好环境

首先,要营造一个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

和确立的网络环境。互联网是当代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是他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新窗口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它不但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交往习惯。优良有序的网络环境有利于正能量的传播,而混乱无序的网络环境则会极大地削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力。应充分认识互联网对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的良好机遇,加强和改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例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积极主动运用好网络技术,传播先进文化,了解社会问题,疏导舆论情绪;思政课教师、专职辅导员和班主任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在网络背景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现新规律,积极利用这一新兴媒介和环境同大学生进行双向信息交流,建立大学生思想状况信息汇集、处理、反馈机制,主动占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这一新阵地,提高信仰教育实效性;国家互联网监督管理部门应切实发挥好监督作用,加强网络监管,伸张公平正义,缓解网络戾气,净化网络环境,为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筑起一道“防火墙”。

其次,要营造一个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和确立的社会环境。社会观察是大学生形成正确思想意识和科学信仰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大学生虽长期生活在相对独立封闭的校园环境中,生活阅历与人生经验有限,但是其借助网络进行的主动或被动的社会观察则十分丰富。互联网对官员腐败、潜规则、封建迷信、伪科学等社会消极面的报道和迅速放大,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观察往往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因此,引导大学生理性、全面、深刻地认识社会消极面,对促进其健康成长发展意义重大。社会各界应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策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打破区域隔阂、高扬国家认同等新途径和新方式,切实抵制民族分裂、愚昧迷信、伪科学等不良社会思潮,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大学生要加强自身修炼,掌握“创造环境的工具”^[6]。打破并改造不良的社会环境重在大学生加强自身修炼,掌握创造环境的工具。一是判断的工具,即做到发展个性,详细研究实际问题,去除怀疑,摒弃诱惑,从而增强判断力。二是进取的工具,即做到勇往直前,防止半途而废,从而推陈出新。

三是负责的工具,即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尽自己的能力对社会做一点贡献,从而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四是朴实的工具,即做到朝气蓬勃、光明磊落,排除客气和虚荣心,胸怀坦荡、敢为人先。五是奋斗的工具,即克服环境的阻碍和压迫,增强毅力和决心,创造环境、战胜自己。六是牺牲的工具,即做到敢于吃亏、勇于奉献,树立主人翁意识,志存高远,为全人类谋幸福。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10-09(2).
- [2] 黄明理,陈悦.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94.
-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16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36.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7.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 [6]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 信仰——先驱的心声[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0.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本刊数字网络传播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网等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13-05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周良发, 舒从云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 安徽 淮南 232007)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胡适;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3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因东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交替而引起的文化论战可谓屡见不鲜,李泽厚先生曾专文谈到中国现代的三次学术论战^[1]。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或因未泛起太大的波澜而少为学界所道,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胡、梁二人间的东西文化之争乃是1923年中国学界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故大有辨析梳理之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批评应答,探讨二人在东西文化上的歧见,以期能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关于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需从新文化运动讲起。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史许多基本问题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问题也不例外^[1]。

胡适(1891—1962)比梁漱溟(1893—1988)年长两岁,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二人均受邀

进入该校任教。因胡适与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致学途程、学术旨趣、思想焦点等迥然有别,故初到北京大学时二人并未交友。1916年11月,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吹响了近代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号角。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旋即席卷全国。年仅26岁的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当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独步于思想文化界时,梁漱溟尚属默默无闻之辈。但因受东西文化问题的困扰,梁漱溟一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一边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开始构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作为《孔家哲学》《唯识讲义》两书之引子。对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高举的民主与科学大旗,梁漱溟颇为赞赏。他说:“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陈独秀)先生所谓‘赛恩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胡适之先

[收稿日期] 2015-01-05

[作者简介] 周良发(1979—),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安徽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生所谓‘批评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2](P214)}因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2](P216)}。翻阅梁漱溟的理论著述可以发现，他曾十分娴熟地运用“理智”“本能”“直觉”等西方术语阐释东西文化问题。但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毕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必须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这个前提。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皆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其所领导的新文化派欲将传统文化连根拔除的态度激起了梁漱溟内心深处的卫道情结。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翌年8月，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界之邀在暑期讲演会上再次以该主题进行演讲，公开为儒家辩护。他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做孔家生活的缘故。”^{[2](P227)}同年10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头4年中一连印刷了8次，同时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3](P54)}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此外，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虽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通过其一系列著述发表了关于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的深刻见解，标志着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

梁漱溟研究之第一人、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将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袖吴稚晖、共产党人杨明斋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3](P126)}。因吴稚晖、杨明斋之论不关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这里着力呈现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学术批评的大体样貌，进而管窥二人在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分歧。

关于当时东西文化论战的概况，梁漱溟在1930年的《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序》中有过明确记载：“我与适之先生的论战只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乃在十二年春发表于《努力周刊》（原文如此，本名周报）相隔一年余。其后我又取适之先生批评我者，而作答论，则已是十二年冬间，相隔大半年矣。”^{[4](P198)}根据现有史料和梁漱溟自述，可知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战前后共有两次，且集中在半年之内。

1. 第一次交锋

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胡适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述提出过批评，所以后者自然要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次回击是该书出版两年后的1923年。之所以沉默了两年，胡适曾戏用梁漱溟的原话来这样解释：“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辩，辩也无益”^{[5](P186)}。1923年4月1日，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以为说明。一是梁漱溟在文化定位上“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4]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5](P184)}。他觉得如何界定文化原本就是很复杂的事情，决不是全凭主观臆断就能解决的。“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5](P184)}如是观之，胡适认为梁漱溟依据“拢统”的思维方式，只能“生出一条很拢统的‘文化哲学’”^{[5](P185)}。二是梁漱溟在文化分类上“拢统”。在采撷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梁漱溟首创了“意欲”概念，并根据意欲表现之异形成三种人生态度，且依此人生态度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类别：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持中调和的中国文化和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然而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5](P188)}其理由无疑很充分，因为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表面上一者向前、一者向后，事实上二者皆有向前、向后的情况。基于这种解读，胡适毫

不客气地认为梁漱溟“实在闭眼瞎说”^{[5](P189)}。

针对胡适措辞严厉的学术批判,梁漱溟初次应答没有细致道来,当日只有几句看似平和实则不满的答词:“顷奉手示,并《读书杂志》见教一文,敬诵悉。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海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漱溟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海;倘更辱评论其致误之由,而曲喻其所未达,则蒙益者,宁独一漱溟乎?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6](P727)}

或许是因第一次回应引起梁漱溟的某种误读,胡适次日即对梁氏答词的末句“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给予了解释。他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则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应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5](P198)}言下之意,何为轻薄何为刻薄?性情迥异之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梁漱溟何出此言?胡适思之再三,且复检原文,最后认定原因可能在“闭眼瞎说”处。对此,胡适作了相当细致的自我辩护。“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适颇近于玩世,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以凡事‘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5](P198)}学术争鸣亦如常人掐架,情感冲动往往在所难免,真实情况是否如胡适所言,我们不得而知,但胡适之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梁漱溟的不满情绪,后者隔日复书曰:“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6](P727)}胡适与梁漱溟的初次论战至此告一段落。

2. 第二次交锋

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并未就此黯然中歇。1923年10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胡适此前的批判一条一条地予以驳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何以消停半年之久硝烟再起?据梁漱溟自述,此次论战盖因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其误解甚深,而且胡适的傲慢态度着实刺痛了他,故不得不予以反驳。那究竟胡适说过什么话刺激了梁漱溟,致使后者作出用词严苛、程度激烈的驳斥?若要解开这个谜团,尚需我们重回历史场景,看看胡适到底是如何挑起事端的。

细细研读胡适所著《一年半的回顾》可以发现,胡文表达的是对当时政治时局的忧虑和关切,只在

文末谈到时人赞誉其政论文章的价值时才提及梁漱溟等人。他说,“其实我们的《努力周刊》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5](P397)},并深信《努力周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完全靠这些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对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作出两点解释:一是对于时人夸赞胡适的政治文章,胡氏本能地作出“自谦”的托辞;二是胡适内心深处确实对梁漱溟等人的保守主义立场不满,于是批判之言顺势而出。

然而对梁漱溟来说,胡言之意就是将其和张君劢视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革新的障碍。胡适还公开将梁漱溟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即文化保守主义阵营,这使梁漱溟深感受到了伤害。因此,梁漱溟随后在北大演讲的开头便说:“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6](P738)}一番自我澄清之后,梁漱溟进一步申论:“你们要领导着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是差不多的。”^{[6](P739)}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其与胡适的目标是一样的:实现中国成功转型,进而构建现代国家。

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们必须指出,梁漱溟与胡适等人有着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是公开承认的。他说:“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6](P739)}循着这种思路,梁漱溟对胡适半年前的文化批判作了辩解。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的反击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主要是抗议胡适等批评者没有认真阅读他的著作,自然难以洞察其著作之本义,于是说:“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了。……这种批评叫我如何答!”^{[6](P740)}

虽说不易作答,但梁漱溟还是按照胡适当初批判的思路进行了辩驳。一是关于胡适所谓“可惊异的”逻辑,梁漱溟认为东方化必于“连根拔去”与“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二者居其一。“连根拔去”是指东西文化并非处于对峙平衡的局面,而是西方文化已经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翻身成为世界文化”则是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得出的结论,认为西方文化之后必是东方文化的时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铁案如山,根据确凿,声光震烁耳目;适之

先生不是瞎子,难道看不见么?”梁漱溟进而追问胡适:“居然以‘这全凭主观的文化轮回说’诬人,是何用意?”^{[6](P744-745)}二是针对胡适所谓“拢统”的文化公式,梁漱溟认为自己得出三种文化乃源于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胡适自鸣得意的异议(如“中国人生活哲学中的‘安分知足’在西方文化中亦不鲜见”等)在梁漱溟看来十分可笑,梁漱溟并援引胡适恩师杜威的文化观进行了反驳:“夫我之所谓‘向前改造局面’,亦犹夫杜威之所谓‘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谓‘持中调和’‘随遇而安’亦犹夫杜威之所谓‘与自然融洽优游自得’也。”^{[6](P748)}即使将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分成三系,梁书原文也再三声明“本来不妥”,故认为胡适的批评“更无聊之极”。三是关于胡适批评的思路和方法,梁漱溟认为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梁漱溟指出,自己的文化分类是基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对此胡适不仅一字未驳,只顾说着客观原因的论调,还说不出所以然来。“这譬如我指出某人非甲,更证明其是乙;而胡先生既不驳我非甲的话,亦不驳我非乙的话,却只顾说‘这不过是甲’‘这无非是甲’,又说不出所以然的缘故来!”^{[6](P752)}我们不能否认梁漱溟的反驳存在若干偏执之处,但是公允地说,他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比如,胡适以不能找出一个普遍原则为由而不去考虑文化态度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梁漱溟对此颇感失望,故曰:“呜呼!先生休矣!这种文章作他干什么?”^{[6](P752)}

胡适的批评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不能因此说梁漱溟的著作没有矛盾或混乱之处。由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由演讲稿汇编而成,故前后重复、矛盾和费解之处并不乏见。但梁书的诸多问题被大多数批评家忽略了,对此艾恺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梁漱溟巧妙地使用了含糊其辞的手法,成功地掩盖了大部分矛盾。”^{[3](P94)}这种闪烁其辞的方法蒙蔽了很多批评者的眼睛,胡适由于行文匆匆也没有寻出书中的根本问题。还需指出,不是所有的批评者皆如胡适这般挑剔,相反有些人则毫无保留地予以赞扬,并成为梁漱溟的虔诚信徒,协助其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三、对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泛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

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固然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少年时代即赴美留学,多年浸润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深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弊,所以在回国途中便“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P363)},致力于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中国文艺复兴”事业,希冀完成把旧中国从蒙昧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道擎起新文化的大旗,以西方的新思想、新伦理、新观念替换传统的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

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没有留学经历,早年笃信佛学,后来回归儒家并重新肯定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在他看来,儒家学说不仅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柏格森、倭伊铿的生命哲学若合符节,而且通过吸纳西方文化能生出现代民主政治所需的伦理道理,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再创造,可找出其现代转换的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与探索仍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范式之内。

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疑虑始终是国人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与192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纷繁驳杂的情状相比,当代中国思想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表象之下,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西化思潮的博弈仍可谓暗潮汹涌。前者指责当代中国西化过度,担心被文化帝国主义所同化。在他们看来,目前我国学术思想大多囿于西学西语的模式之下,一谈现代文化,仍唯西学西语马首是瞻。盖因一味追慕欧美,思想文化构建过于倚重现代资源,并据此考量中国传统,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激烈而外在的评判。殊不知离开传统的现代化,犹如沙上之塔,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后者认为当前中国西化不足,靠批判文化民族主义以自娱自乐。他们认为,西学依然是中国学术原创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它构成了确保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正确学术道路的前提条件。即使是中学、即便是传统,也需依靠走在我们前头的西学来激活它与当代语境的回应性,来灌注生命力”^[7]。换句话说,国人还要

对西方文化保持更加虚心、更有耐心的学习态度。由此看来,在如何对待东西文化的问题上,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如既往地歧见纷呈,至今没有成功解决,或许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作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意味着今后很长时间内建设文化强国将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应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至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关系,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无法回避的课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已曲终人散,然其仍为今人审视中西文化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就此而言,重温百年前的东西文化之争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7.
- [2]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 [3] [美]艾恺.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4]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1)[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98.
- [5]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3)[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6)[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 [7] 朱国华. 漫长的革命: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J]. 天津社会科学,2014(3):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2-0018-04

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认同危机表征与重建

郑海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1)

[摘要]全球化语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西方文化强势输出,妨碍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双向的跨文化交流,使世界文化交流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从而强烈冲击了他国文化,严重影响了该国国民的文化认同。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干扰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认知和体认,造成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致使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信仰缺失、道德失范,价值和行为取向西化,经典文本阅读被消解。要重建中华文化认同,就应当着力培养国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倡导多元文化并存,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关系,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促进中华文化的新觉醒和再发现。

[关键词]文化认同;全球化;文化自觉;多元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及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更为频繁。从理论上讲,这理应形成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繁荣景观。但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西方文化强势输出,妨碍了各民族之间双向的跨文化交流,使世界文化交流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强烈冲击着他国文化,严重影响了他国国民的文化认同。在这一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不仅改变着中国国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还影响着中国国民对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认知,削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妨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其概念、意义和现实路径,对中华文化认同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拟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上归纳和总结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中国国民文化认同危机的具体表征,探寻其表象背后的根源与中国国民文化认同重建之

路,以期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抵制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强势渗透,保持本民族文化的活力并实现中华文化的反向传播,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及作用

关于文化认同的作用,美国学者亨廷顿^[1]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其意思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美国文化的根本或内核,如果美国人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可见,文化认同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何等重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岁月的淘洗而积淀形成的儒、道、释文化是中华民族认同最深层的文化基石,对其思想精华的认可,对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民族风俗的认同,对汉语语言文字的认同,以及对“龙”和“长城”等民族标志的认同,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即“我们都是中华儿

[收稿日期]2014-10-18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CYY017)

[作者简介]郑海霞(1975—),女,河南省周口市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文化。

女”。因此,概括来说,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皈依感和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承认,是建构自我文化属性的基石。民族文化认同体现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人们经历岁月的变迁和世事的变化,仍然留存的对本民族最深层的、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凝聚本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本民族能够抵御外来文化冲击而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是本民族个体在孤立无援时的精神支撑。对于民族乃至国家而言,“文化认同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2]。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而当下的世界政治文化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和物质上的绝对优势,使其文化大肆扩张,严重影响到现当代中国人对本民族优良文化的认同,造成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所以,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中华文化认同危机的表征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璀璨而深邃的中华文化,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的道法自然、崇俭抑奢,以及佛教的慈悲为怀、忍辱负重,在既相互诘难又相互补充的互动发展中深深地熔铸于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形成了凝聚中华儿女的核心价值观,激励着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前仆后继。而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使西方现当代思潮迅速扩展,其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迅速风靡全球,受到了众多非西方国家的追捧。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严重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其表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信仰缺失和道德失范

中国向现代化迈进伊始,儒学“文化大厦”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便开始松动,中华传统文化遭到激烈的批判,人们单一的信仰、趋同的思维和观念被打破。其后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民主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如今,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推进,无形的市场竞争在让人们踊跃竞争与拼搏的同时,也平添几分冒进和浮躁;多元的文化在让人视野不断拓宽、知识日益丰富的同时,又使人面临诸多的困惑和茫然;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在让人们感受人生多样性的同时,又让生活的本质受到异化的挑战。于是,有人迷惑、有人彷徨、有人苦闷甚至有人歇斯底里,不同的社会心态让本来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本来坚定的信仰开始丧失,让本来坚守的道德开始失范。现在在公共场所谈论道德的人,恐怕会被视为另类而遭遇冷落。受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对西方文化片面的追随,使得国人原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否定,其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逐渐丧失,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因而对社会成员缺乏有效约束,这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在一种规范真空状态。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原本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也逐渐放松自我约束,不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和是非善恶标准。这种道德失范主要表现为部分阶层职业道德沦丧、公共道德缺失和家庭传统美德遇冷。

2. 价值和行为取向西化

中国自启蒙运动以来,大量的知识分子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化。这对于解放思想、挣脱封建樊篱的禁锢大有裨益,但也造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失衡。如今西方社会在经济、科技和物质上占绝对优势,其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为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认知结构。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如欧美电影、电视剧在当代多样化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席卷全球,受到中国受众特别是青年大众的热捧,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时尚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他们身上体现得较为显著。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基本精神缺乏全面、足够的了解,由于对历史的认识是零碎的或断章取义的,他们的时空概念是断裂的,因而其历史意识薄弱、反思能力和社会问题思考能力日益衰微。这主要体现在对流行文化的追捧,对消费时尚的追求,对偶像的崇拜,对网络语言的大量模仿和实践,以及对诸多西方节日的逐渐认可与崇尚。

3. 经典文本阅读被消解

一个民族之文化认同的维系主要依赖于世代孜孜不倦的文化遗产,而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靠阅读的积累,特别是一些经典文本的阅读积累。但现在的年轻一代在网络小说、手机阅读快餐、电影和电视的

冲击下正逐渐地远离传统文化经典,对消遣化、平面化、图像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偏爱影响着他们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体认。一些年轻人,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许多人几乎没有认真阅读过古代和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对这些作品的了解仅限于对影视剧的观看,但一些网络写手的作品在当代青年中异常火爆,从网上火到网下,从网络文学到纸质出版再到影视剧的改编,成为了当代社会消费的主流。正如世界著名美学家艾尔雅维茨所说的:“在后现代主义中,传统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学的靓丽光辉所普照。”^[3]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新媒介不仅改变了文学和文化的存在形态,还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消费习惯,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兴趣,消解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三、中华文化认同的重建

全球化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纵深拓展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和文化边界,动摇了文化与民族国家同体相连的根基,减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属性,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认同的新问题和新局面。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倡导发展本民族文化、重塑本民族文化认同,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培养国民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以“文化自觉”解决在文化全球化冲击下非西方国家民族文化的衰微问题。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另外,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历经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4]。可见,文化自觉是解决文化认同问题的思想基础,因为只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正确的把握和恰当的诠释,才能理性地对待世界文化的新格局。所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在西方文化占据优势的

背景下,中国人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挖掘其蕴涵的深厚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时代转换,赋予其新的文化价值,激活其现代生命力。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所包含的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以礼为纲的社会制度和忠信笃行的行为准则,不仅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资源、理论支撑和精神引导,还可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人的异化、社会秩序的混乱、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疗法,形成对西方物质文化有益的补充。总之,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传承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并通过多种渠道学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和核心的儒家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挖掘儒家文化中具有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的文化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现代转换。这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也是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才能实现儒家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才能保持中华文化的自主地位,才能巩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其价值的体认,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独特的精神资源。

2. 倡导多元文化并存,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繁荣景象的同时也挟携着帝国霸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容易导致世界走向全盘西化的“同一”或“一体化”,造成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身份危机和文化认同障碍,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特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倡导多元文化并存。这不仅是对全球一体化做出的回应,也是文化自身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这种文化观是对文化相对论和文化普遍论思想之扬弃,它既承认世界文化纷繁多样,也承认各个国家内部亚文化的异彩纷呈,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化景观的多元图景——不同文化的形成是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故不同的文化拥有其与众不同的机理,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可以互通有无,可借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要了解、尊重和重视异族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少数族裔文化,允许不同文化的个性特色发展,使它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既有全球信息资源

的共享,又有话语生产和传播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当今世界才能形成一种新的包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格局。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多元文化观念,以儒家文化为精髓的中国主流文化,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引领,同时吸纳一切优秀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异质文化,升华和创新中华文化,从而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样,我们不仅能克服固执、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能警惕和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批评性地看待文化相对主义,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大放异彩,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3. 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关系,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促进中华文化的新觉醒和再发现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效应之一是文化全球化,而文化全球化在当今不对等的中西交流中会纵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冲击着非西方国家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它们面临被同化的危险。这是绝大多数人士面对文化全球化所表现出的忧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化全球化积极的一面:它让当代人们面临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使非西方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侵袭,但在与他者的碰撞、对比中,从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反观自己的文化体系,认清其价值所在并加以反思,成为促进本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催化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全球化能引发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唤醒各民族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在顺应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与其他文化碰撞和交流中,中华文化会出现短暂的危机,但它不会被遮蔽或消弥,因为短暂的危机能引起中国国民对自身民族文化之根的重新关注和重视,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因此“全球化时代应是一个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是一个有异质性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体系。特殊性的民族文化与普遍性的全球文化并存共生是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点”^[5]。这种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华文化的新觉醒、再发现

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塑,都是在看似世界文化被同质化的表象下各族文化为保持并彰显其特色所作出的努力。

四、结语

邪片战争以来,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不得不学习、借鉴和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6]。“五四”以来,由于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张扬,造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失衡。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媒体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之势侵入中国,受到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热烈追捧。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严重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认知,造成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对有关中国文化认同重建之路的探讨,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当下文化反思和研究的重要方面,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对此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美]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43.
- [2]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 韩红,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83.
- [3]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图像时代[M]. 胡菊兰,张云鹏,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35.
- [4] 费孝通.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 思想战线, 2004(2): 6.
- [5] 金民卿.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5.
- [6]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8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2-0022-04

河南当代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

吕晓洁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中原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河南文学与中原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河南当代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现代性阐释,比如,通过对义文化的诠释,对坚韧、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对纯朴、仁爱精神的展现,对忧患意识的体现,河南当代文学在挖掘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大力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人们朝着真善美前进的正能量、构建中原新形象、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河南当代文学;中原传统文化;义文化;仁爱精神;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G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5

中原传统文化主要以三种形态存在:以自然形态存在的物质文化,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典籍文化,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思想文化。而对现代生活最有渗透力、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最能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是思想文化。关于中原思想文化的精神特征,河南作家李佩甫在其长篇小说《羊的门》中有一个贴切的比喻:“老酒气息”,对其概括得精当而独到。老酒是时间的产物,因年代久远而醇香绵远、厚重、苍劲、古朴,又因其年代久远而蕴含一股幽微的腐靡气息。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发展最为丰富成熟,集中华文化之精华,正如一坛老酒,漫长的历史使之愈加光辉灿烂,是其他区域难以超越的文化成果。与此同时,因长久的历史积聚,其中也沉淀了许多积重难返的陈腐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中原传统思想文化中植入现代性内涵,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以在重建当代中原人的精神价值体系、新型道德伦理观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提高中原文化软实力,使中原文化助力中原腾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基于现代性视角,弘扬中原人文精神,展现中原人的精神面貌,树立中原良好形象,为中原的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引领。而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构成,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根本价值在

于其对人的精神、灵魂、人格建设的作用,引领人们向着健康美好方向前进,其人文价值对于人格完善、个性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文学的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河南新文学自开创以来,一直与中原文化血肉相连。从新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曹靖华、于庚虞等人发出的河南文学之先声,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等人的现代性乡土反思,再到五六十年代的李準、段荃法、张有德等人的中原乡村新生活叙事,一直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孙方友、李佩甫、张宇、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等人的创作,都对中原文化进行了生动的阐释。河南作家自幼生长于中原大地,对中原文化耳濡目染,中原文化的精神早已融入其血液之中,沉淀在其思想里,在其作品中处处散发出特有的文化气息。自近代以来,中原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斗争,新时期以来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大业,无疑都是中原人民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最为强劲的音符。这些在河南文学中都得到了生动的呈现,这也是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民族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以及中原人民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信、自强、大义、仁爱等,构成了中原人民现代

[收稿日期]2014-12-3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WX003);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2400411095、142400410532)

[作者简介]吕晓洁(1972—),女,河南省泌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当代河南作家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目前学界对于河南文学与中原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对于河南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方面关注不多,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期丰富文化发展创新范式、发展中原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对义文化的诠释

中原思想文化资源丰富,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这里发展得最为成熟。中华第一经《周易》是在中原孕育而成的;道家学派代表老子、庄子本为中原人;孔子、孟子虽未生在中原,但其主要思想传播区域都在中原;东汉与北宋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义”是儒家重要道德规范之一,也是构成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一纬。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1](P30)}孟子对“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P123)}而后,韩愈进一步提出“行而宜之则为义”^[3]。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对“义”都有不同阐释,如比干剖心成为华夏义文化的先导与典范;文天祥从容赴死,是一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之义;关云长舍弃曹操的荣华富贵之许,千里走单骑,是一种朋友之义;《水浒传》中宋江所奉行的则是一种封建忠义。

“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河南当代文学中所阐释的“义”已被植入了现代性内涵,反对侵略战争,谴责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是一种人道主义之义;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不做损害别人的事,符合自然天道伦常,是道义;为政者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是仁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遵循诚信、友爱,是一种人格标准,是情义;在别人危难之时出手相救并给予帮助,是仗义。这些在河南当代文学中都有生动的诠释。如李準在《黄河东流去》中写道,春义和凤英在困难时是柱子帮了他们,春义坚决不同意凤英离开柱子另开饭馆,认为那是抢生意的不义之举;徐秋斋是一位算命先生,他看不惯海骡子对弱女子李麦的欺负,帮她出主意,逼迫海骡子兑现为李麦父亲买棺材的诺言;他带领背盐的妇女们大闹盐行,帮助生活凄苦的妇女们讨回卖盐钱并帮助王跑向汉奸团长讨回卖驴钱,这是一种挺身而出的侠义。张一弓在《远去的驿站》中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家族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出生入死、毫无怨言的动人故事,表现了中原知识

分子的民族大义。另外,张一弓在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还塑造了一个铁骨铮铮、凛然大义的英雄李铜钟的形象:他看到村民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挺身而出,甘冒牢狱之险,为村民借粮食,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典型的舍生取义之壮举;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毫不屈服,他考虑的不是一己之利,而是千千万万人的安危,这又是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大义。

乔典运对于“义”的理解更有意味。他在小说《满票》中将主人公何老十塑造为何家坪的村支书,且艰苦朴素、一心为民、公正廉洁、毫无私心,可谓“仁义”“道义”之士。在选举村长的前夕,何老十自认为必被选上,而村民们也互相约定还投何老十的票,但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何老十只得了两票。大多村民受过何老十的恩惠,这似乎是以不义之举报仁义之人。掩卷深思,何老十是个讲仁义的好人,但何老十脑子里又有一股顽固的愚忠思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政策,哪怕是错误的极左政策也照行不误,他又是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好人”,因此,他在为村民做出无数好事的同时,无意中也为村民带来了不少伤害。时代在变,乡村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村民的价值观与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村民抛弃的不是何老十,而是何老十所代表的思想观念,是一种旧式之义。在村民看来,选出一个更能干且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干部才是真正的正义之举。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以发展的眼光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义”的不同认知态度。

可见,在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弘扬中原传统文化中的义文化、践行义文化,对新时代特征的义文化进行诠释已成为河南作家的自觉行为。

二、对坚韧、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P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5]等这些中原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河南当代文学中都得到了直接弘扬。

李佩甫在《羊的门》开篇第一章中就写道:“是啊,一页黄土一页泪。连年的战乱,天灾又是那样频繁,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那一代一代的后人是怎么得以延续的呢?没有人知道。三千年过去了,在广袤的豫中平原上,仍然是一处一处的村舍,一处一处的炊烟……人活着,树也活着。”^{[6](P1)}作者在这一章里列举了历史上中原经历的屡次战乱与天灾,但中原人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揭示了中原人民生命的韧性与顽强。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以1940

年代中原遭受的天灾人祸为背景,也生动展现了中原人生命的韧性。当时的中原虽遭遇了旱灾、蝗虫灾害、日军侵华的政治灾难等一系列苦难,但人们在苦难中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并且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大义之中。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描写了人们虽受到难以排解的生命之忧,但并不是消极地坐以待毙,而是一代一代顽强抗争,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刘庆邦在《平原上的歌谣》中叙述了1960年代极左政策导致的人间苦难,浮夸成风,形式主义盛行,人们食不果腹,连树皮草叶都吃光了,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之火没有熄灭,他们互相体贴,坚持到最后,表现出超强的生命韧性。在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中,中原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展示:狗娃舅只有十二岁,父亲瘫痪在床,姊妹又多,全家的日子靠他一人来维持,他个子虽矮小,但力气很大,一天能割二百斤草,甚至超过了村里最强壮的汉子。作者这样描写到:“坡上晃出一队割草的孩子,全赤条条的,一线不挂。远远,极像被风吹的草儿押送的一队泥丸。那打头的草捆极大,小垛儿一般地缓缓滚来,仿佛草也成了气候。近了,你才能瞅见那埋在草里的小头。叫你真不信是那泥丸一般的孩儿驮了草动,倒疑是成了精气的草揉着孩儿走。这打头的,便是狗娃舅了。”^[7]狗娃舅可谓一个极具顽强韧性的生命象征。

中原自古多灾多难,中原人面对苦难表现出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李準的《黄河东流去》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最为动人。国民党部队为了阻止日军南下,扒开了黄河花园口一段河堤,结果造成水淹四十四县,黄河南岸的河南区域内人民是直接的受害者,瞬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在最苦的日子里,不是屈从,而是自立自强,勇敢地面对苦难,并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斗争中去。“再苦不忘国耻,再难不失人格”,这正是对“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谊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8](P704)}

周大新在《第二十幕》中描写了南阳尚氏家族为振兴家传丝织业而进行的永不放弃的努力:尚家经历了无休止的磨难,匪祸、战乱、运动、腐败,每一次都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与破坏,但尚家人从没有放弃过造出最美绸缎的理想追求。这正是一种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坚韧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撑人生的信念,有了这种精神,人们才

会历经坎坷而从不倒下,这也是民族精神之重要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会历经磨难而毅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日益走向富强。

三、对纯朴、仁爱精神的展现

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写道:“再走,你先是发生了一种平缓的感觉,甚至是太平了,眼前是展展的一马平川,一看,你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觉。灰是很木的那种,不刺眼,但却又是很染人的那种,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里……”^{[6](206)}“平”“木”是中原大地的特征,也是生长于这块大地上的民众的隐喻,他们平常得像一株平原小草,纯朴得像一块黄泥巴。“吃了么”是中原流行的第一句话,是一种最传统最古老的打招呼方式。“上屋吧”是中原流行的第二句话,这是一种真心实意的表达,是一种真挚的邀请。当你走进一户熟悉的人家,狗会在你的腿边汪汪地叫着,这时候会有主人从院子里迎出来,说一声“上屋吧”,这是在告诉你,你已经到家了,这里就是你的家。这两句话充分代表了中原人最朴实的一面,就如一马平川的平原,一览无余,虽显得有些单调与木讷,但包含着最真挚的情义。

仁爱精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孟子说:“仁也者,人也”^{[2](P236)},这句话包含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是“人的自觉”,二是“人道主义”。这种思想在今天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目前中国已进入商业化时代,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泛滥,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克服这些弊端,是构建新的德性伦理的宝贵资源。河南作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这种“仁”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如李佩甫《黑孩儿》中的主人公黑孩,从小就没了爹娘,村民便成了他的衣食父母,对他比对自己的娃子还亲三分;《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自幼父母双亡,全村人对他无限疼爱,视如亲生;阎连科《瑶沟人的梦》里的连科,读高中家里负担不起,既无钱又无粮,是全村人给他凑齐了上学的费用。河南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李準曾对河南人的民间个性即“侂子性”进行过概括:“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侂子’,‘侂’是什么东西呢?我理解既是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就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8](P783)}浑厚善良是河南人的本质,如李準在小说《黄河东流去》中塑造的主人公李麦、徐秋斋、蓝五、雪梅、梁晴、海老清等,都质朴善良、重情重义;面对厄运,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接济,展现了中原人最为纯朴动人的一面。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滋养出

来的真挚醇朴人性,是最鼓舞人心之处,也是中原文化生命力所在。

儒家“仁”的思想,不仅爱人,而且爱物。河南作家从现代性视角切入,把这种思想引入生态文化观念中,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焕发出新的生机。如河南女作家傅爱毛在其小说《会说话的南瓜》中刻画了一个心底仁厚、尊重自然的顾三爷形象。顾三爷是核桃树学堂唯一的老师,学生是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他教孩子们念书识字,在季节更替中也教孩子们种南瓜、溜红薯、认识各种药材,冬天围着火炉给孩子们讲故事、唱歌,既教给孩子们知识,也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更给予了孩子们温暖与快乐。这是一种尊重自然人性的教育方式,与尊重生命本体的“泛爱众,而亲仁”^{[1](P3)}、“泛爱万物,天地一体”^[9]的思想相契合。

四、对忧患意识的体现

忧患意识包含悲悯之心和责任承担两层涵义。悲悯意识是指超越一己之私,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去发现人类存在的困苦和精神上的缺憾。当个人或众生被现实的困苦所缠绕时,当人生与自然的秩序被打破时,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被破坏时,仁人志士的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深沉的悲伤和无限怜悯,如孟子所称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承担责任是指在悲悯基础上产生的自我关怀、群体关怀。自我关怀体现为自我人格的提升,群体关怀则体现为谋求人类的健康发展。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胸怀天下、奋发进取的志士仁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南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整体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这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反思意识表现出来的。河南作家一方面骄傲于中原文化的古老与深厚,其优秀因子哺育出中原人优秀的品格;另一方面反思中原文化存在的弊端以及对人的发展形成的阻碍作用。“爱之深,恨之切”,正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无限热爱,更希望其更加完美。确实,中原文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在久远的发展史上还携带了许多滞后的东西。在南宋以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原既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也是封建思想发展最为集中的地方,因此,一些积重难返的落后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中。河南作家以现代性视角对之进行观察,对那些落后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对中原农民缺乏独立思想、盲目跟风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李佩甫的“豫中平原”系列作品对中原百姓中的绝对服从权威、面子意识进行了揭露,乔典运在《满票》《冷

惊》等作品中对残留农民心理深处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揭示等。

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人性中的弱点,批判文化因素造成的人性暗疾,这和鲁迅的“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一脉相承的,这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通过对忧患处境的深刻体验、对造成忧患处境背后原因的深刻思索,以期突破这种困境,弘扬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提升人格修养——正如《易传》所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4](P344)}

五、结语

中原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脉相承,中原传统文化是中原发展的原始基因,一切现代文化都必须在此土壤上生根发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一直被视为批判的对象,几乎成了封建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中原传统文化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传统文化遗迹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许多优秀的传统思想被当作封建思想而加以否定。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因此,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是时代的需求。河南当代文学在挖掘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大力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人们朝着真善美前进的正能量、构建中原新形象、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杨伯峻,杨逢彬. 论语译注[M]. 长沙:岳麓书社,2000:30.
- [2] [战国]孟子. 孟子[M]. 杜玉俭,刘美嫦,译注.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123.
- [3] [唐]韩愈,[宋]苏轼,王安石,等.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C].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5.
- [4] 佚名. 周易[M]. 宋祚胤,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5] [战国]荀子. 荀子[M]. 潘嘉卓,译注.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1.
- [6] 李佩甫. 羊的门[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7] 李佩甫. 红蚂蚱,绿蚂蚱[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
- [8] 李準. 黄河东流去[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9] [战国]庄子. 庄子[M]. 曹础基,注说.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2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26-05

自媒体情势下的影响力构建

张福平¹, 陈皓²

(1.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传播无处不在的全民织网时代已经来临,自媒体业已成为聚合社会资本的新平台,做好自媒体策展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自媒体以其承载的观念、品位促进参与式互动,会形成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社群支持,进而形成向心力、渗透力,效益溢出则可使威权延展。也就是说,自媒体影响力源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社群支持。因此,自媒体要想形成一定影响力,关键在于让人融入与分享,应做好受众定位,分析用户特征与接受心理,以适当的形式、有针对性地上载内容,以便增加认同度与分享率,促进社群集聚与圈层传播。比如传播频次要适当,内容选择要独具特色,注意用创意赢得话语权,让视觉融入内容,打造“圈子”,发展定制阅读等。

[关键词] 自媒体;策展;社群支持;参与式互动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6

2014年6月公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年1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8.38亿户,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手机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全民应用时代,微信和QQ等移动社交快速发展,成为当前人们重要的社交方式:通过跑步应用记录运动数据,可进行路线分享;用手机拍照、录像,可即时发布在社交网站;自己浏览阅读到的资讯可随时与大家分享、交流……移动互联时代的社交可谓无远弗届,个体更是有了一种可随时确证的存在感。^[1]

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在2003年出版的《自媒体研究报告》中指出,公民用以发布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载体,如博客、微博、微信、论坛、BBS等网络社区,都可以称为自媒体。他们预言,十年后自媒体将在中国遍地开花。^[2]如今,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传播无处不在的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或Consumer Generated Media,简称CGM,泛指以任何形式在网络上发表的由用户创作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3])成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信

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真正实现了由全民上网向全民织网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大众传播的意义传递和媒介垄断,也为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参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平台。以自媒体构建为表征的全民传播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媒介格局、社会结构、经济生产、知识创造、生活方式、心理状态、文化形态,推动着媒介传播方式、商业模式乃至人类生存模式发生诸多新的变革,重塑品牌与用户、媒介与用户、用户与用户的关系。

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在媒体训练营2014年夏季峰会上发表了《每个公司都是自媒体》的主题演讲。他强调,每个公司都应做自媒体。在移动互联时代,口碑为王,消费者关注更多的是故事而非口号,产品好故事好才可以使信息迅速传播。^[4]从个体角度讲,中小V要的是曝光率和品牌力提升,一般人要的是存在感,希望满足其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兴趣是吸引人投身自媒体的初始动力,而满足感和声誉则成为支撑很多人参与自媒体创作与内容生成的根源。与传统媒介环境不同,自媒体情势下个人和组织的影响力构

[收稿日期] 2015-02-10

[作者简介] 张福平(1967—),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建是一个全新课题,值得认真研究。本文拟从自媒体策展与社会资本获得之关系阐释入手,探讨自媒体影响力的形成机理,并据此给出自媒体影响力构建的一些基本策略。

一、自媒体策展已成为个人和组织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法宝

1. 自媒体已成为聚合社会资本的新平台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之中,个人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或建立起网络连带,才能接近、获取与使用该资本。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时空限制,而自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更具有民间性质,以自然形成、“广场聚集”等为表征,汇聚语言符号资源、影响社会生活,富有文化的丰富性、活态性、原生性,并以其临时的非现实空间构成大众第二种生活,使传受双方都得到释放性表演,成为大众赖以享用的人际交往新平台。这里既可以是独立思考、价值判断的思想平台,凝聚民意民智、批判建设兼容的意见平台,又可以是价值发现、资本聚合的发展平台。

人际传播是处于一个关系之中的甲乙双方相互提供资源或协调交换资源的符号传递过程。相应的,不介入新媒体这种人际交往新平台,游离于网络传播之外,自然难以收获基于该平台的社会资本。正是基于对用户注意力场域的变迁和自媒体等新型媒体强大辐射力的正视,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我们看到,不仅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新媒体在不断加强建设,各层级的政务微博、《人民快报·廉政周刊》等手机报、《共产党员》微信公共账号等也纷纷上线。

2. 做好自媒体策展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

如今,手机等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体的一个“器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正趋向纯数字化、纯移动化,自媒体策展已成为个人和组织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法宝。所谓策展,即策划、筛选并展示,其早期概念是指艺术馆、博物馆、会展布置活动中的构思、组织与管理,后来延用到其他领域。网络时代,

我们在社交媒体转发资讯、在朋友圈和各种社群里发言,其实也是一种策展活动,就跟平面媒体的版面安排似的,只是自媒体策展是历时性的。商场陈列商品是为了提升销量,做好自媒体策展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社会资本:怎么将自己创作的或从他处复制的内容展示在自己的空间里或发布在朋友圈中,关系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自媒体策展做得好,会魅力大增,更容易结交朋友、拓展人脉,增加社会资本。^[5]

反过来讲,要增加社会资本,就要强化策展意识。自媒体更具弹性,人人都是自己的代言人,表达更直接,语言更简洁,创造性更强,其间的信息也更加零散化、大众化。个人或组织在自媒体信息流里积累的内容有用性越高,其所凝聚的价值也就越大。换言之,在人人都是媒介的一种社会化关系网络中,内容即广告,优质的内容更容易产生传播效应。所以自媒体策展要有产品化意识,要将媒介传播本身视为一个精雕细琢的产品,使其可赏、可用、可互动,通过激发他人的参与感构建自己的社群,才是获得口碑引爆的关键。不少人在自媒体中一味追求“多发、多转、多评、多粉”,盲目追求数量,致使信息流质量被各种翻来覆去的转发、低质量的互动、绑架性的信息所拉低。所以要做好自媒体策展,就要有相应的价值判断和信息筛选能力,摒弃“唯数据是瞻”的做法,对低质量、低互动信息尽量少发布,多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价值内容,这样才能提高他人的关注度,增强自身的魅力。^[6]

二、自媒体影响力源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社群支持

自媒体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权利,可以追忆历史也可以记录当下,可以观测他人也可以塑造自己。只要有策展意识,进行认真建设和维护,我们手中的自媒体就会像电台和报社一样,形成强大的影响力——通过策展形成自己的群体圈层,不断汇集资源,效益溢出又可使得威权延展。自媒体策展与社会资本获取循环模式如图1所示。

媒介通信是人体的延伸,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通信导致社会交往与组织结构的变化,放大了人的个体能力和交往范围,也对个人的组织环境产生冲击,形成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联合。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所谓群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和归属感、存在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社交媒体形成的一个个群和朋友圈,就是个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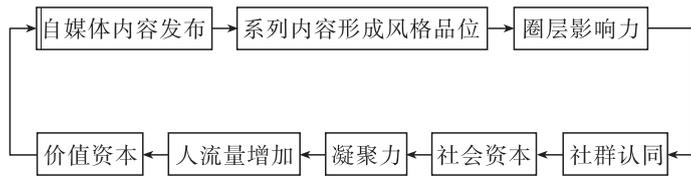


图1 自媒体策展与社会资本获取循环模式

的各种不同圈层的群体。自媒体促成的群体传播就是将这些不同圈层的人之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结与实现的过程。参与度高的自媒体多是以其品质内容而使人聚合、留存和沉淀,进而有了彼此的深度联结。移动互联时代,人与人之间可以依靠地理位置建立关系,也可以依靠兴趣爱好建立关系,因此,自媒体以其承载的观念、品位促进参与式互动,会形成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社群支持,进而形成影响力。^[7]

所以,自媒体品质的高低不再止于覆盖多少人、发布多少频次的信息,而在于其承载的内容能否满足人们的发布、创造、分享需求,能否与受众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不断激发受众的兴奋点,使人愿意分享和扩散,使用户黏度不断增大。信息流是自媒体最核心的价值。优秀的自媒体能带来可观的用户和粉丝群,赚取到更多“分享”“赞”和“转发”,形成向心力、渗透力。就拿企业品牌构建来说,互联网时代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即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和变现基础。鉴于社群情势下的品牌是圈内用户主导的口碑品牌,是用户评价的产物,是在一次次互动中完成的,自媒体要想成为一个企业品牌构建的界面,就需要思考如何以用户为中心,通过与用户的关系互动形成基于用户兴趣图谱的新圈层。如果能够做到营销与自媒体合一、粉丝与用户合一,那么,基于这个圈层就可以开展更多业务,实现利润递延。比如,罗辑思维围绕“罗胖”罗振宇建造了一个“产品型社群”,既有高质量的知识分享,又被赋予了“罗胖”的人情温度,以其“死磕自己,愉悦他人”的异质,在互联网中吸引了百万级别的用户,形成了一个气味相投、互相信任的社群。尽管罗辑思维的视频与微信内容免费,但由于其在社群中用信任改造了产品与用户关系,其“爱我就包养我”的会员招募、图书报限量闪购活动却大获成功。^[8]可见,互联网品牌是创始人、产品与粉丝之间的“合谋”,只要有极致的产品体验,粉丝就会自主传播。内容、娱乐、体验、社交、互动、族群,成为媒体传播新的关注点,用户情绪的引导与心灵共鸣将会成为媒体传播的重要目标。

三、自媒体影响力构建的关键在于让人融入和分享

自媒体内容传播就是通过内容表达、魅力展示,影响受众思考问题的方式及价值观,通过人们对其传播的内容产生价值观上的认同,而使得自媒体的品牌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提升。为此,有必要做好受众定位、分析用户特征与接受心理,以适当的形式有针对性地上载内容,增加认同度与分享率,促进社群集聚与圈层传播,从而维护并壮大自身影响力。

1. 相关调研机构发布的用户数据报告

百度2015年1月发布的2014年度十大人气应用榜中,手机百度、微信、新浪微博居于前三位。^[9]2015年1月企鹅智酷携手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首份《微信平台数据化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1月诞生的微信如今已渗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并成为人们重要的交流工具,它扩大了交友范围,拓展了交友方式,增进了友好互动,拉动了信息消费、流量消费、娱乐消费。18~35岁的中青年占用户群体的86.2%,九成用户为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事业单位员工。公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资讯、方便生活和学习知识。^[10]而“契约”发布的《2014年微信公众号用户行为习惯研究报告》显示,用户乐于分享的文章有三类:一是思想深刻、创意新颖的文章,占81.87%;二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文章,比如与工作相关的经验、知识占34.42%,偶像人物写的占24.80%,当地或家乡的生活动态占23.82%;三是重大时政、生活新闻,占20.81%(见图2)。

另外,此报告还引用 *The New Yorker* 的一篇文章,指出容易被分享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题积极,看后让读者感到兴奋;二是让用户非常愤怒和恐慌的内容;三是让读者觉得自己不仅聪明,而且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资讯;四是实用且容易记住的内容;五是有价值的故事。^[11]

2. 基于用户分析与接受心理的自媒体传播策略

一是传播频次要适当。一般地讲,自媒体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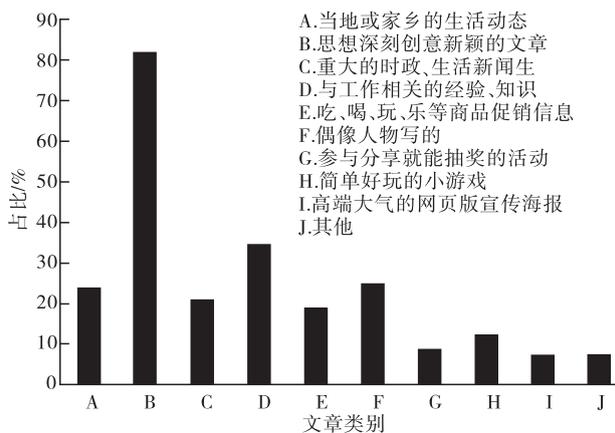


图2 微信用户乐于分享的文章类别^[11]

成影响力,就要保持一定的活跃度,信息发布要有连续性,但不是条数越多越好,以每天3条左右为宜^[12];适当的短暂沉寂,避免“超限”以产生等待效应,或可赢得后续信息发布所获支持的增加。

二是内容选择要独具特色。要坚持相对稳定的风格取向,围绕既有定位策划内容,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可参考上述调研机构发布的调研成果,基于自媒体用户的社交行为、兴趣背后的数据分析,向目标人群更感兴趣的题材靠拢。可借助话题发现技术,选择热点话题加以发挥利用,以娱乐精神发掘、拼接、转化,构建用户内容信息需求供应链。其中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原创产出,通过创意发布新鲜有趣、有故事感的内容。标题要有冲击力,吸引人打开;观点犀利,以情动人,以文化人。同时要与他人保持互动,进行反复沟通,使所传信息的闪光点深入人心,提高认同度与转发率,形成基于价值信息流的圈层传播,实现最大化的能量聚集。

三是注意用创意赢得话语权。内容创意与话语场景的适配性十分重要,适配了才能让自己的宣传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中浑然一体地出现,同时引入真实好友关系链,打造出“好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广告”的场景。比如,现在国外兴起的原生广告,其重要特征就是提供价值内容,让受众接受并喜欢,愿意看,不自觉地融入媒体环境,当受众觉得这些内容与其所处的场景有关时,就愿意进行后续扩散传播,这时的广告就不再是干扰,而成为大家希望看到的内容,进而得到更多受众的“赞”和转发。^[13]

四是让视觉融入内容。读图时代、眼球经济情势下,视觉资讯打开率更高。产生于1980年代末的GIF微影像技术,因其内容简、时长短、传播快,具有及时性、可下载和转载功能,更适于当下“微”世界

的传播。微动画从信息表达的角度还具有典型性、兼容性、寓言性、直接性、创造性等特征,有漫画一样的功能,但又比漫画更易传播、更富感染力,时代感更强,非常适合于现代短、频、快的生活节奏,未来很可能成为大众表达的重要手段。^[14] 自媒体传播自然要注意运用该手段,也可借助图表等其他方法立体呈现。

五是打造“圈子”,发展定制阅读。大家知道,社会影响、动机、认知互动(认知控制、认知反馈、卷入度、感觉活力)不仅影响受众认知,而且影响受众行为态度。在相同的信息刺激下,不同心理结构的受众对信息的个性理解会迥然不同。中国社会结构与人们的消费结构的深刻变动,使得社会分层更为明显、消费构成更为多元,“同道结同盟”,那些拥有相同阅读趣味的读者将结成“圈子”,或线上、或线下,或松散、或紧密,自媒体加入其中是维护影响力的重要支点。思想铸就品牌,自媒体要将自己看成针对社会特定人群的服务平台,依据独特的思想、立场、眼光、判断和态度展现,使得受众对自身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获得确认,定制阅读将是自媒体增强其发展实力、壮大影响力的重要抓手。^[15]

四、结语

从当前的情况看,新媒体社交势不可挡,但我们也不可对其过高估计。全球调研机构凯度集团最新发布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2014年,受访者中只有64.7%的人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影响,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现在用户开始担心社交媒体会给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认为用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过多,阅读纸质书籍的时间会减少,还认为社交媒体存在信息安全隐患,并影响健康。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人们发现,微信所关联的人从比较小的朋友圈逐渐扩展到更大的交际圈,其间充斥着垃圾信息和重复信息,内容质量变差,只浏览不评论、不互动的人群增加,社交疏离型人群不断增长。^[16] 因此,利用自媒体构建影响力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既要把握自媒体发展动态与特征,并巧妙利用,又要遵循传统传播学所揭示的相关原理,研究传—受新样态;既要重视新媒体的资源价值,多方位研究、挖掘和利用,又要注意克服新媒体所伴生的一些弊端,作为传者需要加强自律、理性与责任,作为受众则要培育更高的媒介素养、独立精神和批判思维。惟其如此,才能在当今这样一个媒体无所不在的场域游刃有余。

[参 考 文 献]

- [1] 李鹤,杨玲.全民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EB/OL].(2014-06-12)[2014-08-20].<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612/c14677-25136688.html>.
- [2] 沈世婧.异军突起的力量[J].出版人,2014(5):1.
- [3] 赵宇翔,范哲,朱庆华.用户生成内容(UGC)概念解析及研究进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5):68.
- [4] 黎万强.小米营销成功奥秘:人人都是自媒体,天天都要上头条[J/OL].数字出版动态,2014-06-23.
- [5] 张小强.策展,我们在网络世界中必须具备的新能力[J/OL].小强传播,2014-04-16.
- [6] 艾瑞网.微博信息流优化 做好用户价值搬运工[J/OL].数字出版动态,2014-07-16.
- [7] 钛媒体.社群商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商业图景[J/OL].数字出版动态,2014-07-16.
- [8] 虎嗅.产品型社群,一种新组织形态的诞生[J/OL].数字出版动态,2014-06-20.
- [9] 叶雨婷.百度“年度十大人气应用榜”揭晓 微信、新浪微博等入围[N].中国青年报,2015-01-19(06).
- [10] 苏三·金.微信平台首份数据研究报告:“微信的影响力”[EB/OL].(2015-01-27)[2015-01-28].<http://www.18touch.com/shujubaogaoweixi.html>.
- [11] 契约.史上首份揭秘微信公众号用户行为习惯研究报告[J/OL].数字出版动态,2015-02-09.
- [12] 微信公众平台.APP运营推广超级攻略(2015新版)[EB/OL].(2015-02-12)[2015-02-12].http://www.weihaotui.com/NewsInfo_350.html.
- [13] 肖明超.移动传播,不仅仅是APP和微信微博[EB/OL].(2014-05-27)[2014-06-10].<http://www.tmtpost.com/112783.html>.
- [14] 张海涛.自媒体艺术时代[EB/OL].(2014-08-06)[2014-08-18].<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532998>.
- [15] 邓的荣.中国期刊业面临的新一轮调整及八大趋势[J].中国记者,2013(8):35.
- [16] 高杉,邓卓然.社交媒体 你猜不到的10件事[EB/OL].(2015-02-05)[2015-02-10].<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50205A001EJ0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31-04

浅析高校微博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引导路径

虎业勤, 孙宁

(中原工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 随着微博的流行,当代大学生逐渐对高校微博产生极大的兴趣,高校微博已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的新阵地和主阵地。与其他微博相比,高校微博具有使用时间零星化、群体互动性较强、内容原创性高、兴趣点较集中的特点。高校微博是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导火索”、不良情绪发泄的新渠道、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要利用高校微博,提高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可着力于提高对微博的重视力度,及时回应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充分发挥微博意见领袖的作用,积极组建特色微博团队等。

[关键词] 高校微博;网络舆情;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7

目前,高校微博已经逐渐超越校园 BBS、QQ 等,成为学校、教师、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交互性新媒介,通过微博,高校实现了网上、网下共同服务师生的联动体系。但是,高校微博的开通在为高校网络舆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鉴于此,我国学者和高校管理者对高校微博的特点与发展现状给予了较多关注,并对高校微博的应用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但是,较少有人关注高校微博与其他微博的区别。本文拟深入探讨高校微博的特点及其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从而提出合理运用高校微博,引导高校网络舆情健康有序发展的方法路径。

一、高校微博的内涵、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1. 高校微博的内涵

高校微博是高校在提供微博服务的 WEB、WAP 等客户端上开设的,由高校主管部门管理,用于发布

有关校情校况、学校管理状况等信息的官方微博。根据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理论”,即根据媒介对受众的积极作用的大小、受众参与度的大小、互动空间的大小,可以把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高校微博受众不仅包括在校大学生和高校工作人员,而且包括关心高校发展的一些社会人士;比 QQ、BBS 开放性更高,互动空间及参与人员也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人或者几个团体。鉴于此,可把高校微博看作一种新的热媒介。

2. 高校微博的发展现状

《中国高校微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共开通了 16 166 个高校微博,高校机构账号 11 193 个,校园个人账号 4 973 个^[1]。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微博的大学城校园用户数已逾 3 000 万。以高校研究生会为例,目前已经有超过 100 所高校研究生会开通了新浪微博,并进行了认证,10 多所高校研究生会微博粉丝数已超 1 万^[2]。高校研究生会微博在开展活动宣传、服务教学科研、交流沟通服务等

[收稿日期] 2015-01-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KS014)

[作者简介] 虎业勤(1963—),女,河南省罗山县人,中原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伦理。

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体系上来说,高校微博不断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不再局限于一个官方账号,各种高校机构账号和高校个人账号作为辅助性高校微博也在不断增多,与高校官方微博形成良性互动,弥补了之前高校官方微博针对性信息不足的缺陷。

从管理上来说,随着高校微博数量的增加,高校微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有些高校对微博具有抵触情绪,拒绝开通微博;有些高校虽然开通了微博,但是不管理、不运营,致使高校微博空心化、形式化;有的高校微博虽然进行了管理,但是内容单一、更新速度慢,甚至某些高校的微博仅仅是对校内新闻的简单复制,缺乏互动性,而互动才是微博的精髓所在。

3. 高校微博的特点

高校微博作为微博的一种,与其他微博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使用时间零星化。高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丰富的课余时间挤占了高校大学生大部分的课余时间,因此高校学生使用微博的时间多数在课间及零星的休息时间,经常是对身边突发事情的简单记录,事后进行深入的思考,最后在微博上发表对该事件的感悟。这使得高校微博具有使用时间零星化、微博形式碎片化的特点。

其二,群体互动性强。关注高校微博的群体通常为在校大学生,相较于其他微博用户,大学生的素质高、思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他们更乐于参与到对各种热门话题的讨论中去。同时,由于大学生课业压力相对较小,表达自身主观愿望的欲望较为强烈,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能力参与到各种话题讨论中去,这增加了高校微博的互动性。

其三,内容原创性高。大学生处于思想活跃期,相较于其他群体,他们追求原创性的期望更高。同时,由于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表现欲较强,一般的文字性微博已经无法满足大学生展现自身的需要。因此,大学生更偏爱发布自己的各种摄影作品、简短的音频、原创性的视频,以不断丰富自己的微博内容。并且,大学校园内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也为大学生丰富微博内容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其四,兴趣点较集中。不同于社会其他群体,大学生的生活较为单调,对微博关注的兴趣点较为集中。据调查,大学生微博用户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娱乐八卦。大学生由于其个性特点,乐于浏览娱乐图片和视频,热衷八卦、趣味话题以满足自身的好奇心。二是社会热点问题。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微博为大学生提供了交流思想、开阔思维、关注社会的平台,满足了他们追求公平、公正的心理。三是心理健康。当代大学生学业、就业等压力不断增加,他们希望从其他人身上找到慰藉,因此,各种心灵鸡汤类微博能引起大学生思想上的共鸣。

二、高校微博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

大学生通过网络对国内外和校园内的一些重大或突发事件发表观点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会趋向于某种特定的观点,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较为确定的舆情即高校网络舆情。微博作为一种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新媒介,正如美国媒介批评家波斯曼所说,“一种新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3]。微博的出现必然给高校网络舆情带来诸多的影响。

1. 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导火索”

微博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和自媒体,每个人既是新闻的参与者,又是新闻的播报者,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微博在使用过程中很难实现事前审查,从而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即时发布^[4]。同时由于微博操作的便捷性、内容的简洁性和使用终端的多样性,使得微博用户习惯于随时随地发布微博以记录自己的生活与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高校大学生可以利用移动终端更新自己的微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快速报道。另外,微博作为一种交互性较强的新新媒介,所有人都能够转发微博,参与讨论,并通过微博互动了解别人对事件的评价。大学生尚处于易冲动、心理不成熟的成长期,很容易在未经证实的言论诱导之下产生过激行为,从而引发高校网络舆情问题。

2. 不良情绪发泄的新渠道

如果说过去大学生在校园网络、校园 BBS 上关注更多的是学校、周边发生的事件的话,那么使用微博就可以使大学生获得更大的信息量。由于大学生微博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了解国内国际时事、社会热点问题、娱乐八卦,这样就会增加高校网络舆情内容的范围。高校网络舆情在内容增加的同时,也会

增加问题发生的风险。同时,由于微博缺乏事前审查环节,微博上的各种信息良莠不齐,再加上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在面对微博上如此庞杂的海量信息时,一些缺乏判断力的大学生极易把高校网络当成他们发泄不良情绪的渠道,从而引发网络舆情问题。

3. 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

由于微博的篇幅简练、内容具有针对性、使用方式快捷,符合当代大学生追求自我展现、喜欢快节奏生活的个性特征,因此,微博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生活的新鲜事物代表。大学生把微博作为获取信息、表达情感、沟通交流的媒介,微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交工具,“织围脖”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生活的常态。同时,微博打破了过去一直以来的由传统媒体主导话语权的局面,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平台,使大学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在外界制约较少的情况下,大学生通过微博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及看法,这样就使得高校网络舆情能真正反映大学生的真实思想状况。正如麦克卢汉等^[5]所说的,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能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高校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将网络微博舆情作为反映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这对于及时掌握校园动态、维护高校舆情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高校微博引导高校网络舆情的路径

高校可以根据高校微博的特点并结合高校微博发展现状,使高校微博能正确引导高校网络舆情,以促进高校网络舆情健康有序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提高对微博的重视力度

要恰当利用高校微博,使之正确引导高校网络舆情,首先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微博的重视力度。针对目前高校对高校微博重视度不足的现状,为避免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发生,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充分研究高校微博这一新媒介及其运行规律,提高微博的利用率,深入了解微博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特点,创建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公开透明、及时有效地把事件真相告诉在校师生,掌握网上舆论的主动权,不给虚假偏差信息以可乘之机,以保证高校网络舆情健康有序发展。

2. 及时回应网络舆情突发事件

高校应该充分利用高校微博,紧紧把握高校网络舆情走向。一般来说,高校网络舆情问题通常是由社会和校园内的热点问题在网络上的讨论引发的。高校过去常采取“堵”的措施,这样非但不能把高校网络舆情引向健康方向,反而会引起部分大学生产生不满情绪,引发网下聚集性事件。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如宣传部门)可以利用高校微博的交互性,主动在微博上发起有关社会和校园热点问题的讨论,以“微博主持”的身份与大学生互动,为大学生解疑答惑,不给虚假信息留下传播空间,积极引导网络舆情走向,降低网络舆情问题发生的概率。

在遇到由高校网络舆情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微博及时向学校主管领导汇报事情始末,校主管部门应通过当事人对现场情况的转述,做出快速响应,并利用微博互动性较强的特点,通过在校大学生的评论及时掌握在校大学生对该事件的看法,了解高校网络舆情状况,并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发生。

高校还可以通过官方微博在最短时间内采用多种方式(如召开微博新闻发布会等),发布准确信息,解释事件始末及真相,用正面权威信息消除网上谣言和来源不明、可信度低的信息,以平复学生非理性和疑惑不满等情绪,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突发事件,维护高校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充分发挥微博意见领袖作用

传播学研究证明,一般公众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往往不知所措,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就能够为人们的决策提供非常重要的依据^[4]。因此,高校可以选拔一些在大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骨干教师和校园“风云人物”,组织专门人员对这些教师 and 同学进行专业的微博课程培训,重点培养“微博意见领袖”的“微写作”能力,增加“微博意见领袖”微博内容的原创性、趣味性和吸引力,逐渐把这些博主培养成为“微博意见领袖”,利用不断更新的高校微博引导高校网络舆情的走向。利用高校微博原创性高的特点,使这些“微博意见领袖”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根据自身爱好推送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微博内容;在网络舆情问题爆发时,他们可以充分发挥网络评论员的积极作用,通过自己“微博意见领袖”的言论来强化正面舆论,抨击错误言论,实现对校园网络舆情的正面引导。

4. 积极组建特色微博团队

高校应充分重视高校微博的建设与管理工
作,正视大学生对高校微博原创性的需求,不能仅仅靠转载和对校内新闻的简单复制来吸引大学生博主的注意;而应结合在校大学生兴趣点集中这一特点,组建高校各级微博管理团队,精细化运营高校各级微博,根据各部门主管工作内容,推送符合自身工作性质的微博内容,形成部门特色,吸引大学生的关注,传播正面舆论,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网络舆情的良性发展打下基础。如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部分大学生缺乏对自己未来职业的合理规划,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就可以通过微博,发布各种职业规划的小贴士及招聘单位的招聘信息等。

总之,高校微博作为一种新新媒介,正快速地影响着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高校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结合高校微博自身的特点,构建适合学校发

展的微博体系,让高校微博真正成为服务师生的工具,从而形成健康的高校网络文化氛围,确保高校网络舆情良性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腾讯网. 沈阳:发布 2012 高校微博发展报告[EB/OL]. <http://edu.qq.com/zt2012/gxwbbg/>. (2012-12-11)[2014-12-19]. <http://edu.qq.com/zt2012/gxwbbg/>.
- [2] 周凯. 首份《中国高校研究生会微博发展报告》发布[N]. 中国青年报,2013-06-06(12).
- [3] 李明伟. 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2.
- [4] 缪志波. 浅析微博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J]. 当代教育论坛,2012(1):118.
- [5]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C].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35-04

“三明医改”模式可以复制吗?

——兼与钟东波先生商榷

代志明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三明医改”因推行年薪制等举措而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钟东波先生对“三明医改”尤为推崇,认为“三明医改”既具备“三个普遍性”,又有明白的医改当家人,完全可以推广到全国。本文对钟先生的观点不敢苟同,并提出以下质疑:年薪制可以解决公立医院的逐利问题吗?只有公立医院才具有公益性吗?“三明医改”的过度“控费”行为合理吗?医生参与“三明医改”了吗?政府的公立医院改革成本分担责任问题解决了吗?由于“三明医改”所倡导的政府强势介入医疗服务的政策导向背离了国际医疗改革的大势,再加上“三明医改”回避了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担及医生的改革参与权等问题,因此,“三明医改”模式难以在全国推广。相应地,将竞争机制引入医疗服务领域、让医生参与医改的全过程、政府来承担公立医院的改革成本、构建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或是推进医改的可选路径。

[关键词]“三明医改”;公立医院;年薪制;公益性;控费;参与权;竞争机制;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8

2013年以来,福建省三明市的公立医院改革(以下简称“三明医改”)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曾于2014年2月到三明市考察其医改情况,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组团去三明市学习其医改经验,部分学者对“三明医改”也较为推崇。于是,在全国各地的医改因遇到较大的阻力而“改不动”的情况下,三明市因成为医改“明星”而备受关注。但由于“三明医改”强化政府干预的政策导向背离了医疗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国际大势,也没有解决改革成本的分担与公众的改革参与权等问题,其在全国推广的可能性值得商榷。因此,为了防止“流行的学术偏向令公立医院改革身陷泥潭”^[1],本文拟以钟东波““三明医改”可以推广”^[2]的论点为例,对“三明医改”的可推广性进行分析,以求教方家。

一、钟东波先生认为“三明医改”可以推广的依据

目前学界认为“三明医改”可以推广的学者主要有两位,一位是李玲^[3],另一位是钟东波^[2],尤其是钟东波最为推崇。钟东波给出了“三明医改”可以推广的两个核心依据。一是“三明医改”具备“三个普遍性”,即针对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问题;采用的办法具有普遍性——实行不与收入“挂钩”的年薪制,从而改变了公立医院院长与医生的激励机制,这一点被其称为“三明医改”的“精髓”;医改的条件具有普遍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调动公立医院院长和医生积极性的前提下,实现医药费用的下降。二是“有明白的医改当家人,有全力支持医改的市委书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GL105);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2014T70763);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业与就业研究中心课题(3154131101711)

[作者简介]代志明(1974—),男,河南省永城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医疗保险与卫生经济。

记、市长”。基于以上条件,钟东波认为“‘三明医改’完全可以推广到全国去”,目前就差“领导人的政治决心”。

二、对钟东波先生观点的质疑

钟东波认为“三明医改”模式可以推广的主要依据是“三明医改”推行了年薪制、强化了对医药费用的控制和“有明白的医改当家人”,但笔者对钟东波的观点提出以下质疑。

1. 实行年薪制可以解决公立医院的逐利问题吗?

钟东波^[2]认为,通过实施年薪制和全面的绩效考核制,就可以成功地解决公立医院的逐利问题,并让公立医院的院长做政府的忠实代表。笔者认为,钟东波的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虽然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实行年薪制,并且其高管的年薪都在10万元以上^[4],但仍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行及管理层腐败的问题。例如,仅2003—2007年,全国因涉及腐败案件而被立案调查的国有企业高管就达1.97万人^[5]。其次,导致公立医院产生逐利行为的因素很多,医院院长工资水平过低只是其中之一。相关研究证明,科学的补偿机制设计可以诱使公立医院放弃逐利动机,如采用打包付费和按人头付费等补偿机制等。同时,笔者认为,公立医院存在一定的逐利行为是促使其提高效率的关键因素,只要我们能够采用科学的付费机制将这种逐利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即可。最后,“三明医改”的“年薪制+考核制”属于命令式治理模式,尽管该模式具有直接激励的效应,但同时也会抑制医生提高服务的动力,甚至还会诱发伪造业绩等问题^[6]。因此,尽管“年薪制+考核制”在短期内或许能够实现简单的目标,但是该模式并不是解决医疗服务供给问题的最佳策略,三明市一些公立医院对难以完成考核目标的担心就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对三明市部分医院的医生来说,“能拿到八五折的年薪就算任务完成好的了”^[7]。总之,“三明医改”虽然从形式上看好像改变了公立医院院长和医生的激励机制,但由于这种年薪制建立在官僚等级制之上,如果不实施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三明医改”的年薪制就无法解决公立医院的激励难题。

2. 只有公立医院才具有公益性吗?

关于医疗服务公益性的实现途径,目前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例如,钟东波^[8]认为公立医院在解决医疗领域的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优势,笔者并不认

同这一观点。首先,医疗机构的发源地在民间而非在政府。我们通过考察医疗史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医院起源于教会等慈善机构,而中国古代的诊所也大多由私人经营。其次,西方国家的私立医院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例如,美国的梅奥诊所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并且该医院的运转成本主要通过收费来补偿,但该医院仍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9](P107)。第三,通过科学的支付机制设计,私立医院也可以提供“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例如,英国的“资金跟着病人走”的支付机制设计使得私人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10];中国台湾地区民营医院的市场占有率虽为69%,但台湾地区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均居世界前列^[11]。相反,中国内地“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多发生在公立医院而非民营医院。因此,钟东波认为政府干预医疗领域可以实现公益性的论点在“逻辑和方法论上不一致”^[12]。同时,国际上公立医院改革的自主化、公司化和民营化的实质都是“放权”的过程,而中国内地的公立医院改革却往往会遭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抵制。或许是意识到“三明模式”一旦推广,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的行政干预将得到强化,作为北京市卫生和计生委副局长的钟东波青睐“三明医改”也在情理之中。

3. “三明医改”的过度“控费”行为合理吗?

钟东波^[2]认为“三明医改”的“控费”实践值得借鉴,因为三明市医保基金在2012年收支结余仅0.26亿元,而在2013年1~10月份收支结余达到1.20亿元。但笔者认为钟东波的上述论点值得推敲,因为来自美国管理式医疗的实践表明,人们最关心的不是医疗服务成本的下降,而是人们自身健康状况的改善^[13]。“控费”只是改革的手段而非其目的。中国医疗改革的初始目标是增进医疗服务的可负担性,其最终目标也是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而非单纯“控费”。

(1) 医疗服务价格的持续上涨是一种国际趋势。相关研究表明,消费者用于购买各类服务的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接受的服务量大致与他们所获得的其他产品数量同步;服务产出量份额的大致不变,与其占GDP份额的快速上升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谜^[14](P3)。据统计,1948—1995年,美国门诊治疗服务价格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5%,但其医疗服务的绝对价格上涨了1200%;而1960—1993年,OECD国家的人均卫生保健支出也以高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速率上涨,并且

日本和德国的上涨速率快于美国^{[14] (P9)}。直到目前为止这一趋势仍在发展,这也是近30年以来一些国家实施医疗改革的原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我们切不可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政策导向所致,更不应该将中国医疗改革的目的简单地视为“控费”。

(2) 医疗服务价格上涨并非都是缘于公立医院的逐利动机。当前,很多人将中国医疗服务费用过高归因于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钟东波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造成中国医疗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医疗系统形成了医院和医生的逐利机制^[3]。当然,笔者并不完全否认医疗服务费用过高与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有关,但同时认为医疗服务价格也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作适当的调整。1978年以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但中国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却相对不足,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据测算,中国每千人占有卫生技术人员在1990年和2005年分别是3.45和3.57,几乎没有显著的增加;2006—2010年,中国每千人占有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分别是3.66、3.76、3.92、4.15和4.37,平均每年有4.4%的增加,但是同期其他消费品的供给量平均每年增加10.1%,远高于医疗服务供应的增加^[15]。显然,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医疗服务价格也会上涨。因此,单纯地宣扬医疗服务应该“廉价”失之偏颇^[16]。

4. 医生参与“三明医改”了吗?

钟东波^[2]认为,“三明医改”的一个亮点是解决了思想统一、知行合一的问题,并且将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要素归结为要给医务人员体面的、有尊严的收入。在钟东波看来,只要支付给医生足够的年薪,那么公立医院改革就会成功。当然,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一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人毕竟不是动物,尤其是对医生这一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来说,他们除了要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以外,还要获得一定的社会尊重和公共决策参与权。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公众参与”是促成卫生服务民主化的战略之一^[17]。同时,来自世界著名私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诊所的实践表明,行政管理人员与医生是合作伙伴关系,二者之间只有保持适度的平衡,才会产生高效率的医疗工作^{[9] (P10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三明医改”中,我们很难找到医生和公众参与医改的身影。实际上,他们已成为“三明医改”的被动接受者,这也反映了“三明医改”决策的“一言

堂”问题。事实上,在医疗公共政策决策方面,中国已出现了由个人决策或“寡头决策”向“共识型决策”转变的趋势^[18]，“三明医改”却完全是在政府的操纵下实施的,直到目前笔者还没有发现医生或公众参与“三明医改”的资料。而中国的医改实践早已证明,医生参与的积极性若不高,医改落实就很难。因此,“三明医改”的可复制性值得怀疑。

5. 政府的公立医院改革成本分担责任问题解决了吗?

钟东波^[2]认为“三明医改”的另一个亮点是走了一条不靠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改革路径。但国外的医改实践表明,如果政府部门没有对公立医院的转制成本进行预算,必将导致公立医院改革的失败^[19]。而“三明医改”却在倡导“不靠政府财政投入”而推进医改的理念,这实际上是在变相鼓励公立医院独自承担改革成本。对此,据估算,在取消药品加成的情况下,只有三明市公立医院的门诊量增加3倍,其医事服务费才能弥补其取消药品加成带来的损失。可见,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割肉补疮”。事实上,三明市已出现类似的问题。例如,三明市22家公立医院在改革前的2011年的医务性收入只有6.7亿元,而在其改革后的2013年的医务性收入达到了12.4亿元^[7],医务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2.6%,这难免会让人想到该市的公立医院可能存在过度治疗和重复检查等问题。同时,“三明医改”也容易使人产生三明市政府有甩“财政包袱”的嫌疑。

三、结语

本文对“三明医改”的可推广性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三明医改”是一种倡导政府强势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医改模式,其回避了政府应当分担的改革成本与医生的改革参与权等问题。然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实质是改革政府自身,也即适度的“放权”和支付相应的改革成本,而非像“三明医改”那样“改医院”或“改医生”。因此,“三明医改”模式难以在全国推广。事实上,强化市场竞争已成为当前国家重点推动的医改思路^[20],试图通过推广“三明医改”以达到使政府继续在医疗服务领域唱“独角戏”的努力背离了国际医改大势。

相应地,本文认为,应采用以下措施来推进中国医改:一是将竞争机制引入医疗服务领域。可以适当压缩中国公立医院的数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等方式来实现医疗服务的多元化供给。同时,推

行“资金跟着病人走”的支付机制,以迫使公立医院提高其服务质量与效率。二是让医生参与医改的全过程。可以考虑在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方面引入双中心治理机制^[21],即让医生成为医疗事务的决策中心,而让以医院院长为代表的管理人员成为负责医院日常事务的管理中心,并通过建立医生—管理者合作机制来优化目前以医院院长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机制,从而建立起具有参与性和竞争性的医管机制。三是政府应承担公立医院的改革成本,而不是像“三明医改”那样将改革成本转嫁给公立医院。四是构建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例如,可以通过构建互联网医疗平台来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事实上,以“春雨医生”和“好大夫在线”为代表的国内网上问诊平台已经建立,并且发展态势良好,而国外也早已将移动医疗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医院向互联网医疗让渡部分职能会成为一种趋势^[22]。

参 考 文 献

- [1] 顾昕. 流行学术偏向令公立医院身陷泥潭[J]. 中国医院院长, 2011(22):114.
- [2] 钟东波. 三明医改模式推广只欠决心[J]. 医学界, 2014(7):14.
- [3] 李玲. 公立医院改革的“三明模式”[J]. 时事报告, 2013(9):38.
- [4] 李映洁. 质疑“国企年薪制”[N]. 人民日报, 2006-03-13(03).
- [5] 孟盛. “天价”高薪高管腐败现象频发[J]. 廉政瞭望, 2010(21):26.
- [6] [英]朱利安·勒·格兰德. 另一只无形的手:通过选择与竞争提升公共服务[M]. 韩波,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22.
- [7] 徐毓才. 三明医改有多少期待与隐忧[N]. 医药经济报, 2013-09-13(02).
- [8] 钟东波. 公立医院的经济学实质和依据[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08(1):45.
- [9] [美]利奥纳多·L·贝瑞. 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管理[M]. 张国萍,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107.
- [10] [英]亚历山大·S·普力克. 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创新[M]. 李卫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49.
- [11] 胡舒立,张荆剑. 中国2014改革升档[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172.
- [12] 许小年.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135.
- [13] [美]大卫·M·卡特勒. 要钱还是要命:给美国医疗体制的一剂强药[M]. 刘国恩,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98.
- [14] [荷]腾·拉加, [德]罗纳德·谢科特. 服务业的增长:成本激增与持久需求之间的悖论[M]. 李勇坚,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 [15] 邹至庄. 谈中国医疗近年的进步[N]. 南方都市报, 2013-02-13(02).
- [16] 顾昕. 新医改的公益性路径[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3:6.
- [17] Sandy Herron-Marx, Carole Nock Ford.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patient and public involvement: the need for an evidence bas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2008(20):373.
- [18] 王绍光,樊鹏.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44.
- [19] Walt G. The effects of hospital on medical productivity [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3):29.
- [20] 曾亮亮. 高层对医改不太满意:医疗保险有望充当主力军[N]. 经济参考报, 2014-09-03(03).
- [21] 代志明. 双中心治理:化解我国医患紧张关系的新路径——基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24.
- [22] [美]埃里克·托普. 颠覆医疗[M]. 张南,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39-04

试论明清晋商公益伦理思想

赵海涛¹, 胡海桃²

- (1.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2. 军事交通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室, 天津 300161)

[摘要] 公益伦理的核心立足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但是可以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诉求。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三大类。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看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等一些共性特征。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宦官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晋商;公益伦理;公共利益;众人福利

[中图分类号] K248; B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9

明清时期,晋商作为山西当地有实力的社会群体,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晋商虽以经商为业,但其中很多人并不以追求财富为最终目的,“却选择了将财富作为自己优秀道德表现的物质基础,在富有之后主动剥离或让渡个人利益以回报社会,他们修桥、铺路、施药、救孤、助寡、兴水利、赈灾民、捐军饷,造福乡里,恩泽一方,为家乡、为百姓、为国家作出了诸多义举善行”^{[1](P21)}。晋商这种随机行善行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被风俗和习惯所确定的伦理关系。目前学界对晋商公益伦理思想的研究并不多,且仅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只是例举晋商在哪些领域有施财的义举。本文拟以相关史料为基础,对晋商公益伦理做一梳理归类,并深入揭示其特征。

一、公益伦理概述

“公益”一词是近现代由西方传入的,与中国古代“公”与“益”两字合并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公益作为一种社会救助形式,起源于民间古老的互助传统,其产生具有经济、伦理、政治等多重原因。公益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演变,经历了由个人互助到民间团体主导再到政府主导的过程,逐步走向组织化、制度化,公益救助的范围逐渐扩大,救助内容日渐丰富,救助方式也日益多样,由解决生存问题逐渐走向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并重。

学术界对“公益”一词的含义虽没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界定,但一般都是立足于公共利益、众人的福利这一意义来解释^{[2](P24)}。笔者认为,公益并不是完全无私的,重点是要有利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彭柏林等^{[2](P33)}指出,公益伦理的产生是建立在人们对蕴含在公益救助活动中的道德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公益伦理可以认为是在公益活动中形成的处理各方面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是公益活动中各种道德意识、道德心理、道德行为的综合体现,是依据一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对公益活动所进行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升华。由此可知,明清晋商公益伦理研究的主要是晋商从事公益活动时的道德心理和伦理关系。

[收稿日期] 2015-01-04

[作者简介] 赵海涛(1977—),男,山西省吕梁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晋商伦理思想。

二、晋商公益伦理的类型

明清时期,公益救助主要由政府、民间慈善组织和家族等来提供,其中政府在灾荒救济、济贫事业、养老保障、育幼事业、抚恤事业等多种公益救助中占主体地位,但是政府在灾荒救济、济贫事业等方面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通过民间力量赈济,不仅省却了官府的精气神,而且救济效果更佳。^[3]晋商作为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一,在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民间力量的重要作用。

与同期我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以俭啬闻名,其“俭”已超出一般商人勤俭节约积累财富的程度。明清时期的史志中有大量相关记载:平阳府“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太原府“士商务实,勤俭”^{[1](P25)}。康熙南巡时曾说,“晋风多俭,积累易饶”。晋俗之俭,自古而然,因为山西自然环境恶劣,生存不易,致富艰难,迫使山西商人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晋商之“俭”是艰苦的生活条件所致,所以当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很多没有经历过艰苦岁月的晋商后代开始变得“奢”起来。综观《晋商史料全览》,晋商诸家族之衰败绝大多数都与后代奢侈浪费、抽食大烟等有关,他们忘记了先祖创业之艰辛,沉迷于享乐。晋商从事公益活动大多是在商业鼎盛时期,富裕之后的晋商胸怀经世济民之志,懂得财富聚散之理。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

1. 商捐官用

商捐官用是指晋商捐纳财物给官府以便统筹调拨使用。捐纳,即捐钱纳官,明清时期又称“捐纳事例”,简称“捐例”。《晋商史料全览》地方卷共11卷本,涉及晋商家族上百个,几乎所有家族都涉及捐官。晋商捐纳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你情我愿到被迫捐纳。晋商家族的鼎盛时期多在清代,而清代的捐纳制度与富裕起来的晋商的心理诉求相呼应,这个阶段是你情我愿的,朝廷与晋商各得其所。清政府通过捐纳聚集了民间资本,充实了国库,维护了统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晋商通过捐输可承受范围内的财物便可轻易获得官衔,无须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入仕也能光宗耀祖,不但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位跃升为首位,也向朝廷表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为家族财产安全获得了一份保证,还通过朝廷实现了自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正如介休北辛武冀氏家族马太夫人所说的,“时势如此,守钱欲何为,此吾家报国之时

也”^{[4](P235)},并令家族各商号竭力捐资助饷。

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捐纳之弊凸显,晋商捐官积极性骤降,许多晋商被迫捐纳,捐纳之数额有时需倾家荡产。晚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和赈济各种灾荒,急需银饷,对捐输所需价钱折减以致捐官者人数剧增,而捐纳补官却遥遥无期,所捐官职官衔含金量大打折扣,虽然折减了捐输价钱,但实际并没有收集到更多的银两^[5],而清政府又素闻晋商富庶,一到需要银两的时候便盯上了这块“肥肉”,对晋商软硬兼施,迫使其不得不捐输。而对于晋商而言,晚清社会动荡,生意难做,银根紧缩,各地商号倒闭,步履维艰,加之晋商家族诸多子孙骄奢淫逸,染上毒瘾,不懂生意,由盛转衰,坐吃山空,实无大量捐纳之经济实力,再加之晚清政府腐败空前,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晋商即使捐纳了也未必是用于纾解国难,而是落入贪官之手,致使一批有捐纳实力之晋商也不愿意倾力捐资。

2. 宗亲慈恤

宗亲慈恤是指救助族内宗亲。明清时期,宗法鼓励同财共居。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宗族归属的,明清政府鼓励有亲属依靠并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贫穷人员在家接受救助,国家和社会将资金发放到个人手上,并将他们登记在案,实行流动管理,这样既可以节约政府社会保障机构运营开支,也可以让贫穷人员享受到家庭温暖。^[6]然而,由于明清时期政府财政收入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有限,加之社会保障机构的管理水平不高,因此必须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发挥富商与宗族在公益活动中的作用。而富裕起来的晋商在拥有一定财富后,希望通过做善事来改变自身在宗族中的社会地位,在对宗族承担了更多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在宗族事务处理中的话语权,实现了由富民向绅商的转变。

晋商通过义庄等形式对族内宗亲进行有组织且制度化的救济扶助,主要是对同族之人在经济上出现难以维持生计时给予一定援助,包括养老、慈幼、恤嫠、周济婚丧等。对于传统家庭来说,成年男性是家中的经济来源和顶梁柱,而对于晋商家庭来说,由于诸多行商常年在外经营,有的几年杳无音讯,有的几年难回一次家,还有的客死他乡……有些留守在老家的老幼妇孺没有生活来源,经济窘迫,宗族便办义学、育婴堂、普济院、恤嫠会、施药会、助葬会等公益组织对他们进行专项救济。

3. 乡友济困

乡友济困是指对非血缘关系之乡里朋友甚至萍

水相逢之人的救助。晋商公益伦理思想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其从事公益活动的道德基础仍是儒家所倡导的“仁”。儒家主张“仁者爱人”,由“爱亲”而推至“爱人”,不仅要关爱亲朋好友,而且也要关爱陌生人,要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境界,尤其要注重对鳏寡孤独废疾等特殊群体的救助,使其有所养,将无血缘关系的百姓、弱者纳入关怀救济的范围,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理想追求。

晋商救助乡友分一般性救助与临时性救助两种。一般性救助主要是在平常时期,与宗亲慈恤的内容差不多,也包括养老、慈幼、恤嫠、施药、义学、周济婚丧等,是一些晋商对于陷入经济困境的非血亲之人直接给予接济,但与宗亲慈恤不同的是,对乡友的救助力度可能并不如宗亲。有些晋商还会乐于从事其他造福乡里提升自身名望的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修寺建庙、修缮城墙、修纂县志等。很多晋商因为从事钱庄、票号等银钱生意,有时也会蠲免输欠,视情况免除借贷者一定债务,代贫困者交纳欠负和偿还债务,这是明清晋商所从事的一种常见的助贫公益活动。^[7]临时性救助主要是在非常时期。山西历来是自然灾害多发区,据记载,从明代到清代道光二十年(1368—1840),山西省共发生洪涝灾害80多次,地震104次。对灾民的救济主要由官府主导,但是官方机构的赈济远不能及时满足实际需求,而天灾如果处置不当易变成人祸,引发社会秩序混乱,致使敢于冒死作乱者增多,这对富有晋商来说也是一大威胁。因此,有些义商便通过平糶平粜、输粟捐银、施粥舍药、捐席埋骨等方式来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安抚人心,同时也可维护自身家财安全。

三、晋商公益伦理的特征

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总结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从广义的公益伦理来看,从商捐官用到宗亲慈恤,再到乡友济困,其实质是对忠孝悌思想的贯彻。商捐官用是忠的体现,在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舍财忠君报国而非买官求荣;宗亲慈恤是孝的体现,在宗法社会表现为对血亲同胞的关心照顾;乡友济困是悌的体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从对血亲兄弟之悌扩充至四海。儒家“忠孝悌”的核心思想对晋商的影响是经过近千年积淀而产生的,这与个体晋商在明清时期是否重视读书没有必然联系。随着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巩固,为

了钳制臣民之身心,道德教化得到全面加强和普及,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至清将儒家经典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在整个社会风气习俗中早已形成了“忠孝悌”的思想观念,即使没有受过私塾的正统儒学教育、目不识丁的晋商在“忠孝悌”文化熏陶下也耳濡目染,在其人生观、价值观中也自然而然地贯穿这些思想。所以说,就个体而言,是否热心公益事业虽与其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但与整个社会儒家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狭义的公益伦理来看,在晋商群体中,商捐官用、捐修寺庙等举,因其出发点不够无私而被排除在公益之外,而那些称得上现代公益的善行义举者以习儒者为多数,因为“民既富有,读书识字之人必多,人民之知识既富,则公益之事业易举,急公好义之风必盛”^[8],富裕之后的很多晋商尤其是重视儒学教育的家族,比如榆次常氏家族、灵石静升王氏家族等,皆有“达则兼济天下”之理想追求。

第二,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不管是施助者还是受助者,不管是捐纳给官府抑或是天子太后,还是施财给贫困潦倒之饥荒者,在施受之间都有一个平衡点——尊严。公益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是完全无私的,获得尊严在一定程度上是施助者从事公益救助的精神动力;但若是没有照顾到受助者感受致使其尊严不保,那么救助也可能变成了羞辱。人的尊严源于人具有自我意识,形成反思性的自我观念,其形成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与自我有关,自己怎么理解和看待自己;另一方面与他人有关,自我意识的建立有赖于他人对我的行为或看法。施助者可通过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以获得尊严,受助者既要接受救助以解决生存发展危机也要保住自己的尊严。因而,公益活动要尽可能做到双赢。从施助者的角度来看,晋商积极从事公益活动,除了人性本善等无私因素外,还与其现实利益诉求有一定关系,他们将财富作为自己践行优秀道德的物质基础,可通过施舍财富的方式得到社会 and 他人认可,获得社会名望与尊严,强化自我道德认同。从受助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失去尊严的底线认知不尽相同,并非施助者盲目地给予钱物等就能得到受助者的认可、尊重和感恩。在商捐官用类型中,官府常通过授予晋商官衔、旌表、匾额等荣誉、身份和机会来交换晋商捐纳的财物以保住施助者的尊严;普通人则希望通过自己所有(比如劳动力)来获得救助而不失尊严。晋商在从事公益活动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并将其贯穿

到自己的施助过程中。

第三,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不管是明清时期还是现代,公益救助中的一大难题就是可持续性。影响公益救助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费来源和组织管理,晋商通过设专款生息、专人管理的方式来确保了救助的可持续性。比如,灵石静升王氏家族,因静升镇至马和村路经3条小河,溪桥倾毁,行走不便,便捐银200余两,拓宽路面,筑石桥,修水渠,砌护路石坝。两村之民为此感动,纷纷捐地捐物促成此事。道路竣工后,王氏家族恐日后维修无钱,又捐银20两,责成专人放贷,以利息作为每年修缮费用。由于宗族乡党贫富不一,再加之天时难测,难免旱涝之灾,王氏家族捐银300两,作未雨绸缪之计,请乡党、族人公正经理,以息赈饥,又捐银600两,建立义仓,使贫者在歉岁得以永赖。^{[4](P255)}这些银两对于富甲一方的王家来说并不算多,但他们能从经商之道中提炼出公益理念,花了心思,精于经营管理,所以能花很少的钱去办很多事,并具有可持续性,也不再牵扯自身有限的精力。又如,介休北辛武冀氏家族第十七世冀国定有五子,去世时五子皆幼,于是由第四房夫人马氏暂管家业,咸丰六七年间,冀家五子都已长大成人,可以独立支撑门户了,马太夫人便主持给兄弟5人分家析产,全部家产300万两,分为6股,弟兄5人每人一股,家祠另有一股为兄弟5人共有,供祭祀祖先和赡养鳏寡老人等用,兄弟5人中以老四冀以和最精明能干、善于交际,理财之术稍胜诸兄,为此,马太夫人把祠堂股委托给冀以和经营,在他的经营下,祠堂股获利颇丰,在宗亲慈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P234-237)}专款生息,本金不动,用息进行周济,专款专用,救助资金虽不多,来源却源源不断,责成专人对有限的本息进行管理,有效地防止了公益机构的臃肿低效,杜绝了贪腐等弊病的滋生。

第四,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明清时期,统治者有意识地将善书作为劝善教化民众的有效手段,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民俗信仰有机结合起来,用传统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善书盛行于明清时期,“是一种不论贵贱贫富,儒、佛、道三教共通又混合了民间信仰的规劝人们实践道德的书”^[9],善书对晋商公益伦理思想有很大影响,培植了一种善恶因果报应的道德土壤。普通民众并不会去研究善书中的深奥义理,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其中蕴含的善恶报应思想:做了恶事会有恶报,要么现世报要么后世受,所以要少做恶事,多做善事,多做善事终有善报。除此之外,做了恶事,希望通过做善事

来抵消罪恶、消除恶报。由简单理解而行善,有时会与先哲之倡导相背离,比如很多晋商除了热衷于捐官之外,还普遍热衷于修建寺庙,因为修建寺庙具有某种宗教寓意,是积“阴德”,而儒释道三家经典之义并不主张立神像于庙宇中供人朝拜,先哲揭示的是事物发展之规律,而很多人却把规律人格化,变成一个或一些可以“收买”的人格神,具有各种不可思议的本领,能够在一定代价下为己所用,人们相信通过供养神明可以祈求神明为己降福而为他人降灾。如果有些祈求如愿了,那么他们会更加坚定对神明的信仰,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实现了的愿望或许只是事物顺其规律发展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并非人愿的祈求。道德教化虽然旨在引导人们顺应规律,但人们有时背道而驰也能殊途同归,晋商受简化的善恶因果报应思想影响而常去从善便是如此。

四、结语

总而言之,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薛勇民. 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彭柏林,卢先明,李彬,等. 当代中国公益伦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3] 张祖平. 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6,208.
- [4] 山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 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 [5] 杨晓振. 晚清捐官不盛的基本原因[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7):104.
- [6] 张祖平. 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8.
- [7] 师冰洁. 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中小晋商的民间慈善活动[J]. 晋中学院学报,2007(5):49.
- [8] 刘容亭. 山西祁县东左墩、西左墩两村及大谷阳邑镇、平遥县道备村经商者现况调查[J]. 新农村,1935(22):39.
- [9] [日]酒井忠夫. 中国善书の研究[M]. 东京:弘文堂,国书刊行会,1977:43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2-0043-05

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以胶东P市为例

徐京波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赶集路上的交往。这种跟同村的路伴儿或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交往,既巩固了原有的熟人关系,又扩大了原有的社交范围。二是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除趁赶集走亲访友外,村民通过固定市场交易还会建立起一种半熟人关系,这种交往甚至会延伸为在生活上的互助。三是茶铺资讯传播与休闲。茶铺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也满足了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

[关键词]集市;社会关联;人际交往;公共空间;茶馆;基层市场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0

乡村集市不仅是商业活动的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还是人们从事宗教、娱乐及其他与交换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1](P67)];既是农民交换产品、出售剩余产品的场地,也是进行情感交流、与邻居之外其他人面对面交往的场所,是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2]。传统乡村社会是地方性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区域性限制,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各自保持了孤立的圈子^[3]。除了与具有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友和在红白喜事及重大节日上与他人进行社交外,村民与其他人之间的相识、交往特别是村际之间的相识、交往多依赖于集市、庙会等场所。但是,随着农村市场化、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性开始减弱,经济性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村民间的社会互动,也会削弱村际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还会导致村际关系的恶化。因此,在顺应农村市场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场所,恢复农村公共空间,已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学术

界相关研究多将集市界定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或贸易场所,关注集市的属性,而忽视了集市具有的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功能。本文拟采用调查法,对胶东地区P市1940年以前出生的、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经历的农村老人进行访谈,从赶集路上的交往、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茶馆里的信息传播三个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集市作一探讨,以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整合提供参考。

一、赶集路上的交往

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范围可以让最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市上——这段距离为3.4~6.1公里,市场区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8公里左右,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4](P45)]。P市集市与村庄的距离及集市间的距离基本符合上述情况。在传统乡村社会,步行是村民主要的出行方式,特别是在赶集时,由于距离村子较远,而且集市一般在上午开始,午后结束,因此路远的人一大早

[收稿日期]2015-01-09

[作者简介]徐京波(1983—),男,山东省平度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村治理。

就起来准备,赶集的路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曾经指出,“中国人徒步走上三里、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集市,是很不在乎的事情。因为一个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种一般的交流”^[5]。

“赶大集的时候,一般愿意找几个伴儿一块去,要不路上太枯燥了,得找个伴说个话。路途比较远,离俺们村最近的大集也得有八里地,得走上将近一个钟头。路上有几个伴可以说说笑笑,东扯扯西拉拉。当然在赶集路上也会碰到许多邻村的人,这些人有可能是俺的亲戚或朋友,也有可能是俺路上伴儿的亲戚或朋友。这样大家就可以凑在一起赶路,一般越接近集市,结伴同行的人就越多。在路上大家交流着,特别是不同村的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着各自村里的新鲜事。到了集市,由于各自买的东西不一样,逛的小市也不一样,就暂时地分开,各自买各自的东西。大家分开前约定好一个时间和地点,合伙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大家谈论着都是买的什么东西,看到了什么新鲜事,集市上有了哪些变化。”(访谈资料 20120624—ZSC. 20120624 表示访谈时间为2012年6月24日,ZSC是被访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下同)

农民往返于赶集路上的交往是农村集市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赶集路上的交往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相约赶集的同村路伴儿,这些路伴儿一般都是村里自己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邻居或要好的街坊;另一类是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可能是老熟人也可能是新熟人,老熟人是自己在邻村的朋友、亲戚,新熟人往往是一同赶集同村路伴儿的亲戚或朋友,因为在任何一条通往集市的路上都可能会经过三五个自然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相遇在一起,一路上可以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前者可更加巩固原有的熟人关系,而后者可扩大原有的社交范围。

村民之所以能在赶集的路上相遇,而且像滚雪球一样,随着距离集市越来越近,相遇同行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集市的周期性及集市交易时间的短暂和集中。农村集市大多都是半日集,早上开始午后散去,特别是对于要在集市上卖东西的农民来说,他们一定要早起,因为一方面去得晚了集市可能就散了,另一方面到得太晚会找不到位置好的摊位。

“过去赶集卖粮食,特别是冬天,早晨四点多就得起来,天还黑着呢,推着手推车赶路。路上会碰到许多推车赶集卖东西的,大家伙路上边走边聊,搭个

伴儿。如果是常年赶集做买卖的,他们常常能在路上碰到。因为天气比较冷,起的时间又比较早,走到离集市三四里路的地方,一般都有些临时搭建的草棚子,多为饭馆,摊主多是周围村里的人,冬天每逢集日出摊,为赶集的人提供点吃的,顺便歇歇脚、暖暖和和。在这里会碰到更多的赶集卖东西的人,边吃边聊行市、怎么和经纪人打交道等话题。大家一般吃得比较快,不到半个钟头就吃完了,吃完之后继续赶路,回来的路上也会碰到许多卖完东西回家的人,行市好的话大家就会高兴,行市不好的话大家就会埋怨,发发牢骚。”(访谈资料 20121010—XSM)

杨懋春^[6]也曾经对胶东地区的辛安镇集市做过与上述访谈资料类似的描述。每个月的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和三十是辛安镇的集市日。集市日的前一天晚上,专门的流动商贩开始带着货物源源而来。集市一大早,村里的屠夫带着处理过的猪,乡村商人带着几袋小麦粉、几听油、几捆纺好的棉纱,木匠带着自制的农具和家具,纷纷来到集市,通往集市的路上挤满了人。赶集路上的卖家与赶集路上的买家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很少在赶集路上碰面,因为卖家赶集是有目的的,早去能占个好地方、卖个好价钱;而买家赶集的目的性较弱,有时是可买可不买,甚至有的农民赶集就是闲逛、看热闹。因此卖家往往要比买家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集市。卖家在路上讨论更多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与自己要卖的商品息息相关的内容。为了应付集市上的经纪人,卖家会在赶集的路上结成暂时性的联盟。在村落与集市之间有驿站(如路边的饭铺),可为赶集路上的人流提供一个短暂的固定交流场所。到了集市,结成联盟的村民的摊位往往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核算价格并和经纪人谈条件,讨价还价。

二、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

在小生产条件下,小农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7]。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在农时很少有外出交往的机会,平日交际仅限于村头田野^[8]。而每逢集日,本村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可汇集于集市,在买卖之余串亲戚、会朋友,相互寒暄、互致问候,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获得情感交流。可以说,集市扩大了村民的熟人关系网络。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曾经这样描述高店子集市上的林先生:一位45岁的村民,与高店子集市上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能够认出集市上主要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

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子散布于何处。另外,施坚雅还描述过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他们有的已经去过基层市场不止3 000次,平均至少有1 000次,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4](P44-45)}林先生对高店子集市的熟悉以及广泛的社交范围,在P市传统乡村的定期小集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过去咱这个村的集市主要有三个村的村民赶集,也有其他附近村的人来,但是比较少。咱村比较大,人多一些,在集市上得占到四成,马路对面的后庄子村比较小,他们村的人占到咱村集市人数的两成,东边的东岳石村占到三成,剩下一成就是周边河刘村、杨家疃、盆王村三个村的村民。这三个村的村民一般都是家里遇到特别重要的事情时才出来赶集,比如突然来客人了、老人身体不好了,过来买点吃的、用的。咱村、后庄子村和东岳石村的人每月到了初三、初八,基本上家家都要过来赶集,农忙的时候干完农活也要到集市上转转。咱这集市较小,就一条街,三个村的人很容易见面。因为三个村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趁赶集走亲戚的比较多。比如,咱村有出嫁了的女儿,趁赶集买点东西回娘家看看她爹娘,孝敬一下老人,平常不是集日的话买点孝敬老人的东西不太方便。当时俺家两个姑姑都嫁到后庄子村,她们一般都是趁赶集的时候过来看看俺爷爷、奶奶,顺便也给俺这些小孩子买点吃的。”(访谈资料 20121230—LCJ)

参加集市活动后,顺便拜亲访友是集市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农民家庭在邻村都会有一些亲缘关系远近程度不同的亲戚,这些亲戚大多是姻缘延伸的亲属关系。村民之所以会选择在集市上拜亲访友,一方面是因为集市上较为丰富的商品可以为探亲访友提供礼品,传统乡村社会崇尚礼尚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集市日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亲朋好友之间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在集市上碰到亲朋好友也不一定都要登门拜访,而是利用集市这一平台定期见面交流,以免生疏,这种相会可以代替花费较多的拜访,同时也节约时间和礼金。

在集市上除了可与已有的朋友、亲属交往外,还可与一些半熟人交往,这些关系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例如,集市上存在的“老主顾”关系,交易地点的固定化,导致了交易行为的观念化,一个区域的集市一般是周围村庄农民大致一天路程所能往返的地方。在集市日人们会自觉地赶往集市所在地,光顾固定的摊位,与固定的卖

主或买主打交道。通过长期固定的交易,人们之间会形成较为稳定的买卖关系。

“集上卖东西的好多人俺都认识,咱这集市上卖肉的有三家,俺一般都买王各庄老王家的猪肉。每次去他都会多给点,挑最好的肉卖给俺,钱不够也可以先赊着,下个集日再补给他。老王除了卖猪肉还帮别人杀猪,有的年份家里收成比较好,到了过年就会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并分一些给亲戚朋友和要好的邻居。因为自己不会杀,一般都会提前在集市上和老王说一下,到时候让他过来帮俺杀猪,他也不要钱,不过走时俺会把一些猪下水送给他,以表示感谢。”(访谈资料 20111214—WJG)

“俺是常年赶集卖干海货的,虾皮、鱼干、干蛤蜊肉都卖。每个集市上都有俺的老主顾,他们常年买俺的东西。卖给老主顾的时候一般都不计较,多给点无所谓,挑好的给他们。他们也经常帮俺忙,特别是集市所在村的老主顾,有时候会帮我提前买个地铺,交个地铺钱,俺随后把钱还给他们。腊月集市时间一般比较长,有时得赶到下午四五点钟,有时老主顾会帮俺把家里带的饭热一下,给点热水喝,可以说也是朋友吧。”(访谈资料 20120720—JTG)

通过固定市场交易建立起来的“老主顾”关系,既不是一种两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偶遇关系,也不是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就再不联系的关系,而是一种半熟人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认识,认识后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往但并不频繁的一种关系状态^[9]。这种关系因交易而发生,交往的周期主要为集市周期,交往的地点主要为集市场地。随着相互之间关系的日趋稳定,情感的加深,这种交往也会延伸到集市之外的生活领域中,交往方式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互助。当然这种互助的层级较低,一般是一方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另一方;互助的频率较低,多半是暂时的,具有一定弹性。除了上述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外,集市上还存在着泛泛的社会交往。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10]曾经引用饱含哲理的俗语“既想着自己,也想着集市”,来表明集市对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正如一句意大利谚语所说的,聪明人“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集市上有朋友”。其实,有些农民赶集可能并不从事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仅仅是趁赶集之便,结识志趣相同者。他们的赶集买卖事少,聚会事大^{[1](P138)}。可以说,集市交往突破了以往以家庭为场所的宗族血缘式交往,扩展了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

三、茶铺里的闲聊与信息传播

茶馆是现代中国服务性行业最常见的词,其实茶楼、茶室大多聚集在县城,在一般传统乡村社会的集市里最常见的是茶铺。农村茶铺是一个露天场所,上面有一个棚子遮风挡雨,当天冷的时候,会在周边用帷子围起来。农村集市除了茶铺,还有露天的小酒馆。这些地方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而且价格便宜,还可以满足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

“咱村的集市小,没有茶馆。离村六里路的高望山集上有三个茶铺,赶集的人,特别是男人,赶完集都会在茶铺里坐坐。这些茶铺里汇集了周边七八个村的人,大家有时候喝到下午,有时候集散了,茶铺、小酒馆还开着。喝茶也便宜,交一碗的钱,随便续水。俺经常去的茶馆是俺邻村人开的,老板比较熟,另外两个茶馆去得少,只有这个茶馆人满的时候才去,茶馆里既有自己的熟人,也有点头之交、混个脸熟的。喝完茶在回家的路上也会碰到一些醉汉,在小酒馆喝多了的。集市上的小酒馆和茶铺只在赶集的时候开,平常日是不营业的。”(访谈资料 20130709—WHF)

茶铺是赶集的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大多数的谈话也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加入这种茶铺的闲聊也不需要任何准备和资格^{[11](P76)}。尽管如此,茶铺里女性顾客还是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2]在对江村周围集镇茶馆的描述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形:江村的男人们在农闲时会到集镇上的茶馆里喝茶,偶尔有少数妇女也会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妇女在农闲时更多是走亲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可以说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

“在茶馆里,男人们不用听家里女人的唠叨、孩子的哭闹,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之间可以随便调侃。在穿着上,也可以比较随便,天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膀子,大家都一样,这在有女人的场合是很少有的。俺爹当时在夏邱集上开了一个茶馆,俺也经常过去玩,俺有个姑姑在那里帮忙,他们就经常调戏俺那个姑姑,后来俺爹担心,就不让她干了,在村里找了两个男伙计。”(访谈资料 20121222—LWF)

其实,乡村集市的茶铺并不像城市里的茶楼,是有闲阶级消遣的地方,而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茶客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来自农村的各个阶层^[13],但女性群体多被排斥在茶馆这一圈子之外。费孝通^{[3](P62)}认为,这种男女有别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一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后果。对茶馆里男人的无拘无束,王笛^[14]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去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要理发,即使剪掉的头发会落入其他客人的茶杯里,也可以叫上剃头匠到座位上为他服务;甚至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挖鸡眼、削茧皮也无伤大雅。另外,由于茶客中很少有异性,有时候倒茶的少妇会成为大伙开玩笑的对象,所开玩笑总是与“色情”擦边,是乡土观念的庸俗性的表达^[13]。

茶铺在为农民提供闲聊空间之外,还为农民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不同村庄的农民在茶铺里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回家后将其汇报给自己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村民间可以相互了解。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周围社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便可以去茶馆。茶馆既是获得消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11](P77-78)}。

“茶铺里面不同的人会谈论不同的事。经常在家种地的人一般是三五个人在一起聊些家长里短。聚在一起人多的时候,主要听常年在外地做买卖的商人讲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让大家伙看看从外面带回来的洋玩意,如卷制的烟卷,顺便分给大家尝尝。一些有点文化的人在茶铺里会讲一些国家大事,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到咱这里,分析一下国家老吃败仗的原因,再结合古代战争情况讲讲古代某个大将军的厉害。还有的人喜欢结合当地情况讲一些鬼怪的故事,而且讲得还很逼真。”(访谈资料 20121224—根据四个访谈对象的口述整理获得)

可见,茶铺里会谈论各种话题,从日常生活到国家政治再到妖魔鬼怪,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生活习惯及历史文化。可以说,茶铺是集市上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或真实或虚构,都在这里汇集、交流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更多社区之外的新信息也会在这里得到传播,一些常年奔波于城市与乡村集市之间的本地商人是这些外部信息的主要传播源。这些外部信息在茶铺里一经传播,当天晚上就会被回家的茶客带到各个村庄,并很快会在各个村庄流传开来。茶铺里的言语之所以会实现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是因为这里的言语不是语言,没有完整的结构规则,是一种言语实践。日常生活的基本展开形式就是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本身就是一

种交往行为^[15]。通过言语交往,茶铺成了地方公共舆论的制造中心。

四、结语

传统乡村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局限于生活劳作的村庄内,基本上全年都处于一种忙碌状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使得农村社区成为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甚至村与村之间的往来很少^{[3](P3-4)}。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直接来往虽较少,间接交往却普遍存在,大多是以集市为媒介的。人们在集市中进行交易,同时也会在集市做其他社会性的接触^{[1](P138)}。集市的存在使得农民生活并不局限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一个集市所覆盖的一大批村子里^[16]。可以说,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实现了村庄间的联合,使农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资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当今,随着集市社会功能的弱化,村际间社会关联逐渐减少,基层市场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逐渐降低,导致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消解。如何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恢复农村公共生活,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公共性场所重建是否可以兼得,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集市的社会功能得到一定恢复,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危机。

[参 考 文 献]

[1] 李正华. 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二十世纪前半期华

北乡村集市研究[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 [2] 蒋超. 公共生活的变革:一个西南农村定期集市的兴起与衰落[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6):124.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7.
- [4] [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 [美]明恩溥. 中国乡村生活[M]. 陈午晴,唐军,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33.
- [6]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86.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 [8] 岳懋厚,郝正春. 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陕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86.
- [9] 刘少杰. 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1.
- [1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C]. 顾良,施康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
- [11] 王笛.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2]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9.
- [13] 万振凡. 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26.
- [14] 王笛.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 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2.
- [15] [德]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张博树,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
- [16] [美]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48-05

浸润于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村民自治研究

——基于对贵州苗族地区D村的实证调查

赵超, 张静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村民自治是保持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和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然而, 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异的民族政治文化深刻地制约着村民自治的运行和发展, 主要表现在其对村民自治体系的合法性、村民自治体系的输入和村民自治体系输出的影响。为了促进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 必须注重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 着力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加对村民自治体系的输入, 吸收民族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提高村民自治体系的合法性, 强化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增强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

[关键词] 民族政治文化; 村民自治; 政治系统论; 参与型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33.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1

村民自治是非国家政权性质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 其运行状况关系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村民自治的良好运行是民族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广大民族地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 使得人们形成了对政治生活特定的心理态度和价值取向, 即民族政治文化, 从而制约民众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体系的运行, 影响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长期以来, 诸多学者从国家/社会、基层民主、乡村关系和两委关系等宏观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了研究, 关注村民自治对于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价值, 但极少有人注意到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事实上, 村民自治主体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为都要受到特定政治文化的支配, 民族地区则尤为明显。因此, 本文拟在对贵州苗族地区D村调研的基础上, 以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从民族政治文化这一视角来分析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困境, 旨在寻求推进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民族政治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来自民族内部和族际的各种矛盾与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与挑战, 必须建立一定的政治组织、构建相应的政治秩序, 以对民族共同体进行必要的整合, 或者通过战争、妥协等方式解决族际问题来维持民族共同体的稳定。这样, 民族生活就会被打上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民族成员即使消极对待政治, 甚至逃避政治, 但是无法避开政治的影响, 诚如周平教授所言: “民族的政治过程和民族的发展始终相随。”^{[1](P2)} 尽管民族间的政治生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仅源自于不同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生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 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在于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 “对民族政治影响最大、直接导致了民族政治生活突出的差异性的因素, 还是各个民族的政治态度倾向, 即民族政治文化”^{[1](P200)}。民族政治文化为何能够对民族政治生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民族政治文化是民族共同体对现阶段的政治过

[收稿日期] 2014-11-30

[作者简介] 赵超(1990—), 男(苗族), 贵州省三穗县人, 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政治。

程和政治体系的主观取向,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民族成员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并通过家庭、学校、民族团体等政治社会化媒介接收相应的政治文化,获取一定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和技能,从而形成对政治较为固定的行为模式。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56个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但由于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各民族政治文化之间是相互契合而非分裂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是国家统一政治文化中的亚文化。各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由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有诸多相似性(如多居于偏远山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历史上与汉族有着相似的族际关系等),因而少数民族间的政治文化差异性小,而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政治文化差异性则较明显,有必要对民族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民族政治文化形成后不会消极无为,相反,它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民族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3]政治文化是这样,民族政治文化亦如此,它会对民族成员的政治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民族成员采取的政治行为。换言之,民族成员在过去的政治经历中所形成的政治取向会对当前和未来的政治行为产生无形的强制作用,对民族成员个体而言,主要是影响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适度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表达民族成员的利益诉求,而且也是政治决策中心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所需的重要信息来源。然而,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是动员式的政治参与,人们热衷于参加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笔者在贵州苗族地区调查发现,那一带的苗族村寨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民族活动,附近的民众也乐于参加,参加宗教活动的热情也很高,不管是子女升学、找工作还是家中发生的小变故,往往都要占卜问卦、求佛拜祖;村中的纠纷也多依靠寨老、家族中的长者来协商解决,极少“惊动政府”,有些村民甚至从未参与过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投票工作,更别说主动监督村干部的工作了。

民族政治文化不仅对民族成员个体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民族地区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在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中留下深深的印迹。任何政治体系的有序运行都必然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作支持,如果只注重政治体系刚性权力的强化而忽略政治文化软力量的建设,则会引起政

治统治成本的大幅膨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政治文化要求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民族的政治模式完全运用到另一个民族,除非民族间除了名称有别之外已经不存在其他的差异。深入民族地区观察,不难发现民族政治文化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民族政治文化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执行,若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与民族政治文化的潜在要求大相径庭,这样的政策便难以推行。例如,苗族传统文化中盛行平均主义的观念,这是一种“历史记忆”,但其仍然作用于人们而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笔者注意到部分苗族村寨的村民在分配农村低保这一国家输出的政治产品时仍采用按户均分的方式;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民众对待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产生抗拒的政治态度,从而使得该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的难度较大。周平教授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发现:“许多在别的地方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建设措施在少数民族地区就难以推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少数民族有着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相异的民族政治文化。”^[4]民族政治文化具有的这种无形力量使其成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民族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民族政治文化对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与民族地区民众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民族地区最大的“众人之事”。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与人、人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所结成的一套政治关系模式,既然其主体是人就难免要受到自我意识的支配,对于笼罩在具有浓郁民族政治文化氛围的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来说,必然会受到民族政治文化的渗透而产生比一般的非民族地区复杂的政治过程。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过程中试图分析民族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其难度是很大的。不过,政治系统论把政治过程看作政治体系从环境中输入“养料”进行加工后输出政治产品再作用于环境的过程,其方法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种分析方法可从动态的角度对政治生活进行全面分析。村民自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体系,它是在村社范围内由一定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组成的,因此,可以从村民自治这一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输入与输出三个维度来分析民族政治文化对它的影响。

1. 民族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体系合法性的影响

合法性是每个政治体系重要的价值追求,只有

具备一定的合法性,一个政治体系才能有效运行。在民族地区,只有民族成员接受、认可的村民自治才具有合法性,反之则不合法或者说存在合法性危机。一般来说,合法性的类型有三种:传统型合法性、法理型合法性和个人魅力型合法性。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应属于法理型合法性,即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由民众选举而产生。然而,在多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体系却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首先,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对村社影响较大的传统组织,如苗族的寨老制、瑶族的目老制、彝族的诺合家支制、基诺族的长老制等。这些组织分享了村社中本就不算多的权威资源,从而造成了权威资源的分散化,如村社中的纠纷、利益表达,多通过传统组织来完成。笔者在贵州苗族地区调研发现,D村中诸如财产纠纷、婚姻调解等,多是依靠寨老和族中长者来解决的,在多数情况下寨老比村干部更有权威。其次,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的传统精英人物,如族长、寨老、巫师有很高的政治信任,而村组织和村干部等政治角色由于与乡镇一级政府的特殊关系使得民众对他们缺乏信任。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以前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非常严格的时期,催粮要款成为村民自治组织实际的职能,使其具备了乡政府“派出机关”的性质。即使农业税的取消使得干群关系有所缓解,但是民众在过去的政治经历中所形成的政治取向不会马上改变,因而对村民自治的认同会受到影响。再次,上级政府对村干部换届选举的干预使得村干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尽管国家法律规定农村地区可以自己选举产生村干部并自我管理公共事务,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村干部的候选人是由上级部门指定的,民众的选举只是形式。比如,D村中的赵某十多年来一直担任着村支书或主任一职,与上级政府部门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为上级部门的“御用人才”,这样的村干部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本来就属于臣民型的政治文化,村民不积极参与政治,再加上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失望,从而使得村民更倾向于向传统组织、宗教领袖、家族等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民族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体系输入的影响

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必须从环境中接受一定的要求和支持,作为对其合法性的输入,以便获得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必要养分。然而,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对输入的取向是相当消极的。^[5]在民族地区,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浅,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高,政治效能感也比较差,诸多问题不是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风俗、习惯等途径来解决。笔者在D

村调研时便目睹了“神判”这一苗族传统解决纠纷的神秘方式:该村的赵某怀疑刘某偷了其木材,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双方争执不下而请了村中的寨老主持神判仪式,通过杀鸡后看鸡临死时鸡头对着谁的方式来判定胜负。民众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对于村民自治存在着诸多消极影响。首先,向村民自治体系输入要求和支持是其能够做出合理的政治决策的重要条件,“要求”的重要性就如生产产品必须要有原料一样,如果村民自治体系不能获得民众的政治要求,其政治决策则不过是闭门造车罢了。在许多民族地区,纠纷和矛盾多寻求传统组织和根据风俗习惯来解决,很少通过村委会解决。在D村,多数村民除了要盖章、索取各类证明材料之外很少与村民自治组织打交道,更不用说向其表达利益诉求了。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形同虚设,根本不起作用^{[4](P249)}。其实,民族地区的民众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但是,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向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表达还是向传统宗社组织表达就会受到民族政治文化的约束。其次,民众除了很少向村民自治体系表达利益诉求之外,对于村民自治体系运行过程中的投票、选举等政治过程也很少参与。有学者在湖南省永顺县布依族司城村调查发现,该村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参与度较低:到会的村民只有50多人,到会人员只占全村总人口的11.5%。^[6]在D村,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去参加选举”时,许多村民的回答是“选来选去就那几个人,谁当都一样,对我没什么影响”。除了领导人的选举与村民的利益关系不大之外,长期以来民众所持的对政治无所谓的态度、缺乏公民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 民族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体系输出的影响

政治体系输出的主要形式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形成以后就要进入执行阶段,也即输出阶段。在多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对政治体系的顺从或漠不关心,表面上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配合,似乎政策能够得到顺利推行,但是这种被动式的服从只不过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免受抗拒罢了,如果要使公共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就不得不考虑民族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在村社中出现一定的公共问题后就需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来解决,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不考虑民族的特殊性和民族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力,则其政策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作为村民自治重要政策输出形式的村规民约,如果其价值取向与民族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那么这样的政策便难以执行,即使强制执行其效果也微乎其

微。在D村,为了执行乡镇部门作出的关于清明节祭祖期间严禁鸣放鞭炮和户外使用明火的决定,村委会制定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村民祭祖时诸多不当行为的村规民约。但是这一政策难以得到村民的认可,因为政策的制定者们忽略了苗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祖先崇拜意识的民族,不按老规矩进行祭祖活动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尊重,要被祖先“惩罚”。贵州苗族地区普遍存在结婚礼钱过重的问题,2009年多地苗族民众是通过召开苗族传统的议榔大会形成榔规而不是按村规民约来解决该问题的。

尽管民族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但其亦有着积极的一面。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民族政治文化对保持农村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政治文化中顺从型的政治取向可限制过度的政治参与,这为制度化水平仍有待提高的村民自治的完善赢得了时间。如果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水平没有足够的容量容纳和吸收较高的政治参与,那么极有可能会造成村民自治的崩溃,从而引起民族地区社会的失范。民族政治文化中对传统精英人物的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掉村社中的矛盾和纠纷,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如果村民自治不能解决民众的纠纷和利益诉求而在村社范围内又没有其他的组织来填补村民自治的“真空地带”,那么极有可能会形成无休止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民族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的潜在要求也能够帮助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从动态的角度看,任何制度只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革才能适应新环境。因此,民族政治文化对于村民自治亦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只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民主政治的发展终究还是要以村民自治为主的法理型权威取代民族政治文化所体现的传统型权威。

三、重视民族政治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政治文化滞后于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对村民自治的运行和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阻碍作用,这是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村民自治在法理上作为保障和实现村民利益强有力的政治屋顶,其发展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发展。要使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运行和发展卓有成效,我们就不能不重视民族政治文化的建设,只有当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与村民自治相适应时,村民自治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可以从培养参与型政

治文化、吸收民族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和强化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三个方面入手。

1. 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加对村民自治体系的输入

民族地区人们对待政治消极、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的参与度低,一方面是受民族政治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成本—收益原则的影响。民族成员也是“理性经济人”,参与政治需要付出机会成本(比如可以利用参与政治的时间从事农业、商业活动),并且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如在参与选举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威胁。如果人们参与政治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收益不大,那么人们是不愿意参与政治的。在相对发达的非民族地区有乡村工业、矿产资源等,由于人们参与政治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直接的利益,因而人们乐于参与政治。民族地区往往由于公共资源稀缺,人们参与政治的收益极小,因而多数人宁愿选择外出务工也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比如在D村,除了有一些公共山林、公共土地、国家农业补贴和农村低保等之外,已经找不到其他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因而村民们对于谁当村干部都持无所谓的态度。“我花大力气去争的那点东西还不如我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呢”,村民的话语便体现了这一点。要真正培养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就要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使村民自治组织能够支配足够多的资源,从而让村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获得明显的收益,一旦人们参与政治成为一种习惯后,这种习惯便难以改变,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自然就形成了。与此同时,还应拓宽民众参与村民自治表达利益的通道,提高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水平。民族地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不仅能够使得人们倾向于向村民自治体系表达利益诉求,减少对传统组织的依赖进而促成法理型权威的形成,而且可增加对村民自治政治体系的输入,这对于赋予公共政策制定以更多的合理性大有裨益。

2. 吸收民族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提高村民自治体系的合法性

民族成员对民族传统精英人物高度的政治信任主要是在民族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尽管民族地区村民自治体系的领导人多数是本民族的,但因这些领导人与上级政府部门往往存在着微妙关系而使其政治角色功能发生异化,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将少数民族的传统精英人物纳入村民自治体系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这可以有效地将民族成员对于民族和民族精英人物的政治认同情

然地转移到村民自治体系中。事实上,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期待民族精英人物能在政治活动中做出多大的贡献,而在于这一做法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村民自治作为民族地区的一项“外来”制度,也需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要善于汲取并转化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积极性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或伦理道德,使之合法化和正规化,成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资源。^[7]民族政治文化中的原始民主政治取向是可以利用的有价值的成分。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上形成了与汉族地区相异的自治制度,如苗族的议榔制度、瑶族的目老制度等,这些自治制度因其能顾及到民族的特殊性和贴近本民族风俗习惯,在运行过程中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因而都得到很好的遵守和执行。在会议和决策过程中由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每户一人参与讨论村社中的重大问题,与会人员都能平等、自由地发表言论,共同制定出相应的办法,体现了一种原始民主的决策过程。这样的原始民主取向会对村民自治体系的运行产生作用,即要求村民自治的政治过程中也要与传统的议事决策过程相一致或类似,但事实上很多民族地区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是几年开一次,常常沦为形式。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将少数民族传统自治制度中合理的会议制度、决策方式、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等借用到村民自治中,制定一些符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操作措施^[8-9],这样不仅能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得以落实,保持民族的多样性,而且能够增加民众对村民自治的认同,提高其合法性。

3. 强化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增强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

村民自治是国家宪法赋予村民管理村社公共事务的权利,是公民权的体现,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为了强化对这一权利的认识,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和国家意识,必须对民族政治文化传播的途径——政治社会化进行一定的干预。在民族地区,主流政治文化与民族政治文化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分野在于对家庭、同辈团体、民族团体的影响力,在这些方面我们难以对之进行影响,但是在诸如学校、大众传播媒介、政治事件等方面则可以有所作为。政府可以通过这些途径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特别是学校应该系统地对学生传播政治知识,培养他们的民主、法治观念和对政治体系的感情。党和政府也应有效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网络、报刊等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灌输相应的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在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主要限

于电视,而网络和报刊等在多数地区尚未覆盖到,政府应改善这些地区的通信设施条件。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对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传播过程进行干预,增强民族地区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尽可能减少民族政治文化与村民自治运行的不同步性、摩擦性,使民众关心政治生活,以便促进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村民自治的运行和发展。总之,从民族政治文化的视角寻找解决当下民族地区村民自治运行和发展中的问题,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来构建适合村民自治运行的政治文化是比较合理的路径选择。

四、结语

只要民族间的差异一直存在,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异的民族政治文化必然也会持续存在。要促进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发展,应强化主流政治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作用,以便培养和树立国家政治权威。与此同时,应充分吸收民族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将主流政治文化和民族政治文化进行有效整合,不仅有利于国家权威的树立,而且也符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主流政治文化与民族政治文化的整合状况,至于具体如何进行整合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周平. 民族政治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2]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霖,郑世平,公婷,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 [3] 王沪宁. 比较政治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56.
- [4] 周平. 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论[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 [5] 周平. 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92.
- [6] 瞿耀莲. 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湖南西部永顺司城村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2004(3):26.
- [7] 戴玉琴. 政治文化视野下对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J]. 贵州社会科学,2007(6):9.
- [8] 康耀坤. 论我国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建设[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3.
- [9] 王江成,李怡婷. 家庭势力影响下的村落治理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2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53-05

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加快推进 新村融合的对策与建议

——以浙江省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为例

王丽琴, 王凯元, 张光彩

(中共仙居县委党校 教务科, 浙江 仙居 317300)

[摘要] 行政村规模调整不仅意味着政治空间的重组和经济基础的转变,还将带来传统村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变迁。选取浙江省仙居县作为个案调查对象,通过对其行政村规模调整的村庄类型、村庄内社会基础的差异及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考量发现,其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新村融合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干群思想上尚未真正合并统一,集体“三资”尚未真正融合,新村建设规划尚未作相应合并调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配套。针对这些问题,建议采取如下举措以加快推进新村融合,巩固和扩大行政村规模调整成果:一是创新财务机制,加快“三资”融合步伐;二是充分尊重民意,合理调整新村规划;三是加大社会事业投入,破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四是重视离职村干部作用,引导新村班子树立“新村一盘棋”的工作理念。

[关键词] 行政村规模调整;新村融合;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2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自然村落逐渐萎缩乃至消失,出现了富村兼并穷村、大村兼并小村、自然环境优的村兼并自然环境劣的村的现象。随之出现的行政村规模调整遇到诸多阻力和问题,调整后的新村融合也颇为艰难。

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村规模调整后的新村融合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如王小军^[1]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突如其来的村落组合打破了村民的固有生活边界,迫使村民多年建立的社会网络发生变化,村民的认同感降低,对村民的心理会产生较大冲击;而张春兰等^[2]通过典型试点调查发现,迁村并居后村民的社区适用性总体上也不太理想;吴理财^[3]则从历史基础的角度强调“自然村”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意义,认为“自然村”是在农民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行政村建制虽然改变,

但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乃至地缘认同并未随之改变。已有研究多是从一般意义上进行探讨,就某地全域的行政村规模调整做系统梳理的个案深入分析不多。本文拟以浙江省仙居县全域行政村规模调整为分析样本,通过对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村庄类型、村庄内社会基础的差异及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考量,发现新村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为新村融合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路。

一、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基本情况

行政村规模调整虽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村大小和数量的调整,但它绝非简单的村庄数目减少和规模扩张,而是试图通过数个村庄的资产重组、结构调整和治理体制的变革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

[收稿日期] 2014-12-02

[基金项目] 浙江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十六批规划课题(ZX16225)

[作者简介] 王丽琴(1970—),女,浙江省仙居县人,中共仙居县委党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管理。

适度规模经营。仙居县的行政村规模调整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仙居县“绿色发展、科学跨越”的现实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仙居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仙居县围绕“规模调大、布局调优、班子调强、发展调快”的总体目标,本着有利于发展、管理、稳定的原则,开展了行政村规模调整。2013年4月,仙居县正式开展行政村规模调整前期工作,调查农村集体“三资”的登记工作和先期摸排工作。到8月份,仙居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行政村规模调整。至9月中旬,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全县行政村数量由原来的723个减少至418个(其中行政村建制403个,农村社区15个),调减幅度为42.2%,行政村平均人口由原来的620人增加到1112人,村域平均面积由原来的276万 m^2 扩大到496万 m^2 ,较好地实现了平稳过渡。至10月底,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进入后期完善阶段。

通过行政村规模调整,仙居县域内的土地、劳动力、资金、产业等生产要素,以及各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得到了有效整合,促进了区域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各新村总体上都呈现出了平稳、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这只是调整工作的第一步,如何让新村融合得更好、发展得更快、达到调整之初预设的目标,是当前摆在仙居县、乡(镇)两级党委、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新村融合存在的问题

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完成至今已近一年,从各村运行情况看,总体状态良好,村庄布局更加合理,运行成本有效降低,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为更好更快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村融合程度普遍较低,尚未形成新村一盘棋的工作格局。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新村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干群思想上尚未真正合并统一

“熟人社会”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在熟人社会里,人们会按亲疏、内外、生熟程度区别性地对待与之交往的不同对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构成了一张张看不见的关系网。^[4]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农村社区为村民

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前提,因为合作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的前提则是熟悉。

行政村规模调整后,部分村民仍认为行政村规模调整只是村名等形式的变化,自身并无成为新村村民的感觉,缺乏对新村的归属感、认同感。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村域面积扩大,村民人数增多,客观上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例如,合并规模最大的下各镇下各村,由原来的9个行政村合并在一起,人口达5880人;溪港乡的永溪村,由原永溪村和栗树坑村合并而成,两村相距十几公里,再加上长期受地域、血缘、宗族关系的影响,少数干部群众对新村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村级组织换届后,村庄的直径变大,村民互相之间的熟人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但乡村社会已经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和改变交往方式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区”。由此,基于熟悉而产生的信任因“熟人圈”的萎缩而局限于相对狭窄的场域之中。新村干部主要来自大村,对于原本不属于本村的事务,存在不想管也管不了的心理。如白塔镇,新村干部来自小村的最多只有两个,有的甚至一个都没有。有的大村产生的干部不愿管小村的事务,有的又难以插手小村的事务,而小村产生的干部要管大村的事务更是难上加难。少数新村干部缺乏新村一盘棋的观念,在村务议事中过多地考虑原村的利益,导致班子意见难以统一。有的村碰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找老村干部处理,只听老村干部决定,加之新村干部间缺乏共事交流,导致新村村委会管理工作不够规范。此外,全县范围内还有1947名村干部在换届选举后离开了干部岗位,他们中有的人对新村干部工作不很配合、不够支持。

2. 集体“三资”尚未真正融合

集体资产处置问题是撤并行政村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也是村民和村干部最关心的问题。^[5]“三资”(资金、资产、资源)融合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并村不并账,给人造成并村未并心的印象,使新建制村成了一个“空架子”,影响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发展。

仙居县在行政村规模调整时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融合方式,即简易直接融合、协商协议融合、分级核算融合和股份合作融合。其中,简易直接融合是一种真正的完全的融合,但很遗憾,采取这种方式融合的没有一个村;协商协议融合的也只有18个

村,仅占新村总数的10%;有153个新村因原先各村之间集体资产差异较大甚至悬殊,都采取了分级核算的资产融合方式,占新村总数的90%,这无疑在平稳推进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分级核算说到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融合,因为资金、资源仍然在原村,新村只是一个“空壳村”。也正是由于资金、资源大多掌控在原村,新村干部的作用难以发挥,村级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难以开展,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也难以在基层落实。

3. 新村建设规划尚未作相应合并调整

由于部分村“两委”干部对村情的掌握仍停留在自己所在的原有村庄,因此很难提出有利于新村发展的整体规划。行政村规模调整后,从总体上看,各村尚未对村庄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作调整。一些由多个行政村撤并成立的新行政村普遍还未制定出新的总体发展规划,都还存在具体的“向哪儿发展”“怎么发展”等实际问题,新村资源配置的作用未能很好地体现。

此外,由于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时间不长,各类建设项目多以原村为单位进行安排,项目申报和实施也以原村为单位进行,导致新村无法统一申报和规划村内的建设项目。村庄合并后,如不突出中心村地位,不以新村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不仅不利于新村的融合与发展,而且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4.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配套

曲延春^[6]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体现在供给不足、供给主体权责失衡、“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偏离农民需求等方面。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后,以村级办公场所为例,同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原村规模、实力相当的村合并后,由于中心村的地位没有确立,在选址上存有争议,导致有场所无落实。一些老村依旧挂着老村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牌子,新村的村牌、路牌等尚未正式挂牌安装,容易给村民带来未完成撤并调整的混淆感。如湫山乡的大高尖村、胜利村都是由原来的三个村合并而成,目前办公地点都暂设在溪口张乡政府边上。二是合并规模大的村,沿用某个老村原有的办公场所空间有些狭小。如下各村由原来的9个村合并而成,朱溪村由原来的7个村合并而成,新村党员人数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原有的某村办公场所已经满足不了各类会议和组织党员学习及开展各种活动的需要。三是要求新建办公场所。有的村干部老村观念

强,谁也不愿意到别的村办公,希望在各调整村之间的中心地带新建一座办公楼。这些问题如不尽快予以解决,势必会影响新村的正常运行。

正如蔡晓莉^[7]所言,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施行对村政府公共品供给并没有很强的积极影响。在其他公共物品的配置上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供给困难,有些原村委会主导实施的项目或在行政村规模调整前开始实施的项目,并村后的村委会不予支持,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例如,在皤滩乡某村,行政村规模调整前,原来的小村村书记参与组织了该村某建设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适逢并村,并村之后,该村书记成为了合并村的村监会主任,而村主任和书记都由其他合并村的人担任,由于其他两个村并不愿意支持该项目建设,致使该工程目前仍处于停工状态。

三、加快推进新村融合的对策建议

农村社区的发展是国家介入和村庄内生力量共同推进的结果。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就是政权重心不断下沉的过程,而基层社会的发育则从市场、民间获得了更大的体制空间,从而形成了自身的资源吸纳能力与利益表达途径。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共同参与、合作共赢的过程。农村社区的发展是农村社区居民以积极行动改造社区、使之更适合于环境和人们生活愿望的过程。经过行政村规模调整后的新村能否真正实现融合、进而带来农村社区的发展,事关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为加快推进新村融合,巩固和扩大行政村规模调整成果,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创新财务机制,加快“三资”融合步伐

行政村规模调整先行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资产融合越早越好,如果在调整之初不能实现完全融合,那么今后实现融合的难度会更大。目前,仙居县实施的行政村规模调整采取的是“先并村,后并产”的办法,集体土地、山林、村公所等集体资产在一开始并没有合并。因此,仙居县政府应研究出台“三资”融合的实施细则,指导各村实现资产真正融合。对于人均资产差不多的各调整村,县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一次融合到位。仙居县委、县政府应出台相关补助办法,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力争用3~5年时间实现全部融合。为提高各村“三资”融合的积极性,在各类项目安排上也应优先考虑已实行完全融合的村。同时建议以原村名义上报的项目一律不予批准,各类补助资金也应明确补到新村,由

新村统一支配。

应该对合并村的村级财务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摸清家底,建立统一账户。通过清理核实,达到账账、账款、账物、账表、账据五相符。清理结束后,可以设立一个新村账户,停用原来的村级财务账户,将原账户上的钱款转移到新账户。如转移钱款实在有困难,可以先设立新账户,并村之后所涉财务款项经由新账户收支,原来村级财务账户中的钱款可用于解决原村中的遗留问题,不进新钱。如在白塔镇高迁村,便是在原有账户不进新钱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新的账户,新进钱款统一经由新账户收支。

2. 充分尊重民意,合理调整新村规划

行政村规模调整在一定意义上破除了政令输送链上的“肠梗阻”,但民情民意也可能被阻隔。并村之后,传统的家族势力、宗派势力难以左右全局,对于政令畅通和组织意图的实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对于民情民意的了解、掌控和上达不见得有益。家族、宗派势力干扰正常选举应该摒弃,但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却需要理解和尊重。不同家族、宗派势力博弈的结果只要是采取正当的方式进行的,未必要一概否定。当然,如果能够做到上级意图与民意选择完全统一,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不可,那么还是该多尊重村民的自主意愿和自主选择。因此在新村规划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村民意见,从实地掌握情况,从村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以促进新村融合为导向,以中心村建设为重点,按照现行区域情况和人口集聚的要求,组织力量科学编制统一的村庄规划,让新村村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并村后的积极变化,自然地融入新村。

3. 加大社会事业投入,破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应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应以新村的名义统筹安排好各项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以事业聚人心、以服务暖人心的目的。但是并村之后,由于各村原先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并不一致,存在需求差异,加上村庄的日益空心化,以及由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村民共同体意识薄弱,村民自治受到干扰^[8],迫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物品的投资决策制度一直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农民、农村、农业的实际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农民无法在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体现自己的意志和对公共物品的价值偏好。因此,需要创新

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决策制度,建立一种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物品投资的机制,实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9]认为,没有必要在财政事务的集体决策中实行一致同意规则,可以通过改变财政规则来改变公共物品的供给。这既降低了供给的时间成本,又缩短了政府决策的过程,从而为从需求出发的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了可能。政府部门应及时发现、掌握行政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情况,当行政村遭遇供给困难时要及时介入,进行沟通、协调或者予以支持;应从需求找供给,将公共物品的选择权交给村民,要让他们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来。针对公共物品的垄断性、效益排他性与公平性,不同的农村公共物品应由不同的主体去投资。在实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政府财政投资的导向功能,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私人 and 第三方投资主体的引导,应在政策、理念上进一步消除对农村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歧视。同时,要鼓励各村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将现有的办公用房置换出来,通过出让、租赁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各村在建设中应充分利用拆旧建新、旧村改造中的旧宅基地和闲置土地进行建设,确因条件限制需新增建设用地的,应由县政府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同时,应逐步完善新村整体硬件设施,及时撤下原老村组织机构牌子,悬挂新村组织机构牌子,尽快在各村村口及道路设置新村村牌、新村简介牌。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只是社会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特将其单列是出于以下考虑:行政村规模调整后面临的诸多社会事业建设中,农村公共物品建设显得尤为迫切;而在许多公共物品的建设中,政府面临单一投入的尴尬境地。因此,本文突出强调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畅通“自下而上”渠道的重要性,呼吁拓宽公共物品供给渠道,以期有助于解决“建设什么、如何建设”的问题。

4. 重视离职村干部作用,引导新村班子树立“新村一盘棋”的工作理念

并村后退下来的干部曾经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办理村级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他们绝大多数是本乡镇、本村的中坚力量,相比一般村民,他们更加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在村民中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如何利用好他们的力量、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帮助在职干部做好群众思想

工作,替在职干部分担繁重的社会事务,为发展经济、致富百姓献计献策,是当前各级党组织应该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应引导新村班子树立“新村一盘棋”的工作理念,自觉从新村的角 度谋划思路,做好工作,增强新村发展的凝聚力。应坚持突出社会事业发展的思路,在检验新农村建设的标准上、在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时,都应贯彻社会事业的标准,用社会事业发展的水平全面衡量新农村建设的成就。只有这样,新农村建设才能吸引农民广泛参与,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四、结语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研究行政村规模调整这一问题对公共资源在农村的分配、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打破原有乡村社会结构,对不同的村落共同体进行重组,使得传统性较强的乡村社会从价值内核到生活方式、从组织架构到行为逻辑、从同质性到阶层的分化加剧,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行政村规模调整中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制度安排背后的多重意义,也可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奠定现

实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王小军. 村庄合并后的治理难题——江西桃村、山村调查[J]. 中国乡村发现, 2007(4):41.
- [2] 张春兰, 贾舞阳, 李敏丽, 等. 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5):65.
- [3] 吴理财. 合村并组对村治的负面影响[J]. 调研世界, 2005(8):39.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4: 21.
- [5] 戴均良. 调整村级建制: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再度创新——关于浙江省部分地区调整扩大行政村规模的调查与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3):35.
- [6] 曲延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与创新——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J]. 改革与战略, 2007(2):96.
- [7] [美]蔡晓莉. 中国乡村公共品的提供: 连带团体的作用[J]. 刘丽, 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6(2):104.
- [8] 贺雪峰, 仝志辉.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124.
- [9] [美]布坎南.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 马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7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58-05

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战略举措研究

何泽军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河南省食品工业已经由“量”的积累迈入“质”的提升的发展阶段。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对于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应对消费需求变化、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的现状是:规模较大但效率不高,集聚初显但结构不优,贡献较大但开放度不够,环境良好但创新不足。因此,要提升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大战略、大举措:实施产业链带动战略,提高发展效率;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提升产业价值;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蓄发展潜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关键词]食品工业;产业链;品牌带动战略

[中图分类号] F424.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3

在当前转结构、调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背景下,区域产业发展需要越来越注重质量提升。而根据产业发展的周期规律,当一个产业完成了发展初始阶段的规模扩大、速度提升、集聚提高与环境营造后,就会更加注重效益提高、结构优化、价值增加与潜力挖掘,即要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

食品工业是指主要以农、林、牧、渔或化学工业的产品或半成品为原料,制造、提取、加工成食品或半成品,具有连续而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工业体系。食品工业是河南省的第一支柱产业。据测算,2013年,河南省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4%,资产总值占全部工业资产总值的11%,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17.6%,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13.2%,河南省食品工业已经实现了“量”的积累。^[1]但河南省食品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值的比率)较低,仅为3.5%,低于一些行业10%以上的水平。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河南省食品工业还必须向“质”的方面提升迈进。当前河南省食品工业为什么必须提升迈进?提升迈进的基础与条件又是什么?如何提升迈进?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以供业内参考。

在统计上,我国食品工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与烟草制品四大类产业。本文所说的产业发展质量是指区域特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蕴含或体现出来的发展能力,可以用规模与效率、结构与体系、功能与价值、潜力与可持续发展等评价指标来衡量^[2]。

一、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必要性

食品工业固有的特征、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着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十分必要。

1. 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需要

食品工业具有产品非标准化、品种多样化、产品安全性要求高等特点,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永不衰落的基础性产业。食品安全始终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而食品非标准化与品种多样化的特点又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难度。近年来,常有因为某一个食品安全事件而致整个产业发展受阻的情况发生,如“三鹿奶粉事件”

[收稿日期] 2014-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j004);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2013D004)

[作者简介] 何泽军(1975—),男,河南省信阳市人,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产业发展与创新。

“双汇瘦肉精事件”等,都给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 响。一个发展质量良好的产业必定是极少发生安全事件的产业。河南省作为食品工业大省,固然需要注意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对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但提升发展质量才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本之策。

2.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

食品工业是行业跨度大、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环节繁多且相互影响的产业。基于这一特点,河南省食品工业提升发展质量不仅可以优化自身产业结构,而且可以辐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如食品装备制造、生物产业,从而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从河南省食品工业内部构成看,河南省农副食品大多是粗加工的,深加工食品较少,仅占10%,相比于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中70%为食品深加工,亟需提高深加工程度,优化产品结构;同样,河南省肉类食品加工量只占全部肉类食品产量的5%,蔬菜加工量只占蔬菜总产量的30%,远低于发达国家分别为25%和90%的比例,且存在产品结构优化问题^[3]。从河南省的整体产业结构看,由于食品工业关联度高、行业跨度大,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必然会促进相关产业优化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3. 应对消费需求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有效需求不断释放,居民食品消费需求进入结构不断升级的新阶段,表现为农村食品的多样化、城市食品的丰富化、家庭膳食的社会化、食物结构的健康化。发达国家加工食品已占到食品消费总量的70%~80%,我国目前只占到20%^[4],相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加工食品需求也将越来越大。食品工业作为居民消费的基础行业,作为最典型的消费品产业,将从这些变化中直接受益。当然,这需要食品工业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及时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因此,作为食品工业大省,河南省必须根据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不断提升其食品工业发展质量。

4.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

目前,河南省正在实施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这三大战略既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又对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三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其原因在于:一是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需要通过多种战略举措实现农业现代化,以使粮食产

量稳定、质量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二是中原经济区“两不三新”建设目标需要食品工业通过提升发展质量来引领新型工业化,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中原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之一是把河南省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全国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工业基地,实现这一功能定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三是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定位为河南省对外开放高地与现代产业中心,这一定位有助于吸引聚集更多高端生产要素,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反过来,河南省食品工业也只有更快地提升其发展质量,才能更好地实现港区的发展定位。

二、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在产业规模、企业集聚、产值贡献、环境营造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但从效率改进、结构优化、功能提升、潜力挖掘等方面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规模较大但效率不高

规模与效率可以反映产业发展的综合实效,是产业发展质量评价的基础性指标。以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来度量食品工业产业规模,河南省食品工业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2。据计算,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中,河南省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产业规模排名第2,饮料制造业产业规模排名第3,烟草制品业排名第6^[5]。同时,苏静^[6]的研究也表明河南省食品工业规模因子排名全国第2位,仅落后于山东省。

但是,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效率并不高,仅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劳动生产率(工业总产值/年均从业人员)、资本产出率(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三个指标来度量发展效率,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资产利润率位于全国第15名,其中烟草制品业的效率更是处于全国中下水平,位居第20名。同时,苏静^[6]的研究还表明河南省食品工业效率因子排名全国第15位。可见,河南省食品工业规模虽较大但效率不高。

2. 集聚初显但结构不优

产业集聚与结构状况是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产业集聚反映产业空间发展强度状况,而产业结构则反映产业部门之间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构成状况。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日益呈现集聚态势。

郑州、漯河、鹤壁、周口、商丘、许昌6个地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61.2%以上;同时,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汤阴食品产业集聚区被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遂平县产业集聚区、新郑薛店食品工业园区、郑州马寨食品产业集聚区、永城面粉产业集群、淇县禽肉加工基地等享誉省内外,临颖县、淇县、新郑市等县(市、区)被评为全国食品工业强县。食品工业集聚效应在这些地区日益凸显。

但河南省食品工业结构有待优化。从产业内部结构看,据计算,2013年,河南省食品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在全省食品工业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7.8%、20.3%、14.6%、17.3%,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占比较大,而代表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高附加值的饮料制造业和高税收的烟草制品业占比偏低,相比于上海(占比为18:29:12:41),内部结构不优。从主要产品构成看,河南省生产的小麦粉、速冻米面、方便面、饼干等食品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37%、72%、27%和31%,居国内首位;味精、饮料酒等食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鲜冷藏冻肉、白酒等食品产量居全国第3位^[7];但这些产品均属于粗加工食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从企业结构上看,2011年,河南省食品企业销售收入超100亿元的仅有5家、超50亿元的仅有10家,其他90%以上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企业规模整体上处于小而散的状态。从企业品牌数量看,河南省食品工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6家、中国名牌产品15个^[8],而山东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68家、中国名牌产品62个^[9]。相较于山东省,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品牌结构不合理。

3. 贡献较大但开放度不够

产业贡献与产业开放程度也是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产业贡献主要体现在就业带动与税收方面,而产业开放度主要体现在产业对区域外的影响。就产业贡献而言,河南省食品工业贡献巨大。据统计,2012年,河南省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73.7亿元,上缴税金428.8亿元(烟草制品业占其中的55.2%),食品工业用占全部工业14.0%的销售收入创造出17.3%的利润和21.8%的税金。不仅如此,食品工业带动能力日趋增强,直接安置就业人数达70多万人,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人数达300万人,2000万农民从事原料生产,有力推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10]

但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开放度不够,对区域外的

影响较小。一是主要产品走出去的少,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出口交货值为66.4亿元,仅占工业销售值的1.0%,远低于山东省的1101.5亿元(占工业销售值的9.4%);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分别是0.6%、1.8%、1.7%,远低于山东省的10.1%、10.4%、4%。二是产业利用港澳台与外商资本的较少,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资本构成中港澳台资本与外商资本合计为67.7亿元(占实收资本的比例为9.7%),远低于山东省的222亿元(占实收资本的比例为21.4%)。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利用外资占比分别是13.9%、5.6%、6.4%,远低于山东省的19.4%、29.7%、24.8%。由此可见,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4. 环境良好但创新不足

产业发展环境与创新程度是反映产业发展质量的潜力指标,环境良好与创新能力强表明产业发展质量高。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环境良好。一是农产品资源丰富,作为粮食大省和人口大省,河南省发展食品工业具有原料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二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对食品工业发展一直比较重视。从“十五”以来,连续三个五年规划对食品工业进行重点培育,食品工业步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2009年出台的《河南省食品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为未来十年河南食品工业的发展提出了目标与实现路径。三是对产业发展予以资金支持,通过设立食品工业升级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和农业开发产业投资基金,每年安排近1亿元资金支持食品工业发展。

但是,河南省食品工业创新能力不强。首先,从创新投入上看,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科技研发强度为0.28%,远低于山东省的0.49%,尤其是代表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研发强度仅为0.31%,仅是山东省的1/3;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的研发强度分别为0.24%、0.50%、0.13%,均低于山东省(其分别为0.36%、0.95%、0.41%)。其次,从创新产出看,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新产品销售率(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之比)为4.12%,低于山东省5.7%的水平,尤其是河南省具有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新产品销售率分别为1.99%、3.75%,远低于山东省的4.19%、7.48%的水平。此外,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仅为430个,仅接近山

东省 843 个的 1/2;具有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更少,仅为 163 个,远低于山东省 386 个的数量。创新驱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既定的发展战略。而创新能力弱,使得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缺乏后劲,潜力不足。

三、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建议措施

尽管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在产业规模、产业集聚、产业贡献、发展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仍存在效益不高、结构不优、开放不够、创新不足等问题,未来提升河南省食品工业质量必须在产业链、品牌、开放、创新等方面采取大战略、大举措。

1. 实施产业链带动战略,提高发展效率

产业发展效率受结构、开放程度、创新等多种因素影响。基于食品工业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提高发展效率首先应加强产业链整合。河南省食品工业可在发挥规模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效率,重点打造面制品、肉制品、速冻食品和白酒产业四条产业链,培育和发展的食品装备制造链。

一要完善面制品产业链。应通过加速对现有部分骨干面粉厂的技术改造,提高面粉单厂生产规模,重点发展各类小麦专用粉;依托郑州金苑面粉、郑州海嘉面粉等企业,积极开发麦胚制品、小麦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

二要完善肉制品产业链。应依托双汇、大用、众品等知名企业,巩固扩大猪禽肉优势,积极发展牛羊肉及其他特色肉类品种;着力肉制品深加工,通过发展熟肉制品、调理肉制品与冷鲜分割肉制品,延长产业链;着力中高端肉制品开发,通过发展酱卤、熏烤、腌腊等肉制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要完善速冻食品产业链。应依托三全、思念、科迪、胖哥等知名企业,着力提升速冻汤圆、水饺、粽子等产品的品质和档次;通过提高速冻加工技术,探索开发馒头、菜肴、面条、炒饭等多规格、多口味的新型速冻产品和微波套餐食品;积极构筑以郑州为核心的速冻食品物流节点网络,强力推进冷链物流系统建设。

四要完善白酒产业链。以豫酒六朵金花(仰韶彩陶坊、宋河粮液国字、杜康国花、宝丰国色清香、张弓度之度、赊店青花瓷)为重点,扩大中高端白酒生产规模;依托杜康、仰韶等知名酒厂,提高原酒生产能力;加强啤酒行业整合,着力提升金星啤酒的品牌

影响力;鼓励葡萄酒、保健酒、黄酒等企业扩大发展规模。

五要培育食品装备制造产业链。考虑到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依托河南省食品工业庞大的市场需求,应重视培育、发展食品装备制造制造业,重点研制可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的智能化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包括食品加工机械、包装机械、包装新材料、数码印刷和数码标签、发酵设备等。

2. 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有多种措施,包括品牌建设、产业链整合、名企引进、创新推动等。但就河南省食品工业而言,宜依托现有优势,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与产品链延伸相呼应,集中培育发展一大批食品工业名牌产品,以品牌效应开拓市场、推动结构升级,增强产业发展质量。

一要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应依托现有知名品牌,鼓励相关企业开展新产品研发,实施品牌延伸策略,巩固提高一批知名品牌;结合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引进一批知名食品企业,嫁接拓展一批知名品牌;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以地域文化为特色创建提升一批知名品牌;鼓励同类中小企业合并重组,加大营销组合与市场创新,优化整合一批知名品牌。

二要以品牌效应驱动转型升级。应鼓励知名企业品牌延伸,开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引导高端需求,抢占中高端市场;鼓励企业加速研制功能化食品,研制开发针对“三高”群体、抗衰老抗疲劳群体、美容需求群体、提高智力需求群体的保健食品;鼓励开发时尚化、娱乐化食品,开发一些可以吃着玩、吃着炫的时尚化家庭休闲食品;探索开发具有中原特色的概念性食品。

3.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提升产业价值

食品企业“走出去”可以扩大对外影响,而“引进来”则可以增加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应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端生产要素,在提高开放度的同时,提升产业价值。

一要大力引进高端生产要素。应充分发挥河南省成本优势和市场辐射优势,以现有食品工业体系为基础,重点引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要依托产业集聚区建设,通过产业链招商、龙头企业招商,积极承接高端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的转移。要结合产业链带动战略,重点引进食品装备制造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生物技术,实现对现有产业

链缺失环节的“补链”;重点引进行业领军人才、高端管理人才、金融与营销等高级专业人才,实现对现有产业链科技、管理、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强链”。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落实相关奖励政策,促进重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

二要进一步开拓销售市场。应借助航空港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结合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鼓励省内食品企业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拓宽食品销售渠道。要大力扶持一批行业地位领先、规模优势明显、经济效益突出、综合实力强的骨干企业到省外投资建厂或建立生产基地,扩大产品或品牌影响力。要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内外展销会,加强与各地大型卖场、行业组织的合作,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4.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蓄发展潜力

产业发展潜力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保障。应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以创新型企业培育为手段,以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搭建为载体,加快食品工业科技进步和改造,积蓄产业发展潜力。

一要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应结合河南省科技厅实施的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工程,督促大中型食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骨干企业全部建成研发中心;结合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鼓励一批食品企业积极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大中型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到其销售额的1.5%以上、食品类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达到销售额的5%以上。要鼓励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技术创新与新产品研发,以形成更多的发明专利或行业标准。要鼓励食品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加快食品企业生产环节向低碳化、环保化、绿色化转型;鼓励中小微企业利用创新平台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积极参与创新过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二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依托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等专于食品开发的高校与研究机

构,鼓励联盟成员开放实验室、共享资源,攻克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技术难题,切实建成河南省食品工业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应充分发挥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整合作用,建立食品信息网上服务平台,以方便居民随时查询食品相关生产信息、食品相关技术信息等。

三要重点攻关一批技术难题。应围绕食品工业发展的保鲜、生产检测、质量和安全控制、速冻、包装等共性技术或核心技术,设立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突破这些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要鼓励食品企业围绕自身发展技术难题,广泛开展合作创新,掌握相关技术;鼓励食品企业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咨询公司合作,在业务流程再造、精准化管理、先进工艺应用等方面获取辅助服务,应用先进技术,提升生产效率。

[参 考 文 献]

- [1] 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河南统计年鉴(201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 [2] 刘义成. 高端产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兰州学刊,2009(6):78.
- [3] 吕政. 增强企业竞争力与食品工业发展[N]. 中国食品安全报,2013-12-17(A2).
- [4] 胡国恒. 河南食品工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战略分析[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1.
- [5]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 [6] 苏静. 河南食品工业国内竞争力的比较[J]. 管理工程师,2011(3):1.
- [7]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食品工业调整振兴规划[EB/OL]. [2009-09-09](2014-12-10). <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09/09/09/010155885.shtm>.
- [8] 蒋科峰. 河南食品工业举足轻重[J]. 中国商界,2011(5):50.
- [9]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山东省“十二五”食品工业发展规划[EB/OL]. [2011-06-27](2014-12-10). <http://www.sdetn.gov.cn/portal/zwgk/xxgk/zwgkml/fzgn/webinfo/2011/06/1309142779116413.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63-04

人口红利视角下的河南省 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研究

翟文婧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提升女性劳动人口比重和人力资本存量能够大幅度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现实已基本形成,城镇从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也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于男性人力资本存量,妇女职业生涯具有的非连续性特点造成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以及女性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低于男性等问题,使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受限。因此,应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环境;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补充女性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女性劳动力人口质量;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不断加大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力度。

[关键词]河南省;女性;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开发

[中图分类号]F241;C92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4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克强总理曾提到中国近几十年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红利”。我国学者也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生产要素供给充分、社会储蓄高等对国家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效应的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联系在一起。

国外学界认为,人口红利将能够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提升。中国学界一致认为我国存在人口红利或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这是中国享受极高的潜在增长率与实现大体相同的实际增长率的重要原因。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红利预测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忽视了在二元经济特征逐渐减少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利用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带来利好。美国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多·W·舒尔茨^[1]指出,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为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可能,但鲜有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中的“女性资本”进行深度挖掘,“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和‘投资环境’的研究,而人力资本是对特定性别而言的”。女性人力资本虽是蕴含于女性自身的各种知识素养、劳动技能和健康素质存量的综合,但绝不仅仅是在女性身上的投资,还包括家庭和社会的投资^[2]。笔者认为,在人口红利视角下讨论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资有其独特性与必要性。女性人力资本开发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关系密切,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国内各省市之间人才竞争加剧,开发、利用、增强和发展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的优势已刻不容缓。因此,本文拟对女性人力资本在河南省的发展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优势,河南省开发女性人力资本的障碍与对策进行探讨。

[收稿日期]2015-01-08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2400410068);郑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1PRKXF619);郑州市金水区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49)

[作者简介]翟文婧(1986—),女,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女性主义。

一、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在河南省的发展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优势

2013年河南省人口总数为10601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07.3:100,女性人口数为5114万人^{[3](P99)}。2013年在河南全省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中,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重为69.8%,出生率为12.27%,死亡率为6.76%,自然增长率为5.51%^{[3](P102)},总抚养比为43.2%^{[3](P105)}。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在50%以下称为人口红利开启^[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4号)和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提出的总体要求,河南省正在努力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集聚区和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开发女性人力资本,有利于河南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尽早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引擎和国家内陆开放高地。

于雁洁^[5]通过时序模型对河南省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女性人力资本有较高的社会收益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和科技创新,缺乏这些因素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此外,生产模型仅体现了女性人力资本作为直接生产要素投入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若考量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女性人力资本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更大。

1.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现实已经基本形成

河南省的城镇化率2011年为40.57%,2012年为42.4%,2013年为43.8%,目前仍落后全国平均水平9.7个百分点。^{[3](P99)}随着河南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河南省每年需转移约150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大批农村男青年劳动力离乡加入了农民工的行列,农村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男性缺席的状况,农村女性在家庭结构出现缺失时成了农业生产的实践者和维持家庭完整的工作者。目前河南省的农村女性人口数为2874万人^{[3](P99)},在家务农劳动力中近60%为农村女性人口,个别地区甚至达到70%以上。农村女性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劳动中不断学习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兼顾资源节约,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增加,对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广大的农村女性作为农村的主力、农村的主体,不但要承担起农业生产

的重担,还要在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如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孝敬老人、计划生育、教育子女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2. 城镇从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处于上升的趋势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为女性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机遇、更多的政策支持、坚实的体制支撑、优良的组织环境和更有力的社会保障。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发生的显著变化,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自觉性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目前,河南省的城镇女性人口数为2240万人^{[3](P99)},全省非农业户口女性人数为891.4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9.3%^{[3](P116)}。女性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可通过参与三次产业为河南省建设做出贡献;作为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则可通过家庭决策和对子女的教育影响“三化三型”社会的建立。因此,女性在河南省建设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参与方式和作用。

由此可见,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女性既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在家庭中承担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对河南省实现“三化三型”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障碍与对策

1. 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障碍

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是获得整体性人力资源高资本存量、实现其价值最大增值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女性在诸如知识、技术、生产能力、投资环境、投资对象、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影响到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首先,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于男性人力资本存量。受传统观念影响,女性更偏重于回归家庭、服务家庭,因此,相比男性来说,女性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偏低。数据表明,男女未上过学的比例为3.7:7.6;男女受教育比:小学为25.8:27.9,初中为46.0:45.0,高中为16.0:13.1,大学专科为4.7:4.3,大学本科为3.6:2.0,研究生为0.2:0.1^{[3](P107)}。其次,女性职业生涯具有的非连续性特点造成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相反,男性劳动力在稳定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更多的在职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得到增加,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更受青睐。再次,女性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低于男

性,折旧率高于男性。女性劳动年龄以16~54周岁计算,男性劳动年龄则以16~59周岁计算。^{[3](P110)}综上所述,女性就业范围狭窄,就业机会较男性少,因此,在职场中其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了限制。

2. 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应有对策

第一,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环境。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参与河南省建设的有利环境:建立一个无性别歧视的环境,保证女性平等的出生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打破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通过宣传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女性是富有创造精神和积极性的人力资本,是河南省建设的重要实践者和中坚力量,河南省各级妇联组织、工会应把区域内各个领域的女性组织起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关注度和群体的凝聚力;团结带领广大女性认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成为河南省建设的“红色娘子军”;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促进女性积极作用的发挥;妇联应履行好宣传、组织、教育和服务女性的职能,提高建设、服务女性参与河南省建设的能力。

第二,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补充女性人力资本。维持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的人口结构是挖掘新的生产要素的源泉、延长人口红利的基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人口红利的重要特征,实证分析也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比较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要有效延长人口红利,必须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首先,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促进农村社会精细分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改革的深入、资源的优化配置离不开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与对科技的掌握。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生产关系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打破劳动力城区间、城乡间流动的制度和行政分割,并保障外来劳动人口安心工作,为河南省劳动人口提供补充。其次,要扩大就业。从对常住人口红利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参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河南省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乡镇企业和乡镇城市化的发展会留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和城市互动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着重发展就业拉动作用最大的第三产业。河南省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引领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还体现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加健全,教育、文化、餐饮、住宿、旅游、休闲等第三产业更加完善上。^[6]目前,河南省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仅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28%^{[3](P135)},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由2012年的29.1%下降到2013年的28.5%^{[3](P59)},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表明,第三产业若要壮大,仍需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推动低端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如旅游、文化、物流等)转移,挖掘更多女性劳动力需求潜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和稳健性,促进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

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女性劳动人口质量。2013年,河南省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占学生总数的53.1%,受中等教育的女学生占总数的48.6%,受初等教育的女学生占总数的45.8%,均未过半。^{[3](P783)}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男女受教育比重正在向男性倾斜^{[3](P107)}。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质量是增加人口红利、提高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河南省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不仅需要人口红利的数量支持,更需要劳动人口质量的保证。

随着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女性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其数量的逐年增长,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与经济发展已形成良性互动循环。知识经济大背景下提升女性教育水平的途径主要有:通过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创新职业教育、网络教育等教育形式,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完善优厚的政策条件,包括健全女性教育法律法规,设立教育发展基金、奖学金、助学贷款或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鼓励和保障女性学习,使其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为河南省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全面提高女性科技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是女性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河南省最为迫切的要求,更是河南省实现“三化三型”的需要。对河南省来说,通过知识进步促进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而教育和培训已成为女性综合素质提高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应对各层面的社会女性

进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现代文明知识的培训,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培训,使女性成为参与社会、拥有技术、懂得生活的高素质新时代女性。

第四,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与高层次人才成长往往受地方文化特点的影响。河南省目前女性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数量偏少,而且女性从业多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中较低的层级,在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建设等“高”“精”“尖”领域中女性尚未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2011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4%,河南省仅为29.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连续几年位居全国末位。^{[3](P208)}在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逐渐向现代产业转变过程中,第三产业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目前,河南省以批发、零售、餐饮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接近60%,而以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近年来虽有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所占比重仍较低、发展仍较滞后。^{[3](P208)}河南省就业女性向第三产业流向的实际情况表明,女性正在逐渐摆脱繁重体力劳动、不良劳动环境的第一、二产业,转向适合女性心理、生理特点又能发挥女性优势的第三产业。数据表明,个体、私营企业中的女性就业者每年都在增加,第三产业正在吸纳更多的城镇女性就业。目

前河南省正在培育壮大与航空港建设关联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全球生产和消费供应链中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因此,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商贸交易、产业培育、特色旅游、城市化综合配套等为女性人力资本开发提供了良机。综上,通过教育普及,以及将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以促进高水平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总量、促进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女性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不仅能为企业保持发展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提供智力保障,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参 考 文 献】

- [1] 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蒋斌,张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 潘泰萍.论我国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6):59.
- [3] 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河南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 [4] David E 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The World Bank Review, 1998(3):419.
- [5] 于雁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河南省时序模型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2(11):79.
- [6] 张占仓,刘爱荣,杨迅周.三化协调发展的河南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67-06

传承创新背景下郑州市城市文化 品牌建设问题研究

梁丹, 尹郑刚

(郑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5)

[摘要]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综合实力、城市竞争力和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其培育和塑造是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郑州市文化资源丰富,历史底蕴深厚,但由于其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乏核心的城市文化品牌,致使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郑州市应依托区域多元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节事会展、演艺娱乐、影视动漫、名人故里等文化品牌,使之形成体系,并从政策、组织、资金、营销、人才等方面予以保障。

[关键词]城市文化品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5

随着中原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务院将“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确定为中原经济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如何使华夏历史文明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所拥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和城市文化品牌打造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拟基于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资源与评价、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其建设重点与保障建议。

一、城市文化品牌及其建设的重要意义

1. 品牌和城市文化品牌

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资产,其载体是用以与其他竞争者产品或服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记号或者设计及其组合^[1],其内涵是要将自己的核心利益传递给消费者,以区别于

其他同类商品。城市文化品牌是在城市传播自身形象的过程中,城市风格与个性、城市形象与实力的统一,它凝集和体现着城市的功能、理念,整体价值取向,以及由内向外的辐射力和由外向内的吸引力,并得到社会的认可^[2]。当前,学术界各相关方对城市文化品牌的界定略有不同,一是将其界定为城市文化的品牌,着重从城市品牌的角度,着眼于城市总体形象品牌的研究,诸如“羊城”广州、“歌城”南宁一样,将城市赋予某种鲜明的文化品牌特征,从而区别于其他城市;二是将其界定为城市的文化品牌,着力于城市标志性文化品牌的研究,诸如西湖对杭州、兵马俑对西安一样,对城市而言,这种文化品牌和城市意象具有较强的关联度,在某种程度上使这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但这种文化品牌并不是唯一的。本文对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的界定属于后者,具体从文化资源的角度发掘其标志性的文化品牌。

2.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意义

作为文化标记,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综合实力、城市竞争力和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区域文化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文化品牌的竞争。建设

[收稿日期] 2015-02-06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2400410600)

[作者简介] 梁丹(1982—),女,河南省新乡市人,郑州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地理与城镇规划、文化产业。

文化强市,必须树立精品意识、品牌意识,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进行开拓,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的文化产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就是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传承^[3]。郑州市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是其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优势的主要途径,是充分展现郑州市城市文化精神和价值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郑州市打造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另外,建设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对提高郑州市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知名度、提升区域竞争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促进中原崛起、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郑州市着力于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小樱桃动画等城市文化品牌,已经初具国内影响力,其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这为将中原经济区打造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资源与评价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必须依托当地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只有从当地文脉中提炼出来的文化品牌才具有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才能形成有效的传承体系。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首先要明确传承什么、如何传承。郑州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目前共有各类文化古迹 8 651 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2 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4 处 80 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5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68 处^[4],稳居河南省第一、全国前列。此外,还有少林功夫、拜祖大典等 5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岳庙会等 25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在此地域积淀形成了史前文化、根亲文化、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武术文化、宗教文化、客家文化、象棋文化、河洛文化、豫商文化、名人文化、戏剧文化、美食文化、民俗文化、冶铁文化、石窟文化、县衙文化、唐宋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类型。在文化传承创新和城市文化品牌打造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侧重,以塑造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

本研究将从资源特性、历史积淀、民众参与和产业联动这四个方面对郑州市所具有的文化资源进行评价。其中,资源特性从垄断性、知名度、美誉度、资

源规模、资源保护等级等方面进行评价,历史积淀从年代、文化价值、传承创新方面进行评价,民众参与从其文化内涵是否亲民、所开发产品是否具有欣赏性和民众参与性方面进行评价,产业联动从其经济价值、产业关联、产品开发潜力、传承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按照 5 分制计分,评价人员从郑州市具有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旅游等背景的专业人士和普通市民中选取,汇总按照资源禀赋 30% 权重,历史积淀 20% 权重,民众参与 20% 权重,产业联动 30% 权重进行综合统计(此权重为咨询郑州市城市、文化、旅游、经济等类专家后所得,调研时间为 2014 年 7~8 月,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 92 份,其中有效问卷 90 份,评价结果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郑州地域文化的特色,与《郑州都市区规划》提出的重点打造“黄河”“黄帝”“嵩山”“商都”四个文化旅游品牌具有较高吻合度),评价结果见图 1。由图 1 可以看出:以少林功夫为核心的少林文化、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核心的嵩山文化、以豫剧为核心的戏剧文化、以黄帝故里为核心的黄帝文化、以寻根问祖为核心的根亲文化、以黄河游览区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等,其得分都在 4.5 分以上,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据此,可以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整合文化要素,打造文化精品;宗教文化、名人文化、商都文化、民俗文化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可通过挖掘其文化内涵,将其附着于其他文化产品中予以体现;以康百万庄园为特色的豫商文化、以二七纪念塔为特色的红色文化、以楚河汉界为特色的象棋文化、以宋陵为代表的唐宋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可以进行适当的区域开发,打造区域文化品牌。

三、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 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现状

郑州市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发展环境,近年来,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注重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安排专项资金,紧紧围绕特色文化做文章,通过对资源的深入挖掘和策划整合,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扶持重点项目,培育文化旅游精品,设计特色旅游线路,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项目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取得了明显成效,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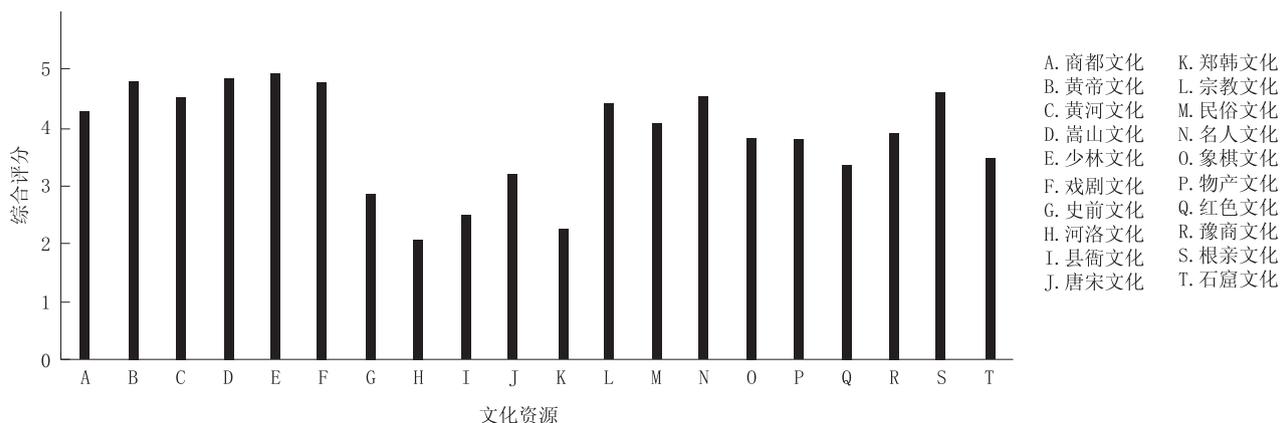


图1 郑州市文化资源品牌化评价折线图

表1 郑州市不同类型城市文化品牌统计表

文化品牌类型	城市文化品牌单体
文化演艺品牌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风中少林、水月洛神、程英救孤、村官李天成等
影视动漫品牌	快乐星球、少林寺传奇、小樱桃系列、少林海宝、“二兔”系列等
新闻出版品牌	大河报、郑州晚报、商都网、大河网、小小小说选刊等
节事会展品牌	郑交会、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郑开马拉松、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
文化旅游品牌	少林寺、黄河游览区、黄帝故里、嵩山历史建筑群、康百万庄园等
其他文化品牌	郑商瓷、梨园春、二七纪念塔、郑州烩面、宇通客车等

其中,演艺业出现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风中少林》《水月洛神》等演艺精品力作;河南超凡影视公司和郑州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快乐星球》,填补了我国大型科幻少儿电视剧的空白;动漫业涌现出了《少林海宝》《小樱桃》《虫虫计划》《独脚乐园》等一大批动画精品;新闻出版业的《大河报》连续9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5],《小小小说选刊》发行量在全国纯文学期刊中多年来一直稳居第一,成为全国小小小说的期刊品牌,且影响力不断提升;节事会展业方面的郑交会、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郑开马拉松、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文化旅游业上,除继续完善少林寺、黄河游览区、黄帝故里等成熟文化旅游品牌外,还开发了“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绿博园、世纪欢乐园、方特欢乐世界等以都市休闲、娱乐、科普、体验为主的新型文化旅游品牌,得到旅游者和广大民众的喜爱。

2. 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与武汉、长沙、西安等周边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现有文化品牌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在规模、数量和质量上落后于沿海城市;动漫产业虽是郑州市文化产业中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门类,但多数漫画、动画片的质量不高,在国内产生不了较大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国际品牌效应。其次,郑州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意识不强、整体文化消费水平偏低、文化消费手段单一、文化消费规模整体偏小,消费尚未成为推动文化品牌发展的动力,严重影响市场开拓和创新发展。再次,城市文化品牌发展方式粗放,产业附加值低,在体制机制、传播手段、高新技术运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创新还不够,缺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文化原创能力弱,产业链条不完整,有缺失。

四、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应有内容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应因地制宜、彰显优势,就郑州市而言,应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

1.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品牌是郑州市城市文化建设的重点,应依据“国际商务旅游目的地、世界功夫旅游目的地、东方文化旅游目的地、中部休闲娱乐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6],以文化创意为先导,以完善旅游要素和增加收入为中心,抓住郑州市特色人文资源和民俗、特色餐饮和技艺、特色工艺品和纪念品、特色演艺和精品剧目、特色民居宾馆和乡村旅社五大文化亮点,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着力推动郑州旅游由“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少林寺、黄帝

故里等成熟品牌应完善功能设施与服务,加大推介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增加文化活动和游客体验参与拓展,延升产品链,增加吸引力。努力将少林寺景区、黄帝故里寻根、沿黄生态文化旅游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品牌。商都文化遗址公园、汉霸二王城、杜甫故里、宋陵遗址公园等项目规划,应以专项旅游为重点,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内涵,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策划参与体验性文化旅游活动,创新文化旅游推介方式,大力拓展文化旅游市场,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打造文化精品和国家级文化旅游品牌。

2. 节事会展

节事会展品牌具有强大的城市传播效应,其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举办地带来显著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并且这种效益会延续下去。应将城市和节会品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节会成为城市的形象标识和城市文化“名片”。当前,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豫剧节、郑开马拉松、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嵩山文化论坛等在海内外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这些初具效应的节会品牌,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创新活动内容、运作机制和品牌形象推介方式,加强活动管理和现场控制,引进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让民营企业参与经营,延伸活动产业链,培育活动新的市场开拓空间。应将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节会文化品牌,将郑开国际马拉松、街舞大赛、大河财富论坛等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节会赛事活动。同时,根据郑州市文化、市场和产业优势,还可举办中原文化国际旅游节、中国郑州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郑州文物藏品交易会、嵩洛文化论坛等富有特色的节会活动等,培育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节会文化品牌。

3. 演艺娱乐

演艺娱乐品牌是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风中少林》等在国内已具有相当影响力,其未来发展重点应是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展示方式,融武术、宗教、民俗、戏剧和现代歌舞、曲艺为一体,打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演艺精品,努力将郑州打造成为“文化娱乐之城”;应加快产业聚合过程,稳步发展旅游演艺业;应深化演艺娱乐业同餐饮、零售、旅游等行业的链接程度,拓展产业链条,提升整体竞争能力。应将高水准的高雅艺术团体列为非营利性演出机构,实行经济补助、政策促进;应深化经营企业的体制改革,鼓励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演艺

业;应配合少林寺世界级旅游品牌打造,继续完善和提升《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艺品牌;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向国内外推介《风中少林》《水月落神》《程英救孤》等郑州经典演艺品牌。同时,应深入挖掘郑州市文化内涵,可依托嵩山打造《中华文化圣山·封禅文化大典》、依托黄河游览区打造《逐鹿中原·黄河风云录》等大型实景演艺项目,将郑州传统文化和现代动画元素相结合,针对市场需求特别是青年人的需要推出新的舞台剧目,打造强势演艺文化品牌。

4. 影视动漫

目前,郑州市的影视动漫品牌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其应注重挖掘、培育和提升。对《快乐星球》《小樱桃》等初具品牌效应的影视动漫作品,应加大其图书、漫画、杂志、玩具、服装、食品、游戏等衍生产品的开发,延伸其产业链条,依托《快乐星球》拍摄基地、国家动漫产业园区、郑州动漫产业园区、郑州华强文化科技基地等,建设开发文化娱乐主题公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配套提升影视和动漫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延伸原有影视和动漫品牌的同时,注重新的影视和动漫产品开发,从郑州本土文化精髓中寻找影视和动漫作品的创作素材与灵感,创新郑州文化传承的内容和形式。应从中原传统和历史文化中寻找创作契机,整合不同文化要素,突出时代精神。2015年新郑黄帝拜祖大典期间推出的电影《轩辕大帝》,以及大型原创动画连续剧《黄帝史诗》,必将推动河南影视动漫品牌的大发展。形式上可借鉴国内外影视制作的新技术,创新特效、拍摄模式,同时关注各类收视人群的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创作集文化性、娱乐性、知识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影视动漫形象和品牌。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动漫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动漫画投融资环境,促进动漫产业链的开发与完善,使郑州发展成为中西部乃至全国的动漫高地。

5. 名人故里

传承和弘扬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既是对历史名人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培育地方文化品牌的现实需要^[7]。名人故里一定程度上可还原城市的历史场景和文化精神,对城市个性和品位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郑州市历史悠久,名人荟萃,人文始祖黄帝、郑国名相子产、道家名师列子、诗圣杜甫、文学大家潘岳等均曾生活于此,并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郑州市若要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对名人故里的系统开发和品牌培育必不可少。借鉴国内外名人故里开

发和品牌培育的经验,郑州名人故里可遵照“十位一体”的开发模式进行,即编制一部总体开发规划、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出版一批名人相关书籍、举办一个节事活动、制作一部演艺影视作品、建设一个名人博物馆、制作一个网站、注册一批商标,形成一个景区、拉动一个产业,十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培育名人故里品牌。具体操作过程可根据当地载体的规模、开发现状、名人精神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模式。对郑州而言,黄帝故里开发较为成熟,当前需要继续完善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拜祖大典的级别和层次,营造“国典”氛围,打造世界级城市文化品牌。近期可着力于开发杜甫故里(巩义)、许由故里(登封)、白居易故里(新郑)、潘岳故里(中牟)等,提升“文化郑州”品牌形象的价值。

五、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保障措施建议

根据郑州市文化资源禀赋特点、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客观规律,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应围绕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深入挖掘郑州城市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精品,全面实施品牌战略。应完善文化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机制,依托区域多元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节事会展、演艺娱乐、影视动漫等多元文化品牌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内、国际影响力的优势文化品牌,使“文化郑州”的形象深入人心,使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对郑州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

1. 政策保障

当前,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与国际文化品牌竞争的的实力,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品牌存在一些“规则性硬伤”,如品牌法人主体地位不明确、品牌企业融资困难、市场交易不规范等,因此亟需尽快出台一批具有持续性的扶持政策。首先,必须明确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的职责,保障从业者和消费者的权益,打造公平、规范、有序的文化品牌发展环境。其次,政府各职能部门应树立文化品牌培育的价值观念,出台制定促进郑州市文化品牌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文化品牌管理机制。再次,应尽快制定一套保护传统老字号、文化品牌企业、历史遗产等的政策法规,加大打击非法抢注、假冒伪劣现象的力度,并加强对文化企业进行品牌保护的指导,鼓励其进行商标、域名注册等品牌保护活动。最后,应

优先保障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落地,其中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和标志性文化工程项目的用地应该优先予以保障。

2. 组织保障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涉及文化、文物、旅游、城建、土地、宗教等多方面,必须进行有效的协调,以保证其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应成立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与文化、旅游、宗教、广电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文化品牌培育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其次,应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所拥有的优势人力资源,建立文化品牌专家评委会,负责文化品牌的评审、跟踪、监测等工作,明确文化品牌的评价机制,加强文化品牌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再次,各县区和市直部门要结合实际,在领导小组的调控下,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发挥各自职能,落实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具体工作,确保将郑州市打造成“世界文化名城”战略的实施。

3. 资金和技术保障

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离不开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对郑州市而言,虽然政府每年都安排有3000万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但这对庞大的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和品牌营造来讲毕竟是杯水车薪,加之文化技术发展滞后,导致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效应不明显。因此,首先,建议设立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并通过补助、奖励、免息等多种形式扶持重点文化品牌项目,充分利用国家和河南省的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尽可能多地获取产业扶持资金,为城市文化品牌打造提供资金保障。其次,应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项目融资、兼并收购、租赁等方式进入文化行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为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上市提供方便。再次,应依托文化产业创意园吸引各类风险投资,同时,利用市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对城市文化品牌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最后,应采用政府主导下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成立合作组织进行城市文化品牌的技术性研发,推进“官产学研”合作,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

4. 营销保障

城市文化品牌只有得到市场和民众的认可才能够成长起来,因此其培育过程必须重视品牌策划、宣传和推介^[8]。信息技术时代,营销传播手段的创新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的传承、成长和壮大。文化品牌的营销推广不仅要善于利用报纸、期刊、广

播、电视、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介,还要积极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媒体,使互联网、动漫、游戏、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兴媒介成为城市文化品牌宣传的有效载体。应大力推进中原网、郑州晚报、郑州电视台等市直重点媒介的建设,使之具有一定的国内外影响力,成为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宣传的主要载体。同时,应通过深度挖掘和精心策划,在相关媒介上推出文化品牌建设的专题、专栏和专项报道,如同河南电视台《梨园春》《华豫之门》《武林风》《汉字英雄》等专栏一样,打造具有郑州文化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和民众需求的城市文化品牌。

5. 人才保障

针对当前郑州文化人才不足的现状,需大力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文化名人名家培育工程,塑造文化领军人物和名人大家。首先,可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利用郑州大学等优势教育资源,联合知名文化企业,针对行业需求进行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建立专门的人才数据库。其次,可通过各种方式在文化产业各领域引进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善经营、懂管理的行业权威和核心人才,形成人才优势。再次,应推进文化经营人才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鼓励相关高校设置文化产业相关学科,支持郑州市动漫基地、石佛艺术公社等园区参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

六、结语

郑州市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发展

潜力巨大,是一座有文化和灵魂、有信仰和精神的都市。郑州市应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和城市个性,制定和出台扶持政策和措施,创意策划文化精品和文化活动,大力进行技术和创新人才引进,在文化旅游、节事会展、演艺娱乐、影视动漫、名人故里等方面重点培育大项目、大品牌,以实现郑州市城市文化品牌的创建和持续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陈乐,蒋海君,蒋俊杰. 品牌资本[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 [2] 曹世燕. 城市文化品牌的内涵及打造途径[J]. 大家, 2012(5):17.
- [3] 刘建军. 郑州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问题研究[J]. 郑州师范教育,2014(5):78.
- [4] 昨丽慧. 历史是城市的灵魂[N]. 郑州日报,2014-10-28(08).
- [5] 王鲁峰. 大河报品牌价值28.63亿连续9年入围最具价值品牌[N]. 大河报,2012-06-29(7).
- [6] 韩岚. 省会将打造文化娱乐之都[N]. 河南工人日报, 2011-07-18(4).
- [7] 罗容海. 文化名人故里行:墨子故里的“下一步”[N]. 光明日报,2011-12-19(15).
- [8] 王建南,方忠,陈伟雄. 打造文化品牌,提升福建文化知名度的思路和策略[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3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2-0073-05

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提升路径探析

王萍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会计系, 福建 福州 350012)

[摘要]非营利组织具有的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利他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着政府和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的现状,为打破外部环境、内部管理和公信力等因素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的制约,提出可通过强化商业化营销理念、构建共同愿景、构筑战略合作联盟、完善监督体制和建立激励机制等路径,使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得到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CORPS模式;绩效提升;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F270;C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6

绩效是检验一个单位实体运营情况的重要指标,但长期以来由于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使其并不十分重视运营绩效。与其他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利他性等特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着政府和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非营利组织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所以,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比其他组织更为重要。

有些管理者片面地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特征,无需为股东创造利润,其追寻美好理念、服务社会的工作过程就是绩效,所以无实施绩效评估的必要。非营利组织虽然不产生或只产生较少数额的利润,但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出资或社会各界的捐赠,为使善款发挥最大效用,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取得更多的资金来源,其同样需要绩效管理。

非营利组织有服务社会和改变社会的美好愿景,其开展业务活动的主旨虽不在于拓展组织规模或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服务社会,为更多的人提供福利,但非营利组织绩效的提升既能够促进组织内部服务能力的提高,也能够促进组织外部服务质量

的提升,惠及更多社会民众,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例如,扶贫基金会绩效的提升,将提高其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服务质量;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工作绩效的提升,可惠及更多残疾人,让他们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因此,本文拟基于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针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的制约因素,提出其对策建议。

一、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

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和使命是服务民众以解决社会问题,其组织的各类物质资源源于政府拨款或社会各界的无偿捐赠,所以,非营利组织应更加注重绩效评估,制定严谨、有效的工作绩效考核标准以加强绩效考核。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核除经济绩效考核外,还应包含周边绩效考核,即对与非营利组织运营和服务目标完成相关要素的考核,如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态度、团队作风和工作风格,以及团结协作能力等的考核。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指出,对非营利组织而言,衡量其成败的标准不仅仅是财务指标的好坏,更需要衡量其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程度,如此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和产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JB11426S)

[作者简介]王萍(1969—),女,福建省建瓯市人,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会计理论。

品,更好地履行组织的宗旨、社会责任和使命^[2]。所以,非营利组织绩效衡量指标还应包含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目标服务群体的满意度、组织创新力的提升和组织团队成员的成长程度等内容。

与企业等营利组织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同,非营利组织是以社会服务最大化为目标,其目标的模糊性与多样性导致其绩效难以准确衡量。S. Toepler等^[3]提出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应考虑社会服务数量和过程、达成的社会影响力和创造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缪建红等^[4]根据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和运作的特点,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的五要素即CORPS模式:服务对象、创造价值的业务运作、资源、参与者(包括志愿者和全职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五要素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作用、系统互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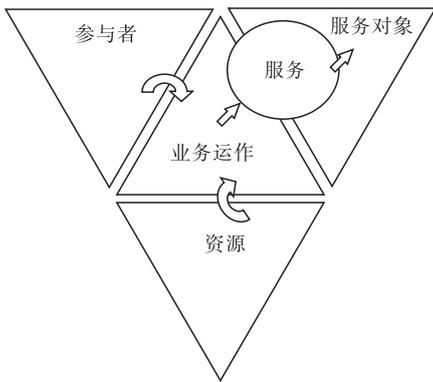


图1 CORPS模式及运作流程

运用科学合理、系统有效的评估手段和方法,对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服务质量、管理效率和社会满意度等绩效指标进行衡量,以确定其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组织目标效率的系统管理过程即为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CORPS模式实现了静态过程和动态过程的有机结合: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方法、指标和评估的信息支撑和管理规范构成其静态过程;绩效评估的评估目标构建、评估方案制定、目标数据收集与处理、报告撰写和结果反馈等构成其动态过程。从国外的评估实践看,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通常由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进行,因为其绩效评估服务更加专业,绩效评估结果更为可靠、客观。国外非营利组织绩效由第三方评估历史悠久,发展成熟。例如,1854年英国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委员会,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会员单位18.9万个,雇员50万人,志愿者300万人,其主要职责是进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监督与绩效评估。1918年

美国成立了全国慈善信息局(NCIB),是专门从事慈善机构评估的、全国性的、独立的、民间的非营利机构,也是全美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并定期修订慈善机构绩效评估准则,定期评估美国的全部慈善机构,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以便社会各界了解各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和绩效成果,对资助对象的合理选择提供有益的帮助。90多年来,NCIB潜心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业界和民众中确定了权威地位,其所使用的绩效评估标准是非营利组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导向。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的制约因素

1. 外部环境

1930年代后,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究其缘由,主要是美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引发的一系列市场和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对各类非营利组织倾斜,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持。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涌现出的许多社会问题虽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天时”之利,但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未给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地利”之势。我国社团一般都受到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必须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册,但业务主管部门一般是党政机关或其委托单位,所以完全民间性质的非营利组织在注册问题上困难重重。

竞争是一个实体发展的源动力,但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方面的法规常呈现出限制竞争、保护垄断的态势。例如,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对业务范围相近社团的成立予以限制,使社团丧失了创新意识、缺乏活力和发展动力;再如,非营利组织只能在登记机关的管辖区域内开展活动,不得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也不得跨区域开展业务,致使垄断加剧,制约了非营利组织绩效的提高。

另外,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范围宽泛,部分还要承担其管辖组织的过失责任,所以有些业务主管部门工作消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还严格限制社团活动内容。部分主管部门可能因要承担所辖社团的过失责任,不仅不提供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需资源和优惠政策措施等,还设置重重关卡,严重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活力,制约

了非营利组织的进步空间,使非营利组织的绩效提升难上加难。

2. 内部管理

不仅宏观政策环境不利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而且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机制也对其绩效的提升造成掣肘:一是非营利组织决策机制不够健全。成熟的决策机制与优秀的决策团队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营理念和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也直接关系到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我国非营利组织大多采用双轨制管理模式,行使决策职能的理事会其主要成员多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担任。据学者陈俊龙^[5]的调查,我国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由主管部门派遣或任命的占61%,根据组织章程民主选举产生的只占28%,还有10%的负责人的产生无固定规则或不明确。在非营利组织决策方式方面,由理事会决定的占46%,由负责人集体协商决定的占18%,由负责人个人决定或其他方式决定的占25%,由民主协商决定的仅占11%。可见,多数非营利组织民主决策和监督体制缺失。决策者产生途径的不科学和决策体制的不民主,易滋生内部腐败与不正当行为,是造成非营利组织公益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提升的关键因素。二是人力资源配置低效。非营利组织的人员配置不能满足组织业务拓展的需要,效率较低。非营利组织专职工作人员配备少,入职门槛低,整体素质不高。多数非营利组织由于资源限制,无法配齐工作人员或聘请高素质专职员工,一人多岗现象普遍,更无法创新性地开展工作。另外,部分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过于依赖,但志愿服务具有不稳定性特征,如果出现志愿服务不能有效组织活动的情况,组织便不能正常运转。

3. 社会公信力

公信力是指为某一事件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人和”,对其绩效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由于非营利组织既没有政府所拥有的被先天赋予的权力和不可代替的优越地位,也没有营利企业的利益驱动,因此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与支持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这个驱动力就是公信力。“郭美美事件”就是公信力影响非营利组织绩效的最好例证。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公众最为认可的安全捐款通道之一,但“郭美美事件”完全颠覆了公众对红十字会的看法。尽管事后中国红十字总会进行了澄清,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

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为62.6亿元,而6~8月降为8.4亿元,降幅达86.6%^[6]。

社会公信力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宏观层面,而且还表现在微观层面。非营利组织在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时容易出现主观行事和避重就轻倾向,主观行事可能导致绩效远低于预期,避重就轻则会使管理者偏向于选择容易实现的测评绩效,使组织使命的推进受到影响,此时,公信力在督促组织管理者制定符合使命和公众信任的业务方向上将起到重要作用。公信力要求非营利组织应依据使命制定规划,并且需在行动前部署,密切考虑利益相关方及其诉求,建立起整合各利益相关方目标的本组织的统一目标。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提升的应有路径

1. 强化商业化营销理念

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市场竞争虽不激烈,但并非没有竞争。在政府支持力度不大、社会资源不足、公众志愿服务不强的状况下,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众推介以提升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和促进其良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营利组织逐步介入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服务范畴(如社会养老服务项目),并运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也降低了机构的运行成本,非营利组织的运营频受挑战。对此,非营利组织应转变思维模式,培养商业化营销理念,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有效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商业化营销不是要转变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特质,而是要运用商业化营销手段以增强其影响力,扩大组织规模,拓展获取资源的途径,最终实现用最低成本提供最优质服务的目的。非营利组织强化商业化营销理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公众营销的第一步就是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以了解和掌握目标服务群体的需求。二是明确自身定位。要运用SWOT分析方法,掌握行业现状,明确行业内组织与自身的优劣,准确进行角色定位,并采取匹配的运营策略。三是精准市场细分。市场细分可使非营利组织集中有限资源,针对细分市场设定满足目标群体的服务项目,使组织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四是提升产品竞争力。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目标群体需求的产品,并通过宣传引导使其认可和接受所提

供的服务,运用营销手段构筑消费者对非营利组织服务项目的信心,提升产品竞争力,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2. 构建共同愿景

愿景即共同的愿望,是所有组织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可并为之付出努力的任务、事业或使命^[7]。愿景并非具体的行动方案,但它能通过明确非营利组织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而在组织成员间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催化迸发出强大的驱动力与创造力,进一步提高组织绩效。

愿景由价值观、目标、使命和愿望构成,这四个因素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非营利组织共同愿景的构建,可通过团队集体学习、共同语言培养、深度访谈与自我超越等步骤来完成。个人愿景是组织共同愿景的基石,共同愿景产生的效果远远大于个人愿景的简单相加,共同愿景的形成也是每个组织成员个人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构筑战略合作联盟

非营利组织的战略合作联盟包括与营利组织或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战略合作。战略合作联盟对于公益事业的推广与商业行为的推进能起到双赢的作用,其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商业捆绑营销。商业捆绑营销是将营利企业的商业活动与非营利企业的公益事业捆绑,在商业推广的同时倡导公众参与公益行动,并将营销收入的一定份额捐赠给公益事业。商业捆绑营销,对营利组织而言,既可树立企业形象,履行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也可增进其营销收益;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可提高其知名度,拓展其收入渠道;对消费者而言,可在不增加支付的基础上间接参与公益活动,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可见,商业捆绑营销可实现非营利组织、商家和消费者三方的共赢。如泸州老窖集团2009年11月发动的公益活动,在昆明地区每销售一瓶“国窖1573”就向云南省红十字会捐助5元,2013年捐助资金约90万元,既增加了自己的营销收益,又树立了企业形象,同时也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二是共同主题营销。共同主题营销是指服务主旨相近的若干非营利组织和若干营利组织结成战略联盟,通过宣传倡导、知识普及与产品分发等形式,帮助解决目标群体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通过共同主题营销,非营利组织可完成主旨工作任务,营利组织可在目标群体中树立自己的企业形象。如近期美国保健基金会、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妇产学院

与《Glamour》杂志和黑尼斯针织品公司达成共同主题营销,发起了“保护乳房健康”的公益活动。该活动通过举办免费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和在主流杂志上刊登相关科普文章等形式,呼吁女性关注乳房健康。运用该项营销,上述三家非营利组织扩大了影响力,筹集到了业务发展所需资金,《Glamour》杂志和黑尼斯公司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扩大了产品的受众群体。

三是经营特许经营。经营特许经营指营利组织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或采取利润分成的方式,特许使用非营利组织名称或商标的营销方式。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其社会声誉一般优于营利组织,双方的合作有利于提升营利组织的正面形象。但此法对非营利组织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一些营利组织在特许经营中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会对非营利组织提出各类要求,从而降低了非营利组织活动业务的灵活性;再如,特许经营会给公众带来一种非营利组织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渠道的印象,以致会降低社会捐赠的热情和额度。

4. 完善监督体制

完善监督体制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共同构建包括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同行督促和机构自律的多维监督体制,从不同角度进行监督,确保非营利组织运营资金的透明及高效使用。

一是政府部门应专设绩效评估机构。现行体制下,非营利组织的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管理者、评估者和监督者三种角色,无法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准确。此外,由于目前评估方法偏向于“领导型”而非“指导型”,评估重点在于非营利组织既定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违法违规事项的查处,而不在于根据评估结果对非营利组织的绩效提升与能力建设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因而专设政府机构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具有积极的意义。

非营利组织的宗旨是服务公共利益,推动社会福利,此功用正是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延伸和补充。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除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外,更应达成一种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政府部门应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非营利组织实现其使命和宗旨。政府部门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应管、评分离:一方面,从严管理,优化指导,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促使非营利组织良性成长;另一方面,实施有效评估,促进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谋求创新,进而实现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公众的“三赢”局面。

二是合理运用公众与媒体监督。社会公众与

各类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可促使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公开透明,推动其绩效的提升。社会公众是非营利组织运营资金的主要捐赠者,他们有权知道资金的使用情况;各类媒体接触面广、影响力大,对非营利组织可以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促使其实现规范化经营。

非营利组织或监管评估部门可创设平台,受理社会公众与各类媒体的投诉和建议,接受公众合理的查询,包括对非营利组织的资质、财务状况和业务开展情况等的查询。非营利组织对公众的质疑和咨询,应慎重调查取证并核实,在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及时反馈或采取应对措施,以维护非营利组织的形象和声誉,提升社会公众捐赠的意愿和积极性。

三是完善问责制等监督机制。公众问责制是基于非营利组织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问责制,其利益相关者包括现实和潜在的相关人员,前者包括资源捐赠者、管理层、员工、志愿者和新闻媒体等,后者包括将会与组织发生往来关系的人员。完善社会问责制的目的在于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健康有序运转,实现组织设立的宗旨。问责制可以使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对组织及其成员形成良好的监督作用;全方位的监督也将使非营利组织的关注度和认同度达到最大化,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使公益行为的传播产生“杠杆效应”,用最小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效果。

四是培养非营利组织的高度自律。非营利组织内部力量对自身的监督约束是确保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也是其绩效提升的根本动力。自律既需要管理者的宏观领导和个体的密切配合,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培养非营利组织的高度自律可通过以下途径:(1)增强非营利组织的使命感和信念意识,促使组织成员达成共同愿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高度自律;(2)完善内部治理,确保机构职能正常发挥,如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约束管理者的决策和项目执行者的行为;(3)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用制度约束培养自律,如制订和完善项目程序管理制度、筹

资使用管理制度,以及约束投资行为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等。

5. 建立激励机制

激励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非营利组织而言,激励效果虽然无法直接用组织收益来衡量,但也是达成组织目的的有效手段。非营利组织员工的工作态度对组织绩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运用激励方式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是现代管理的主要手段。

非营利组织属于公益性组织,真正使组织成员加盟的是精神层面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乐趣而非物质因素,这是非营利组织激励机制不同于营利组织的特色之处。但精神激励无法完全取代物质刺激,因而非营利组织也应在为员工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促进全员参与,让每个人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所以,非营利组织应采取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并用的策略,以精神激励为主,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组织绩效的不断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王萍. 非营利组织:典型国家税收制度比较及借鉴[J]. 渤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24.
- [2] 李劲. 德鲁克谈管理[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
- [3] Toepler S, H Anheier.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Nonprofit Management: An Overview [A]. Future of Civil Society 2004: Making Central European Nonprofit-Organizations Work [C]. Wiesbaden Vs Verlag fu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4:253-270.
- [4] 缪建红,俞安平. 非营利组织及其建立 CORPS 模式初探[J]. 市场周刊,2003(4):61.
- [5] 陈俊龙. 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D]. 上海:复旦大学,2003.
- [6] 陈仁泽. 舆情监测显示民众对政府专家及媒体信任度低[N]. 人民日报,2011-09-08(17).
- [7] 田志龙,蒋倩. 中国500强企业的愿景:内涵、有效性与影响因素[J]. 管理世界,2009(7):1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78-06

在线品牌社群中公民行为 对社群绩效的影响研究

王婷婷

(郑州大学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从社会资本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对社群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其影响是通过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与关系维度相互作用这一机制来实现的。企业应当建立和支持在线品牌社群的发展,并通过与社群成员的互动交流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促进社群成员积极实施其公民行为;提高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对于社群社会资本的感知,以提高在线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和品牌忠诚度。

[关键词]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网络密度;互惠规范;社群认同;品牌忠诚度

[中图分类号]F270;C9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7

2001年,美国德保罗大学的Muniz和威斯康星大学的O'Guinn提出了“品牌社群”概念,并指出,“它是建立在使用某一品牌的消费者间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一种专门化的、非地理意义上的社群”^[1]。企业通过建立品牌社群,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从而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品牌社群也渐渐呈现出虚拟化的发展路径。与传统的品牌社群相比,在线品牌社群克服了传统社群的地域限制,增强了接近消费者的便利性,如苹果手机论坛“威锋网”、小米论坛等,都是运营得比较成功的在线品牌社群。作为维系顾客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线品牌社群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在线品牌社群而言,提高社群绩效、培育社群成员的品牌忠诚至关重要。因为,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进而影响其对品牌的购买态度和购买行为,是企业建立在线品牌社群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因此,能否提高在线品牌社群的运营绩效是其经营成败的关键。学术界对社群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展开,

一个是顾客体验视角,另一个是社会资本视角。相对而言,社会资本视角是比较主流和前卫的视角。然而在已有的文献中,对于个体社会网络形成的研究还较少。Bolino等^[2]从理论上分析了实体组织中组织公民行为增加组织资本进而提高组织绩效的可能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旨在研究在线品牌社群情境下公民行为对社群绩效的影响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

D. Organ等^[3]率先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概念。组织公民行为是群体中成员基于自愿的自发性个体行为,这些行为并非源于报酬的激励,却促进了组织绩效的提升。

本研究借鉴了江若尘等^[4]对在线品牌社群中公民行为的概念界定和量表开发,把在线品牌社群中的公民行为从5个维度进行了划分,即正面口碑、积极参与、维护秩序、帮助他人和反馈。其中,正面口碑指的是对事物的正面评论或观点传播的行为;积极参与指的是在线品牌社群成员的积极发帖的行

[收稿日期] 2015-01-13

[作者简介] 王婷婷(1990—),女,河南省信阳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为;维护秩序指的是社群成员能够严格遵守社群规范,文明发帖,确保社群融洽、友好与和谐的行为;帮助他人是指向社群中的其他成员提供帮助的行为;反馈是指向社群提出意见或建议的行为。

2. 网络密度

J. Nahapiet 等^[5]对已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认为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然而,在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时,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他们也是从这一维度来选取描述网络结构的指标,如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和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公民行为对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即社会网络的影响,故选取的变量是网络密度。

3. 社群绩效

社群绩效是一个具有多层面测量指标的概念。就群体层面的社群绩效而言,其测量指标可以有公司业绩、品牌资产等;就个体层面的社群绩效而言,其测量指标可以有社群认同和品牌忠诚等。本文主要研究个体层面的社群绩效。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顾客体验、社会资本等视角探究社群绩效的影响因素,其中,社会资本视角是一个主流视角。

二、模型建立与假设

在线品牌社群是一种线上关系网络,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购买意愿和品牌忠诚会随着在线品牌社群中的活动而发生变化,随着关系网络的形成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成员在关系网络中能够获取社会

资源或资本,从而增强对品牌社群的认同和对产品品牌的忠诚。

从在线品牌社群的视角最早研究社会资本相关问题的是 C. Mathwick 等^[6],其研究在具有开创性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对社会资本的前置因素和结果变量进行探讨。笔者在 C. Mathwick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整合,建立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对社群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见图1)。

截至目前,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大量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即组织公民行为对群体或组织的有效运作有利。Bolino 等^[2]认为,群体中个体组织成员的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促进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促进组织绩效的最终提升。尽管在线品牌社群环境与现实环境存在一定差异,但社群中的公民行为仍然会对组织绩效的提高做出贡献。由于本文着重分析公民行为对品牌社群认同和品牌忠诚的影响作用,故作出如下假设。

H₁: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公民行为对品牌社群认同有正向影响作用。

H₂: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公民行为对品牌忠诚有正向影响作用。

Bolino 等^[2]从理论上分析了组织公民行为增加组织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社会资本结构维度中的网络密度作为研究变量,借鉴江若尘等对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的概念界定,作出如下假设。

H₃: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公民行为对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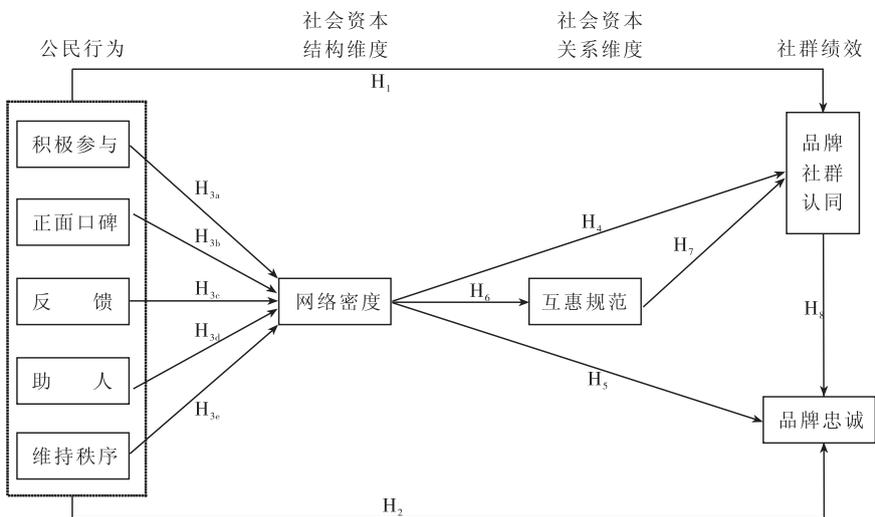


图1 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对社群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

络密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H_{3a}: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积极参与行为对网络密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H_{3b}: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正面口碑对网络密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H_{3c}: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反馈对网络密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H_{3d}: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助人行为对网络密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H_{3e}: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维持秩序行为对网络密度有正向影响作用。

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间的联系越亲密,他们就越可能形成对该社群的认同感和对该品牌的忠诚,而用于衡量成员间亲密程度的指标正是网络密度。在线品牌社群中成员的互动性越高,越加速了社群网络中信息和资源的交换速度,从而进一步促进在线品牌社群中成员共享价值观、社群认同和品牌忠诚的形成。据此,我们可作出如下假设。

H₄:在线品牌社群中,网络密度对品牌社群认同有正向影响作用。

H₅:在线品牌社群中,网络密度对品牌忠诚有正向影响作用。

曾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社会连带强度)会影响关系维度(信任)。相似地,作为结构维度的网络密度也有可能影响作为关系维度的互惠规范,因为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通过参与密集网络进行互动,有助于建立成员间的互惠期望。在线品牌社群中的成员联系密切,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信息和情感交流,会提高成员的互惠规范,也希望其他成员遵守互惠规范,从而使得社群能够持续发展;相反,如果在线品牌社群中的成员联系不密切,成员就缺乏与他人交流的动力,也不会提供他们所需的产品信息和社会支持。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假设。

H₆:在线品牌社群中,网络密度对互惠规范有正向影响作用。

互惠规范是在线品牌社群运行的根基,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行为是短暂的。在充满互惠规范的社会网络中,个体的集体意识更强,因此对在线品牌社群的认同感也越强。在线品牌社群中即使发生弱连带间的交换行为,也会蕴含着个体之间的互惠规范意识。互惠规范会强烈影响在线品牌社群中的社群

认同行为。品牌社群认同是指社群成员将自己视为品牌社群的一员,从而拉近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关系^[7]。研究表明,在线品牌社群中,基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互惠,社群成员能够共同创造和分享区别于其他社群的符号标识,共享品牌的意义和与品牌相关的历史故事。这些独特的标识和文化可促进成员对社群的认同^[8]。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假设。

H₇:在线品牌社群中,互惠规范对品牌社群认同有正向影响作用。

在此之前,Algesheimer等^[7]已经对社群认同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本文中,在线品牌社群认同指的是社群中的成员将其自身视为品牌社群的一分子,并且认可社群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除了社群认同,品牌忠诚也是社群绩效在个体层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测量指标。毋庸置疑,企业积极创建在线品牌社群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培育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在在线品牌社群中,当社群成员所处的社群把他们纳入其中时,就会对该社群产生归属感即产生社群认同,他们更愿意与社群保持长期联系,成为社群的中坚分子,可见社群认同能够促进品牌忠诚。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假设。

H₈:在线品牌社群中,品牌社群认同对品牌忠诚有正向影响作用。

三、研究方法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所用问卷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前人开发的比较成熟的量表,并结合在线品牌社群的实际情况而设计的,最终形成的问卷包括四部分:一是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基本情况调查,共5个题项;二是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调查,包括5个维度,共20个题项;三是在线品牌社群中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网络密度)和关系维度(互惠规范)调查,共5个题项;四是在线品牌社群绩效调查,共2个维度,12个题项。具体情况见表1。

所有题目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要求被调查者表明态度。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运用所设计的问卷对某小米社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小米社区中,在性别方面,男性所占的比例(78.9%)远远超出女性所占的比例(21.1%);在年龄方面,多以20~30岁之间的人为主;在文化程度方面,多为大专以上学历;在收入方面,没有收入却仍然购买小米产品的大学生居多;从加入社区的时间来看,1年以上的占66.7%。小米社区成立已久,并且一直在不断发展中,其中老成员

表1 在线品牌社群调查变量及测量指标

变量	测量指标
正面口碑	A ₁ 我常常向他人夸赞该论坛
	A ₂ 我会努力说服朋友尝试参加该论坛
	A ₃ 我会向朋友推荐该论坛
	A ₄ 我会向他人介绍该论坛
	A ₅ 我会向他人宣扬该论坛的优点
积极参与	B ₁ 我会在论坛中发起话题同大家讨论
	B ₂ 我会在论坛中分享产品体验
	B ₃ 我会主动跟帖参与讨论
	B ₄ 产品使用的疑问我会在论坛中发帖求助
公民行为 ^[4]	C ₁ 严格遵守论坛规范
	C ₂ 从来不对论坛成员进行人身攻击
	C ₃ 论坛成员的态度都很友好
	C ₄ 别人对我不礼貌,我不会与其在论坛中对骂
助人	D ₁ 论坛成员遇到问题,我会尽我所能给予帮助
	D ₂ 帮助论坛新成员熟悉并了解该论坛
	D ₃ 发帖介绍产品使用经验供论坛成员参考
反馈	E ₁ 论坛内有人发帖不文明,我会举报
	E ₂ 论坛内有人发广告贴,我会举报
	E ₃ 向论坛提出改进建议
	E ₄ 对论坛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
社会资本	F ₁ 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
	F ₂ 成员之间的交流很多
	F ₃ 成员之间经常一起讨论共同话题
互惠规范 ^[10]	G ₁ 从该品牌论坛得到帮助后我会回馈或者帮助其他人
	G ₂ 品牌论坛里的成员需要帮助时其他成员会提供帮助
社群绩效 ^[7]	H ₁ 谈到该品牌论坛时我通常是说,“我们论坛”而不是“他们论坛”
	H ₂ 把自己视为该品牌论坛的一分子
	H ₃ 品牌论坛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H ₄ 该品牌论坛就像表扬我一样
	H ₅ 该品牌论坛就像批评我一样
	H ₆ 常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该品牌论坛的
品牌忠诚 ^[11]	I ₁ 爱该产品
	I ₂ 去积极搜索有关该品牌的相关信息
	I ₃ 要购买该类产品时我会首先想到该品牌
	I ₄ 如果要再次购买该类产品时我还是会选择该品牌
	I ₅ 如有需要的话我会购买该品牌旗下的其他产品
	I ₆ 积极地向朋友推荐该品牌

不在少数。

2. 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问卷发放对象为小米社区的注册会员,为了提高最终的问卷回收率,笔者采用了多种渠道进行问卷的发放:一是利用短消息功能与在线会员进行交流;二是借助站内信的形式,随机选取会员发放问卷;三是把问卷以帖子的形式发放到论坛中的讨论版块;四是通过参加小米社区定期举办的线下互动,在活动间隙向会员发放问卷。通过以上四种问卷发放方式,最后共获取有效问卷237份。

表2 小米社区成员基本情况调查表

社区成员	基本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68	70.9%
	女	69	21.1%
年龄	15岁以下	0	0.0%
	15~20岁	15	6.3%
	20~25岁	94	39.7%
	25~30岁	108	45.6%
文化程度	30~40岁	20	8.4%
	初中及以下	0	0.0%
	高中	11	4.6%
目前收入	大专或本科	123	51.9%
	硕士及以上	103	43.5%
	还没有收入	81	34.2%
	2000以下	8	3.4%
成为会员时间	2000~3000	20	8.4%
	3000~5000	62	26.1%
	5000~8000	58	24.5%
	6个月以下	48	20.3%
	6个月~1年	31	13.1%
	1~2年	44	18.6%
	2年以上	114	48.1%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1.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又称可靠性分析,本文采用克朗巴哈 α 信度系数法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具体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有变量的克朗巴哈 α 系数均在0.70以上,这说明本研究的问卷与调研数据在信度方面的评估达到了公认的标准,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处理。

表3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表

因素	问项	载荷	标准误差	α 系数
正面口碑	A ₁	0.781	—	0.793
	A ₂	0.838	0.093	
	A ₃	0.710	0.096	
	A ₄	0.686	0.094	
	A ₅	0.796	0.097	
积极参与	B ₁	0.834	0.074	0.759
	B ₂	0.775	0.072	
	B ₃	0.824	0.077	
	B ₄	0.835	—	
维护秩序	C ₁	0.811	—	0.725
	C ₂	0.847	0.088	
	C ₃	0.765	0.092	
	C ₄	0.832	0.090	
助人	D ₁	0.847	—	0.789
	D ₂	0.886	0.062	
	D ₃	0.769	0.065	
反馈	E ₁	0.871	—	0.773
	E ₂	0.852	0.056	
	E ₃	0.822	0.059	
	E ₄	0.838	0.061	
网络密度	F ₁	0.796	0.078	0.786
	F ₂	0.832	0.090	
	F ₃	0.736	0.076	
互惠规范	G ₁	0.657	0.087	0.720
	G ₂	0.678	0.061	
社群认同	H ₁	0.655	0.058	0.733
	H ₂	0.938	0.053	
	H ₃	0.889	0.089	
	H ₄	0.698	0.065	
	H ₅	0.654	—	
	H ₆	0.823	0.054	
品牌忠诚	I ₁	0.867	0.063	0.755
	I ₂	0.789	0.075	
	I ₃	0.902	0.072	
	I ₄	0.765	—	
	I ₅	0.832	0.065	
	I ₆	0.883	0.067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来检验模型结构效度,使用 AMOS 17.0 统计软件对研究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观察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在 0.655 ~ 0.938 之间。吴明隆^[12]认为,因素负荷量值介于 0.50 ~ 0.95 之间,表示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该模型的拟合指数 χ^2 为 236.389,卡方比自由度(χ^2/df)为 1.94(在 2 左右),拟合残差平方根(RMR)为 0.035(小于 0.05),比较拟合指数(CFI)为 0.95(大于 0.9),规范拟合指数(NFI)为 0.91(大于 0.9),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 0.079(小于 0.08),均达到理想水平,表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2. 假设检验

以上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表明,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都达到了要求,适合做进一步分析。因此,本研究接下来将运用 AMOS 17.0 统计软件对初始概念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路径系数与结论见表 4。

从表 4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公民行为到社群认同的路径系数为 0.442、 T 值为 4.608,表明公民行为对社群认同有正向影响,同样公民行为对品牌忠诚也存在正向影响(路径系数 = 0.705, $T = 8.682$),因此假设 H₁“在线品牌社群中,公民行为对社群认同具有正向作用”和假设 H₂“在线品牌社群中,公民行为对品牌忠诚具有正向作用”得到支持。公民行为的 5 个维度与网络密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917、0.749、0.995、0.787、0.869,均是正数, T 值分别为 6.704、7.724、7.242、3.974、3.818,均大于 2,这表明公民行为的 5 个维度与网络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_{3a}、假设 H_{3b}、假设 H_{3c}、假设 H_{3d}和假设 H_{3e}同时得到了支持。本研究的

表4 模型路径系数与结论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值	结论
H ₁ : 公民行为→社群认同	0.442	4.608	支持
H ₂ : 公民行为→品牌忠诚	0.705	8.682	支持
H _{3a} : 公民行为的积极参与维度→网络密度	0.917	6.704	支持
H _{3b} : 公民行为的正面口碑维度→网络密度	0.749	7.724	支持
H _{3c} : 公民行为的反馈维度→网络密度	0.995	7.242	支持
H _{3d} : 公民行为的助人维度→网络密度	0.787	3.974	支持
H _{3e} : 公民行为的维持秩序维度→网络密度	0.869	3.818	支持
H ₄ : 网络密度→社群认同	0.884	5.327	支持
H ₅ : 网络密度→品牌忠诚	0.833	6.863	支持
H ₆ : 网络密度→互惠规范	0.652	7.763	支持
H ₇ : 互惠规范→社群认同	0.896	8.724	支持
H ₈ : 社群认同→品牌忠诚	0.894	6.608	支持

假设 H₄、假设 H₅、假设 H₆、假设 H₇ 和假设 H₈ 同样显著,说明在线品牌社群中的网络密度对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品牌忠诚和互惠规范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在线品牌社群中的互惠规范对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感有显著影响,而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感对其品牌忠诚度也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了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的公民行为影响社群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对社群绩效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影响是通过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网络密度)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互惠规范)相互作用这一机制实现的;公民行为的积极参与维度、正面口碑维度、反馈维度、助人维度和维持秩序维度都对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有正向影响作用,网络密度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互惠规范)和社群绩效中的社群认同和品牌忠诚,互惠规范也会正向影响社群认同;在在线品牌社群内部,成员的社群认同感同样正向影响着品牌忠诚。

目前,国内从公民行为视角研究在线品牌社群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章尚属罕见。本文对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影响社群绩效作用机理的研究,为企业建立在线品牌社群进行有效的网络营销提供了新思路。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企业应当建立或支持在线品牌社群的发展,并通过与社群成员的互动交流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应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促进社群成员积极实施其公民行为;应提高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对于社群社会资本的感知,以提高在线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同和品牌忠诚。

[参 考 文 献]

[1] Muniz A M Jr, O'Guinn T C. Brand Community[J]. Jour-

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1(4):412.

- [2] Bolino M C, Turnley W H, Bloodgood J M.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z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4):505.
- [3] Organ D, Ling L A. Personality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5(3):339.
- [4] 江若尘,徐冬莉.虚拟品牌社区公民行为概念界定与量表开发[J].软科学,2012(10):121.
- [5]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242.
- [6] Mathwick C, Wiertz C, Ruyter K D. Social capital production in a virtual P3 commun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8(6):832.
- [7] Algesheimer R, Dholakia U M, Herrmann A.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brand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ar clubs[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5(3):19.
- [8] Muniz Jr, Albert M, Hope Jenson Schau. Religiosity in the abandoned apple newton brand commun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5(4):737.
- [9] Antla K D, Frazier G L. The severit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in interfirm channel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4):67.
- [10] Coleman J.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Supplement):95.
- [11] Baldinger A L, Rubinson, J. Brand Loyalty: the link between attitude and behavior [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96(6):22.
- [12]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运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84-04

完善我国企业股权激励制度探析

李方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绩效激励创新,约束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留住人才,稳定企业员工队伍。我国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时面临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市场存在弱有效性、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有效性和法律法规限制等障碍。为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应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财务会计、税收、薪酬管理制度,借助股权激励优势更好地实现企业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联合。股权激励对企业发展是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方式,其有效实施能够充分发挥股东和员工的工作潜能,促进企业发展与股东价值的双向增值。如何实施股权激励制度,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对健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的良性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股权激励;人力资本;员工持股;薪酬制度;股票期权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8

我国证券市场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始于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开始起步并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2008年,中国证监会连续出台了《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第1号、2号、3号,为加快股权激励在国内企业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上海贝岭、华为、中兴等大型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的成功实施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经验借鉴,股权激励开始成为目前企业针对内部核心员工的主要激励制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可实行员工持股,使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本文拟通过探究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必要性和目前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主要形式和存在问题,进而提出完善股权激励制度的对策,以期更好地实现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联合。

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必要性

随着公司制逐渐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从企业外部的行业选择和生存环境来探讨企业

的存在与发展之道,以及从企业内部来研究企业自身的生存状态,都成为热点话题。最具代表性的从内部对企业进行研究的理论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将企业看作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认为如何为经营者提供动力并进行有效的约束是关乎企业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认为,要让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员工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约束有度,从而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仅仅依靠传统的薪酬体系是难以完成的,而给予经营者或者员工以股权激励则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有利于绩效激励创新

实施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公司股东,从而有权利分享企业盈利和经济利润。经营者因工作能力出众和业绩突出而获得奖励或因经营失败而受到惩罚,这种预期的收益或损失对企业员工是一种导向,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员工成为公司股东后能够分享高风险经营带来的高收益,

[收稿日期] 2015-02-10

[作者简介] 李方(1982—),女,河南省长葛市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这将刺激他们潜能的发挥,更好地服务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促使经营者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不断采用新技术以降低成本,并勇于进行制度改革,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2. 能够约束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

传统的激励方式如年终奖金、项目分红等,其依据主要集中在员工的短期财务数据,于是,职业经理层可能会因为短期的财务指标而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从而纵容了经营决策者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约定,对未来资产实现增值后的资产所有权进行部分让渡,从而以较少的现金支出获得企业的最大增值。股权激励更关注的是公司未来的价值创造能力,它不仅能使经营者在任期内得到适当的奖励,而且可使经营者在卸任后仍可获得部分延期收入,这就会促使经营者不仅重视在任期内提高业务水平,提高所在岗位的工作业绩,还必须要关注所在企业的长远发展,以保证自己获得更多的延期收入,从而大大削弱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有利于留住人才,稳定队伍

企业和员工的关注点是不同的:企业主要考虑如何用较低的现金成本稳定员工、锁定和促进员工的长期贡献;员工主要考虑如何从企业眼前的业绩增长中尽快获得收益、从企业未来的高成长中获得未来的利益。实施股权激励制度,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吸引更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之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持续收益,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主要形式和现存问题

1. 我国企业常用的股权激励形式

早在1950年代,美国的福特、辉瑞制药等企业就通过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等形式给予员工以激励。目前我国企业常用的股权激励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给予员工虚拟股权,员工获得虚拟的股权比例,并不获得实际的股权,获益与对应公司股权的分红相关;二是给予员工股权增值权,员工按照一定的股权比例获得对应的股权增值收益;三是直接授予股权,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向员工授予公司的股权;四是给予员工股权期权,授予员工在未来某一时间

购买或获得股权的权利。

如果公司在短期内业绩增长有限,那么授予员工虚拟股权或股权增值权的激励方式均会给公司造成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而且虚拟股权并不会对员工的长期表现产生较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员工的收益与分红有关,即使业绩下滑,也可能会得到分红。尽管股权增值能将员工利益与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挂钩,但由于员工未得到实际股权,并不会和其他股东一起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因而其激励作用也十分有限。

采用直接授予股权和方式,员工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股权”(一般情况下授予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公司可以用这种方式代替现金支付,从而节省成本。另外,员工获得股权后,其利益便与公司整体利益挂钩,这对锁定员工的长期贡献具有重大意义。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一旦其获得真实的股权,则不仅可在公司有盈利时获得分红,而且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分享公司未来发展的收益。

2. 我国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现存问题

我国于1990年代引进股权激励制度,但在2005年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一直发展缓慢,直到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后,股权激励制度才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中有近350家实施了股权激励制度,2006—2012年,已有近500家上市公司陆续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由此可见,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企业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但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可能会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减少了代理矛盾,加强了监督和制衡,有利于企业稳定,但是,国家股所占比重过高会导致股东大会在某种意义上形同虚设,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依旧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不但不能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还可能会促使企业管理层在实施股权激励之前刻意降低公司收益率,进而压低股价,甚至发布利空消息以打压股价;同时在实施股权激励后释放隐性收益,驱使股价回升,人为加大股价波动,从而获得超额收益;更有甚者个别企业会直接进行“会计造假”,虚报利润或者隐瞒成本从中获益,其结果是原本用来激励公司发展的模式却成了管理者中饱私囊的工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上市,而现有

的一些监管制度是由早期的国有企业在股权激励中形成的,并不适合民营企业。此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在监督约束方面仍存在许多欠缺,很多上市公司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制定的激励条件非常低,甚至低于公司几年前的业绩水平,或者有名无实。在这种情况下所制订的股权激励计划,根本无法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只不过是很多公司管理者获取短期利益或者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罢了。

其次,资本市场存在弱有效性。股权激励的本质是用社会的财富、未来的财富、员工和企业上下游的财富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与利益相关者共赢的机制,这就要求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必须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包含所有与公司经营有关的信息,包含专家对公司经营情况和经济情况的预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晚、经济环境尚不完善,所以仍处于初期发展的弱有效性阶段。我国资本市场股价波动尚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政府相关政策将制约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社会资本的移动也将直接影响股票市场。

再次,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有效性。实施股权激励机制首先要求经营者的收入直接反映股票价格或股权价值的变动,然而在现实中,二者的变动不仅取决于经营者的业绩水平和努力程度,还受到诸如经济形势、政治环境等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当前股权激励对经营者的绩效测评,侧重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绝对业绩,侧重于单一的经济利润,对比较业绩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因而不同行业 and 不同规模的企业其股权激励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别。

最后,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一定的法律法规限制。我国《公司法》规定,除发起人认购股票外,“其余股票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应向原股东配售或向社会公开募集,公司一般不得留置”。这就使得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无法预留股份以备将来实施股权激励。另外,所有的股票发行和回购都需要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4条和第26条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股票期权计划实施的时间,加重了股票期权计划的人力资本,增加了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成本。《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的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由于我

国现阶段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这些规定虽然可以限制严重的内幕交易等不规范行为,但在客观上也阻碍了企业推行股权激励,削弱了股权激励的效力。

三、对完善我国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建议

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从设计到实施应遵循以下要求:(1)公平性,配置份额的规则需一致,参与对象在享受分配利益上应一致;(2)共赢性,从董事到员工应有共同利益目标,合理定价,增加回报;(3)激励性,使股权激励的受益者能够充分发挥创造力,最大程度地共享价值;(4)灵活性,股权的定价、分配需灵活有弹性,要有灵活的退出机制;(5)保障性,对股权的利益风险要有基础保障;(6)约束性,对股权的持有人给予一定程度的行为约束,股权的交易需有严格的交易规则;(7)持续性,要保持股权的持续价值,对其发展应有明确定位;(8)合法性,股权激励的实施过程必须合法操作,有协议有约定。针对目前我国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实施股权激励制度首先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管理层、员工、政府、金融机构等之间的关系,可实现企业的特定经济目标。因此,我国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实施股权结构多元化,提高股权激励制度的激励强度,加大股权激励的激励幅度。

一是强化我国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鉴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存在大量的非流通股,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普遍,必须在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中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以实现权责明晰。

二是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完善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才市场体系是股权激励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直接关系到新型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开发和利用。因此,要改革经理层的选聘机制,逐步培养职业化的经理人,培育具有竞争性的经理人才市场,使企业和经理人能够双向互选,同时加强经理人员的自我约束,为实施股权激励创造良好条件。

三是建立科学、民主的绩效考核制度。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授予被激励对象的利益与责任的博弈,即如何处理好员工责、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有完善合理的业绩考核指标

体系。就我国企业目前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况来看,仅以财务指标来衡量被激励对象的综合素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财务指标易被高管等利用成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引发股票期权的到期风险。因此,除财务指标之外还应设计必要的定性指标,诸如考核被激励对象的道德品质、执业能力、创新水平等,以做到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并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并用、物质奖励与非物质奖励并用。总之,应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一方面刺激被激励对象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可相对弱化管理部门的权力。

2.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制度性保障

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所需要的企业股票有两种获取方式:一是在内部增发新股,二是留存股票账户回购本公司股票。目前,《公司法》对上述两个渠道都有一定的限制。同时,《公司法》和相关的证券交易法规还严格限制、约束公司经理人对企业股票的持有和转让,甚至一些上市公司在激励合约中以内部职工股的形式把股权授予经理层和员工。所以,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必须完善股权激励相应的法律法规。首先,要进一步清理法律障碍,为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创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其次,要进一步细化操作规范,使企业股权激励制度规范化运行。再次,要制定相应的约束准则,对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给予严惩。

3. 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一是财务会计制度。我国目前财务会计制度中有关股权激励的规定比较模糊宽泛,可操作性不强。相关部门应对已有的会计准则进行不断修订与细化,结合我国目前股权激励制度发展情况,制定更利于推进其实施的会计准则;同时注重防范财务会计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弊端,保证股权激励制度财务安全。二是税收制度。我国目前股权激励制度刚刚起步,给予相应的优惠税收制度势必将有效促进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在转让股票时产生股权激励的纳税义务,将降低被激励对象持有股票的成本,有效规避股票下跌所带来的财务风险,从而增强被激励对象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信心。另外可根据

我国的现有国情改革税率,建立税率与持股时间的联动机制,让激励对象在不同的持股时期可以自由选择税率不同的税种,鼓励其长期持有股票,甚至离开公司以后依然持股,以实现长期的激励作用。三是薪酬管理制度。股权激励除了薪酬结构需要有激励性外,绩效考察也应公平、公正。应在确保员工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发展良好的劳资关系,使薪酬补偿与企业利润形成良好的循环补给,以增强员工的组织性和归属感。

四、结语

股权激励对企业发展是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方式,其有效实施能够充分发挥股东和员工的工作潜能,促进企业发展与股东价值的双向增值。如何实施股权激励制度,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对健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的良性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发展成果由人力资本分享是企业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的必然方向,企业的核心关注点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而股权激励是解决企业价值分配问题的根本性制度设计之一。在资本市场风起云涌的今天,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必须要结合条理而规范的员工持股模式,从而形成良好稳定的公司治理机构,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取得更大的效益。

[参 考 文 献]

- [1] 张敏.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12(22): 117.
- [2] 夏玲利. 我国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法律障碍分析[J]. 理论月刊, 2005(5): 111.
- [3] 魏桂梅. 浅谈国际股权激励模式及国内现状分析[J]. 中国高技术企业, 2007(12): 46.
- [4] 王晓. 简析我国股权激励制度模式与现状[J]. 现代商业, 2010(5): 9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88-04

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李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的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文化自觉;文字翻译;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B223.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9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道德经》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哲学、宗教、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德经》的现代通行版本分为《道篇》和《德篇》,共81章,虽然仅五千余字,但富含哲理,涵盖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政治论、军事论等。《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十分广泛,其英译历经数次高潮,依然方兴未艾。《道德经》英译本数量众多、内容繁杂,有的译本由于受到特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操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输出《道德经》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本文拟以文化自觉理念为指导,以《道德经》英译不同阶段代表性译者及其译本为参照,探究《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以期推动《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有效输出中国传统文化。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概述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倡的一个重要理念,

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特定文化群体对其文化生态环境要具有“自知之明”,要充分发挥认知文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清晰认知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交流等过程,明晰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自觉并不是要实行文化割据或者文化霸权,而是要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掌控文化的发展方向^[1];文化自觉理念的核心思想在于不仅要对我者文化做到自知,也要深刻认知他者文化,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处理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实现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他指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他将文化自觉的历程归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收稿日期] 2015-01-15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3-QN-519)

[作者简介] 李磊(1980—),男,河南省新野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与共,天下大同”^[1]。“各美其美”论述的是特定文化群体对“我者”文化所持的一种欣赏心理,“美人之美”是指特定文化群体要尊重和包容“他者”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要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特定文化群体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把握“我者”文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要尊重“他者”文化,尤其是要包容“他者”文化的差异性,洞悉“他者”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吸收“他者”文化的精华,促进“我者”文化的自主转型,使其适应不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自觉理念是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基本准则。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必然,正确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同一性的关系已经成为世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人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文明的发展态势都表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会导致异质文明彼此冲突,无论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中心主义都会产生文化交流中强势文化的霸权和弱势文化的抵抗,导致以“我者”文化的独特性殖民“他者”文化的差异性,造成异质文化相互排斥。冲突不是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正确路径。文化自觉理念主张摒弃“唯我独美”的“自我中心主义”,消解“文明冲突论”,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形态,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秉承文化自觉理念,实现多元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多元互补,有利于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

二、《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翻译理念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因子,翻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不同文明对话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翻译理念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功能对等、篇章等值、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念“过于关注语言的确定性,刻意寻求所谓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性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2]。操控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学派翻译理念,初步确立

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但有的文化翻译理念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对原文本的客观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对原文本所蕴含的文化独特性缺乏应有的包容。

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译者在《道德经》英译的过程中首先要对《道德经》具有“自知之明”。作为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不仅体现了老子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它不仅思想深邃,而且具有独特的诗学特色和美学特色。因此只有深刻理解《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特色,才有可能在英语世界准确传输其文化因子和文学因子。其次,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道德经》英译者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具有透彻的了解。译者只有洞悉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才能以“他者”的视野观照“我者”,更准确地领会《道德经》的内涵,理解老子之“道”,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把其等同于《圣经》等西方文化经典中的基督之“道”。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的清晰认识还有利于译者把握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以更有效的方式使《道德经》进入接受者的期待视域。最后,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道德经》英译者要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大,而是建立在对“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道德经》英译者要尊重“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包容《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经典的不同文化底蕴,尊重不同文化经典所蕴藏的不同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交际模式;另一方面,译者需要自信地译介、宣扬《道德经》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特色,以平等对话的态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道德经》英译者应在文化自觉翻译理念引领下,在对中西方文化“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坚持平等对话的原则,就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协商,顺应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思维模式和交流模式,着重输出《道德经》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化环境中旅行和飞散,以译介的路径推动中西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消解中西文化间的抵抗,避免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共生。

三、《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起源于1868年湛

约翰所译《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的出版。^[3]《道德经》英译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开始于1868年,结束于1905年;第二次高潮开始于1934年,结束于1963年;第三次高潮开始于1973年帛书《道德经》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后。笔者以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考量《道德经》英译历次高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和韩禄伯译本,阐述不同译者对待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态度,以及对文化互动产生的影响,探究《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知名的汉学家、《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中译者的代表人物,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和来华传教士的身份影响着理雅各对《道德经》的翻译。以“道”的译介为例,《道德经》不同注本对“道”有不同的注解,在吴澄注本中“道”被阐释为“路”。理雅各采信并盛赞吴澄的注本,将“道”最基本的含义归结为“道路”。在理雅各看来,“道(the way)”和西方基督教经典《使徒行传》中“the Way”的字面含义是一样的,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后者的首字母是大写的。但是,《使徒行传》中“the Way”特指耶稣所布之道,也就是说,理雅各是从上帝的视角审视老庄之“道”,用《新约》核心概念比附《道德经》之“道”,刻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西化为基督之道。理雅各对《道德经》注本的选择及其对“道”的译介使其顺利地将“道”纳入到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中,这就容易使西方受众误以为中国宗教也信仰上帝,甚至产生《道德经》是东方的福音书、老子是上帝派到中国传播福音的使徒的错觉。面对中西文化差异,理雅各以解读老庄原意为途径,向基督徒们呈现出另一种理解 God 的方式,一种通过消解——而不是征服——他者而达至唯一性的方式。^[4]理雅各把基督教教义作为审视《道德经》的标准,在其译文的引言中提出《道德经》中许多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思想内容是不正确的。在基督教与道教的对话中,理雅各将《道德经》作为辅助传教的工具,用基督教文化消解中国文化,没有凸显中国文化的特性,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不仅理雅各译本如此,《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中的其他译本也都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该阶段,以理雅各为代表的《道德经》译者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试图以西方文化同化中国文化,没有将《道德经》蕴含的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没有

能够体现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第二次《道德经》英译高潮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悲观情绪,促使许多西方学者反思西方文化。这就使许多西方学者有可能放下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医治西方危机的良药。《道德经》所蕴含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为西方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韦利指出,“原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文学性,而在于其言说的哲理,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细节上准确地再现原作所说”^[5]。韦利致力于对《道德经》的“文字翻译”,而不是“文学翻译”,换言之,韦利译本的目的在于忠实传递文本的内容,而不是文本的语言形式。受其西方汉学家文化身份的操控,韦利的《道德经》英译不可避免地给一些中国文化术语附加了西方文化的意义。然而,与理雅各的译本相比,韦利的译本基督化色彩较为淡薄,比较精细地传达了《道德经》的内涵。韦利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学者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焦虑,迎合了当时西方学者对于《道德经》哲学意义的诉求,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利对于《道德经》的“文字翻译”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较为准确地向西方受众传递了《道德经》的内容。从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来解读,韦利以一种趋于平等的文化身份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中国文化的异质元素,较好地激发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互动,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共鸣,使西方学者意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弥人类的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6]。与理雅各译本相比,韦利译本虽然没有能够重现《道德经》的语言美,但是较为理性和忠实地再现了《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文本《道德经》的出土再一次点燃了学术界对老子研究的热情,《道德经》译介随之又一次进入了高潮。《道德经》以散文诗体陈述哲学,意境幽深,韵味厚重,语言艺术性极强。《道德经》的诗学特色和美学特色等文学因子在该阶段受到译者的重视。韩禄伯(美国达慕斯大学教授,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研究者)对于帛本《道德经》的翻译与研究在该阶段具有重要的影响。韩禄伯的译本“力图保持原作的形美和音美,有时也根据需要,从句子的

构造、行文的语气方面做出一些变化,尽量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凝练,可谓既信且美”^[7]。如韩禄伯将“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翻译为“Disaster is that on which good fortune depends. Good fortune is that in which disaster's concealed”,准确地向英语世界《道德经》接受者展示了原文的辩证之美。再如,韩禄伯将“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译为“Fierce winds don't last the whole morning; Torrential rains don't last the whole day”,让英语世界读者充分领略了原文的对偶美。在《道德经》域外传播历程中,韩禄伯以帛文本为原本,向西方读者展示了《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韩禄伯深刻理解《道德经》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其译文不仅尊重《道德经》的表达能力,而且尊重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再现了《道德经》的意美、形美和音美,在《道德经》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文化特性,体现了文化自觉翻译理念,实现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保真,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

四、结语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对《道德经》英译三次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

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参 考 文 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 [2] 廖晶,朱献珑. 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 中国翻译,2005(3):16.
- [3] 刘静.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20.
- [4] 夏歆东. 《道德经》译者理雅各的理解前结构探析[J]. 外国语文,2014(2):156.
- [5] Waley, Arthur. 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1: III.
- [6] 辛红娟,高圣兵. 追寻老子的踪迹 ——《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82.
- [7] 冯晓黎. 帛书本《道德经》韩禄伯英译本刍议[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2):8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92-04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步对比分析

王润杭

(南京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语步分析作为体裁分析和体裁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论文摘要的重要手段。从语步分析角度出发,选取南京财经大学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和 EBSCO 外文期刊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各 38 篇,采用 Swales 的 IMRD 四语步模式和 CARS 三语步模式作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统计、对比,发现: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与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数量和语步组织结构大体相似,但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在语步组织结构和各步骤的运用上仍需要再提高,可以参照和借鉴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各语步组织结构和步骤的写作习惯以适应学术成果的国际化要求,并根据论文撰写者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以方便中国学者的理解。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撰写还应该注意:句子数量以 7~8 句为宜;语步的数量以四语步为主;CARS 三语步模式各步骤的合理运用等。

[关键词]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步组织结构;IMRD 四语步模式;CARS 三语步模式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20

摘要又称概要、内容提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注释的简短而扼要的陈述,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学术论文一般都有英文摘要并附关键词,其作用是让读者尽快地了解文章主要内容,并为人们进行文献检索和初步分类提供方便。语步分析作为体裁分析和体裁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论文摘要的重要手段。

根据体裁分析之侧重点的不同,体裁理论的流派可以大体分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特殊用途英语流派和新修辞学流派。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John Swales 是特殊用途英语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所建立的体裁分析主要涉及学术语篇体裁,重点分析其体裁结构和语言特征。根据 Swales 的观点,一个学术文本的介绍部分可以划分成不同语步,语步是一个具有明确目的和功能的意义单位,由不同的语言策略组成。以 Swales 等为代表的斯威尔斯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语篇体裁的宏观结构研究方面。Swales^[1]通过对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体裁特征进行研究和分析,总结出了著名的 IMRD 四语步模

式,该语步模式已成为学术论文引言部分普遍采用的结构框架。IMRD 四语步模式可概括为:确立研究领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介绍本课题研究的准备情况—介绍本课题的研究情况,即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Swales^[2]在对学术论文体裁分析的基础上修订了上述模式,提出了 CARS 三语步模式,即确立研究范围、指明研究领域的空白、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并且每个语步又包括不同的步骤。Gractz^[3]归纳了论文摘要的结构,认为论文摘要的最常见结构为四步:问题的提出、方法、结果和结论。Swales^[2]通过研究发现,论文摘要的结构与论文结构一致,即其结构也为引言—方法—结果—讨论四语步模式。早期关于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开始由引言、体裁向学术论文的摘要、引言、结果、讨论等各个部分渗透。

随着语料库研究的发展,以及体裁理论与语篇分析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于体裁文体和语篇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义、句法、语篇衔接等表层语言描述方面,而逐渐深入探讨学术论文语篇的系

[收稿日期] 2014-12-10

[作者简介] 王润杭(1990—),女,安徽省宣城市人,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统功能语法,以及宏观结构和体裁特征的认知层面。如王丽娟^[4]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框架,基于语料库分析了中英科研论文摘要的体裁特征和语篇差异;闫晓玉^[5]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中英文学术论文摘要的对比体裁进行了分析;王旻等^[6-7]采用语料库统计分析法,从语体学的角度出发,对中英科技论文英文摘要语体特征进行分析;于晖^[8]以符号意义作为切入点对学术论文摘要进行了分析;刘胜莲^[9]选取中英期刊的英文摘要对其进行了体裁研究和对比分析。

本文拟从对比的角度,运用斯维尔斯学派的语步分析方法,考察中文作者和本族语作者的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差异,同时分析中文作者英文摘要的语步结构运用的认知偏向,通过数据收集和对比分析,找出中文作者和本族语作者在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宏观语步结构撰写上的差异。这样可以为中文作者的英文摘要写作差异的形成提供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基于语料库的摘要对比体裁分析方面的研究,以期为国内学术论文写作实践和教学工作者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以供翻译工作者、论文撰写者借鉴。

一、样本选取及研究步骤

本文随机选取南京财经大学经济类硕士论文和EBSCO 外文数据库英文论文的英文摘要各 38 篇建立中英文摘要对比语料库,将这 76 篇英文论文摘要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南京财经大学经济类硕士论文的英文摘要写作大多数是基于对中文摘要的文本翻译,虽然在词汇、句法、语义层面属于正确的对等译文,但在宏观语步结构和体裁特征上与外文数据库上的英文摘要依然存在差异。EBSCO 外文数据库作为商业资源数据库的权威期刊,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 2 091 种期刊,其中 1 600 余种期刊有全文。本文以数据统计形式直观体现中英文学术论文摘要的语步差异,并对其进行语步结构的对比分析,以期对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撰写、教学和翻译提供借鉴。

在构建语料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语句是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常见的四个语步步骤即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的重要单位,于是我们首先将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句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其次,从语步分析角度出发,以 Swales 的语步步骤作为理论框架,结合数据统计、绘表和理论分析,对比研究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结构;再次,对上述的

语料分析以 Swales 在 1990 年修订的 CARS 为基础,展开深入分析;最后,通过对比找出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步结构的差异,初步分析导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提出语步结构的宏观组织方式和各语步的使用策略。

二、研究结果

1.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句子个数对比

在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分析中,句子是语步步骤分析的重要单位。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句子个数对比见表 1。由表 1 可知,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语摘要在句子总数、平均每篇句子数上与英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基本一致,但在句子数的分布上存在细微差异。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句子数在 9 ~ 10 句,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句子数则在 7 ~ 8 句,从这点来看,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句子数量较少。另外,中英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句子数主要分布在 6 句、11 ~ 13 句,7 ~ 10 句的明显偏少,且分布大体一致。

表 1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句子个数对比

摘要句子数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EBSCO 外文期刊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篇数	占比/%	篇数	占比/%
6	2	5.3	2	5.3
7	5	13.2	8	21.1
8	7	18.4	9	23.7
9	9	23.7	7	18.4
10	11	28.9	6	15.8
11	3	7.9	2	5.3
12	1	2.6	3	7.9
13	0	0	1	2.6
合计		339		340
句子数/每篇		8.92		8.95

2.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数量和语步组织结构对比

摘要既是论文全文的概要或整篇论文的浓缩,又是独立于论文的语篇单位。从语类认知结构上来说,它包含研究问题/目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主要结论。首先,以 Swales 的 IMRD 四语步模式为理论框架,依据每篇论文摘要的交际目的和语类认知结构,综合其语法特点和标志性语义特征,可将摘要的语步数进行划分,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中英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都不存在只含有一个语步的情况,但在其他语步

数量的分布上差异明显。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一般含有两个以上的语步,集中在三个语步和四个语步上,其中三语步使用得居多,且在两个语步的使用频率上较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要大。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的语步使用四语步的比重较大,占68.4%,在两个语步和三个语步的使用上都少于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百分比。表2数据表明:四语步在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中所占比重大、使用频率高,基本上与Swales的IMRD四语步模式一致;整体而言,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使用二、三语步较多,不如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的信息完整。

表2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数量对比

摘要语步数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EBSCO 外文期刊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篇数	占比/%	篇数	占比/%
一语步	0	0	0	0
二语步	8	21.1	2	5.3
三语步	16	42.1	10	26.3
四语步	14	36.8	26	68.4
合计	38	100.0	38	100.0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组织结构对比由表3可知,中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的语步组织结构基本上以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依次排序,但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的该语步排序比例明显高于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从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的语步组织结构来看,引言—方法结构的摘要篇数为6篇,占15.7%,三语步的结构组织以引言—方法—结果和引言—方法—讨论为主,三语步和四语步在总量上所占百分比接近,但四语步基本为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的组织结构,其他语步组织结构仅有三篇(如引言—结果—讨论、方法—结果、方法—讨论)。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的主要语步组织结构为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以引言—方法、引言—方法—结果和引言—方法—讨论为语步组织结构的摘要篇数较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要少,其中在三语步的组织结构中,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主要以引言—方法—结果为主,而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则主要是以引言—方法—讨论为主,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不存在除表中所列四种语步组织结构以外的其他组织结构方式。

Swales的IMRD四语步模式是以学术论文语篇宏观结构的研究为主,基于该理论,Swales对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数量和语步组织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存在

宏观结构上的差异。后来,Swales经过修订又提出了CARS三语步模式:确立研究范围、指明研究领域空白、填补研究领域空白,且每个语步又包括不同的步骤,对摘要的语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研究。

表3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组织结构对比

摘要的语步组织结构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EBSCO 外文期刊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篇数	占比/%	篇数	占比/%
引言—方法	6	15.7	2	5.3
引言—方法—结果	8	21.1	4	10.5
引言—方法—讨论	7	18.4	6	15.7
引言—方法—结果—讨论	14	36.8	26	68.4
其他排序	3	7.9	0	0
合计	38	100.0	38	100.0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频次分布对比由表4可知,在确立研究范围、指明研究领域空白这两个语步模式层面,英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篇数偏多,与Swales的CARS三语步模式较为一致。确立研究范围在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和英文经济类英文摘要中出现的频率均偏高,其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语料库占比较大(60.5%),说明英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在一开始就确立了研究范围。

表4 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频次分布对比

摘要的 CARS 语步模式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EBSCO 外文期刊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料库	
	篇数	占比/%	篇数	占比/%
语步1 确立研究范围	16	42.1	23	60.5
步骤1 指出研究重要性	3	7.9	7	18.4
步骤2 概括主题	7	18.4	13	34.2
步骤3 回顾先前研究成果	2	5.3	1	2.6
语步2 指明研究领域空白	5	13.2	9	23.7
步骤1 反驳已有观点	0	0	0	0
步骤2 指出差距	3	7.9	3	7.9
步骤3 提出问题	2	5.3	6	15.7
步骤4 继承前期研究	0	0	0	0
语步3 填补研究领域空白	0	0	0	0
合计		21		32
占比/%		55.3		84.2

从CARS语步1(确立研究范围)来看,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以概括主题为主,在指出研究重要性和回顾先前研究成果方面的摘要篇章数目不多,如: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ed data of the develop-

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n 230 cities from 2004 to 2010, and with the spatial spillover panel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agglomerat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on the efficiency of it. [10]

而英文经济类论文的摘要是以概括主题为主,其次为指出研究的重要性,回顾先前研究成果的摘要仅有一篇,如:

Given the availability of long-term economic data, we relate economic activity levels to patterns in vehicle-related particulate matter (PM) over a 30-year period in New Jersey, USA,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potential historical surrogate markers of air pollution. [11]

在“指明研究领域空白”这个语步出现的频率上,英文经济类论文的摘要包含这一语步的频率为23.7%,而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包括这一语步的则为13.2%,两者在这一语步步骤上存在明显差异,如:

We examined the current state of understanding of later-life diseases resulting from early-life exposures in order to identify in utero and postnatal indicators of later-life diseases, develop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nsider the risk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of this emerging knowledge. [12]

然而,笔者发现,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在“指明研究领域空白”语步上都不存在反驳已有观点和继承前期研究这两个步骤。中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基本在指出差距和指出问题步骤上篇数相当,而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主要运用第三步骤,即提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填补研究领域空白”这一语步上,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都不含有该语步。整体而言,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 CARS 三语步的使用频率较高,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使用三语步的仅占其篇数的一半。综合表3、表4,我们可看出,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更加重视 Swales 的 IMRD 和 CARS 语步模式,在形式上也更为贴切。

三、结论

本文在构建语料库的基础上,采用 Swales 的 IMRD 四语步模式和 CARS 三语步模式,通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英文经济类论文的英文摘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与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在语步数量和组织结构上大体相似,但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在语步结构组织

和各步骤的运用上仍需要提高撰写水平:可以参照和借鉴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的各语步组织结构和步骤的写作习惯以适应学术成果的国际化要求,并根据论文撰写者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以方便中国学者的理解。本研究由于所选取的语料数量有限,覆盖的领域也仅限于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而并不适用于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析英文摘要。

本研究展示了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语步数量和语步组织结构上的异同,同时,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在各语步的使用频率上也存在差异,说明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与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写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如下问题。

其一,在撰写英文摘要时应尽量避免大量使用句子,句子数量以7~8句为宜,不能过长,应简明扼要地阐述论文的主要观点,同时在摘要写作教学和翻译方面应首先对整个摘要的语篇进行分析,参照 Swales 的 IMRD 语步模式使其摘要的语步组织结构尽量完整。

其二,在撰写英文摘要时应注意语步的数量,以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四语步为主。另外,在语步组织结构方面,还需要按照英文的思维和写作方式,以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中各语步的表达习惯为模板进行写作或翻译。

其三,从中英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的语步频次分布对比来看,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较少使用 Swales 的 CARS 三语步模式,而其在英文经济类论文摘要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在撰写中文经济类论文英文摘要时应注意该语步模式各步骤的合理运用。

【参 考 文 献】

- [1] Swales J M. Aspects of Article Introduction[M]. Birmingham, U K: University of Aston Language Studies Unit, 1981.
- [2] Swales J M. 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Graetz, Naomi. Teaching Students to Extract Structural Information from Abstract[M]. Leuven: Amersfoort, 1985.
- [4] 王丽娟.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bstract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apers—A Functional Approach[D].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00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096-05

教师领导力影响大学生学习成绩的机制研究

涂乙冬, 俞悦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教师领导力是教师利用其职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个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去影响教学活动中的相关者,组合多种教学方法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改善教学效率和效能的一种能力和影响过程。从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教师领导力影响大学生学习成绩的机制发现,教师通过建立良好的学习榜样,可提高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和学习自我效能;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关心和支持可激发大学生努力学习的回报感,从而促使其努力学习;教师通过创造认同感可改变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促使其主动地学习。因此,应注重教师领导力的建立、培训和开发工作,高校教师则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尊重、信任、关爱和支持大学生,重视塑造大学生的认同感,从而充分发挥教师领导力对学生学习成绩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教师领导力;大学生学习成绩;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

[中图分类号]G451;C933.4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21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全新阶段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教师在高等教育变革浪潮中需要积极发展其领导力以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要求。首先,高等教育对于教师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要求,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角色应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向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启发者、服务者和合作者转变,要强调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应更加全面有效地展示其领导力水平。其次,在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和思想越来越凸显出其独特性和开放性,讨厌墨守成规,他们对传统的教师权威形成了挑战。高等教育的特点也强调个体价值观、行为和能力的多元化,在团队多元化的情境下,教师作为教育情境中的领导者,其领导力和领导艺术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大学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自我概念。相较于正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大学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心智和较为完整的自我概念,成为一个自主思考和行动的个体,这就为师生互动奠定了基础。最后,高等教

育强调大学生的学习不能仅限于书本知识,还要学习包括团队合作技能和领导技能的各种社会技能,大学教师在教授过程中也经常以团队的方式来授课,如分组讨论、分担任务等。在这种新的教育情境下,传统的教学效率和效能已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探索高等教育新情境下教师的领导力,探索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近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讨论的一个热点,教师领导力被认为是教师适应高等教育变革新形势的一种重要能力。本文拟在揭示教师领导力内涵的基础上,从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三个角度来探讨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并就如何提升教师领导力以提高大学生学习成绩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教师领导力的内涵

传统观点强调领导力是领导者影响他人去达到团队共同目标的能力,认为领导力是“让其他人理

[收稿日期] 2015-02-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402127)

[作者简介] 涂乙冬(1985—),男,四川省泸州市人,武汉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领导力。

解和同意如何必须去做什么和如何有效地去做过程,以及促进个人和集体努力去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1];也有学者将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影响、鼓动和促使其他人奉献于组织的效能和成功的能力”^[2];还有学者认为,领导力强调共同的愿景和目标,领导者必须为团队寻找共同的愿景和目标,并激励团队成员共同为组织愿景和目标而行动^[3]。领导者通常通过设置吸引人的愿景或目标,同时辅以技能的训练和过程的督导,一方面提升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提升团队成员的技能水平,从而提升团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最终获得团队成功^[1]。因此,领导力的开发和培训已经成为各类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达到组织目标、提高组织效率和效能的重要手段。

学界对教师领导力的关注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有研究者将教师领导力定义为“教师在提升学生学习成绩的目标下,通过个人或集体努力去影响他们同事、校长以及其他教育学术共同体中的个体来提升教学和学习的过程”^[4]。可见,与传统的领导力定义类似,教师领导力也强调其目标是为了提升学生学习成绩,强调其是影响他人而共同行动的过程。也有研究者认为,教师领导力是教师运用个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道德、人格、魅力等对学校不同群体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力。^[5]这一界定强调了教师领导力是教师影响他人的过程,但是忽略了教师领导力的目标,同时也对领导力的影响范围进行了模糊定义。综合来看,教师领导力就是教师利用其职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个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去影响教学活动中的相关者,组合多种教学方法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和效能的能力和影响过程。

学界对教师领导力问题的研究虽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也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但综观目前学界关于教师领导力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目前相关研究关注更多的是教师领导力的定义,而对于教师领导力的发展、建立过程和对教学和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的关注却很少。其次,目前教师领导力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关注校长在学校范围内对教师的领导和管理,而不是直接针对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对学生的影响。再次,目前教师领导力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那些已经建立了教师领导力的学校,而对那些尚未开展该项目的学校却没有关

注^[6]。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学校尚未意识到教师领导力的重要性,也没有制订提高教师领导力研究的相关项目或相应的规划,具体实践更是微不足道。

基于上述不足,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揭示教师领导力内涵的基础上,从三个视角探讨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第二,提出在中国建立、开发和培训教师领导力项目的对策建议,以使教师领导力研究在中国能够受到重视,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质量,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

教师的领导力水平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来实现,结合现有领导力理论,本文从以下三个视角来揭示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见图1):一是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学生通过对教师的学习模仿过程来实现教师领导力的有效性;二是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教师通过展现其高强度的社会交换的领导行为来激发大学生努力学习的回报感,从而使学生通过努力学习来实现自身成绩的提高;三是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教师通过提高学生的社会认同感来促使学生取得预期的学习效果。

1.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

社会学习理论是解释领导力及其效能的主流理论,其基本逻辑是:个体通过观察和直接体验来进行学习^[7],领导者常常被视为团队的榜样,追随者在对领导者的观察和与领导者互动中对领导者进行学习,从而使领导者能够有效影响追随者去达到共同目标。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体系中,榜样的作用通过4个过程产生自上而下的影响,即注意过程、保持阶段、模仿过程和强化过程。^[7]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教师榜样的影响下,学生的注意力会被教师的教学行为所吸引,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保持和记忆,接着主动模仿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行为,最后进行强化,并展现出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行为,这样,教师在教学情景中就承担起了榜样的角色。因此,教师不仅要讲授专业知识,更要严于律己认真做好示范,将自身的知识技能凸显出来,以便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观察、模仿和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改进其学习效果,提高其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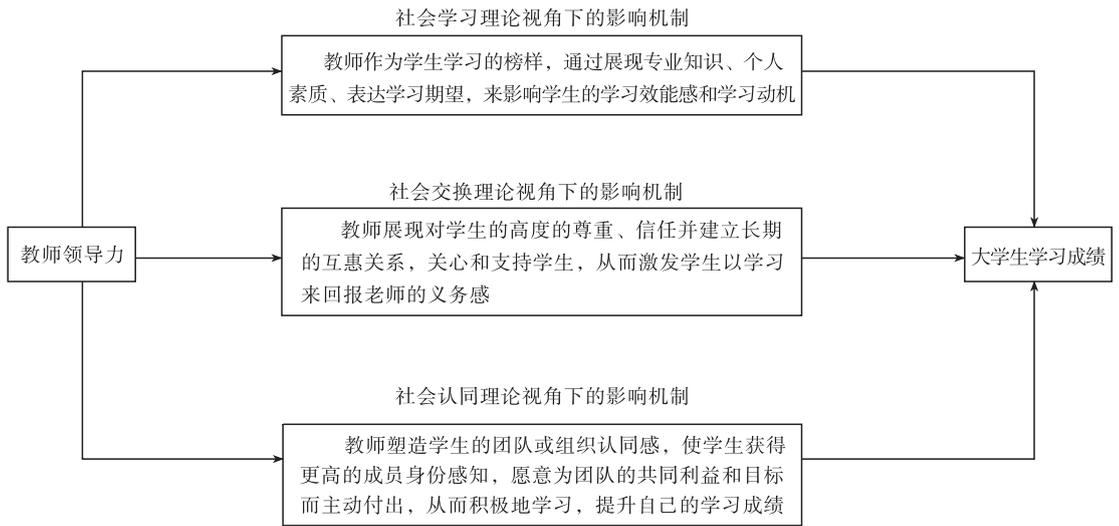


图1 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三种影响机制

质量。

自我效能是社会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体相信他们能够成功执行行为以达到目标的信念^[8]。自我效能理论可被广泛地引入到教育情境中去解释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对自我学习能力的感知(如学习自我效能)。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相信自己具有完成某一学习任务的能力,自信能够达到某一学习目标,常常能够获得更高的学习成绩,而具有低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则相反。自我效能感的获得有4个来源,即自身体验、替代榜样、言语说服和唤醒^[9]。其中,自身体验可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更多的成功来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替代榜样可帮助学生找到其他可比较的成功完成学习任务的例子,从而使学生提高自己的自我效能感;言语说服可通过谈话、聊天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鼓励,从而说服他们完成学习任务,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生理和情绪的唤醒可使学生对学习充满激情和热情,提高完成学习任务的自我效能感。

总之,高校教师可以通过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和学习自我效能,进而提高其学习成绩。

2.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

社会交换理论是领导力及其效能最重要的解释框架。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领导力作用过程的基本逻辑是:领导者对团队的追随者表达关心和支持,双方建立高度的尊重、信任关系,在互惠的规范下追随者具有更高的回报领导者的义务感和动机,从而会

做出更多积极的行为。社会交换是世界普适的文化规范之一^[10],它强调给予和回报与回报预期之间的平衡^[11]。

在高等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具有更多的知识、权力等资源,在日常教学中应给予学生更多的关心、照顾、支持和指导,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并且愿意平等地与学生进行交流。当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积极行为和情感给予时,就会产生回报教师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的动机,从而愿意在学习中投入更多,做更多与学习相关的活动,进而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任务。与经济交换不同,师生之间的社会交换其本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情感的良性增益,而非物质上的资源交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社会交换的核心是相互尊重、信任和互惠^[11],而不是相互的经济和利益交换,后者在今天的教育情境中可能会被认定为不道德行为。

3.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

社会认同理论也是领导力常用的解释框架,其基本逻辑是:领导者提升了追随者的认同感,从而使追随者具有共同的身份感知,愿意为共同的目标而主动努力。新近提出的认同型领导理论认为,领导者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提升追随者的认同感。例如,代表团队和团队追随者的共同身份感知可提升团队追随者的认同,使追随者关心和实现团队的利益和目标,创造一种共同的身份感知,通过多种活动来凸显团队和团队成员身份的重要性。^[12]社会认同理论实际上回答了个人身份定义的问题,社会认同

理论视角下的领导力研究表明,领导者可以通过塑造个体的组织认同感使个体主动地为组织做贡献。

在高等教育情境中,教师可以通过创造认同感来改变学生学习的动机,使学生主动地学习。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以团队为单位的的学习,并且对团队绩效进行评估,使学生意识到他们属于团队的一份子,与团队紧密相连,鼓励学生融入到团队中以提升学生的团队认同感,从而使学生积极地、主动地为团队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同时,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形成以班级为基本单元团队的认同感,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而且会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心理和情感依附,增强学生与集体、与同学之间的心理连接,促使学生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三、提升教师领导力的对策建议

教师领导力作为一种综合性领导能力,符合高等教育未来变革对教师的要求,是未来高校教师的重要素质之一。笔者认为,提升高校教师领导力进而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学习成绩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应注重教师领导力的建立、培训和开发工作。教师的发展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系统性的培育,这就要求学校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为教师领导力的培养和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建立教师学习培训制度,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目前中国对于教师的培训大多集中在教学技能的提升和教育理念革新方面,教育价值观和团队管理培训相对薄弱。教师领导力培训可将教师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质融合升级,转化为多元的领导风格,从而多方面地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第二,教师应基于增强领导力的考量,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引导大学生积极学习。作为大学生学习行为中重要的榜样,教师有义务和责任在日常教学中展示自身师德和好的综合素质。期望学生做到什么,自己必须首先以此为自我要求和行为准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提升学生学习自我效能和一般自我效能,多给予鼓励和肯定,真正了解每位学生的擅长与薄弱点,给出作为教师的有效建议和关心鼓励,比如定期进行一对一的日常言语交流、提供及时有效的渠道让学生进行意见反馈或寻求帮助等,这些都是拉近师生距离、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我效能的有效举措。

第三,教师应基于增强领导力的考量,尊重、信任、关爱和支持大学生,以增强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不应该忽视与学生进行精神情感层面的互动交流,因为这种人际互动往往可唤醒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动力以发挥出超过教师预期的学习效果。许多真实例子都表明,在得到来自老师的关注和关心后,学生会出于“回报老师”的心理而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和信心,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达到学习目标的速度,帮助学生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更好更快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

第四,教师应基于增强领导力的考量,重视塑造大学生的认同感,增强大学生的集体身份感知,从而为集体目标去主动学习。教师应强化班集体意识,通过系列的竞争合作活动来加强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当学生自我有了坚定的团队成员意识后,教师的进一步工作就是集众人之慧为一体,将整个团队建设成为一个更出色更具有凝聚力,从而能更好引导各个成员自愿自主地提升自我、乐于奉献的集体。

四、结语

在中国高等教育情境下提高教师领导力以适应高等教育变革新要求,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议题。教师领导力的内涵强调教学目标与愿景、教学过程中的人际影响。本研究提出了三个视角下的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教师是大学生学习的榜样,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效能和动机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教师与大学生建立相互尊重、信任和互惠关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义务感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机制,教师通过塑造学生的社会认同来提升大学生主动学习的动机并提升学习成绩。另外,本文还提出了提升教师领导力的对策建议。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境因素也是影响教师领导力的重要条件,应进一步探讨中国教育情境的文化、教育、心理等因素,在教师领导力对大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Yukl Y G A.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M].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2002.
- [2] House R J, Hanges P J, Javidan M, etc.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4.

- [3] Palmer D E. Business leadership: Three levels of eth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8(3): 527.
- [4] York-Barr, Duke J. What do we know about teacher leadership? Findings from two decades of scholarship[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4, 74(3): 287.
- [5] 许天佑. H地区中学教师领导力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6] Snoeka M, Volman M. The impact of the organizational transfer climate on the use of teacher leadership competences developed in a post-initial Master's program[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4, 37(1): 92.
- [7]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77.
- [8]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3.
- [9]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Freeman, 1997.
- [10] Gouldner A W.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2): 161.
- [11] Blau P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64.
- [12] Steffens. Leadership as social identity management: Introducing the Identity Leadership Inventory (ILI) to assess and validate a four-dimensional model[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4, 25(5): 1003.

(上接第95页)

- [5] 闫晓玉. 英汉学术论文摘要的对比体裁分析[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2.
- [6] 王旻. 中英科技论文英文摘要语体特征对比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 94.
- [7] 钱多秀, 罗媛. 基于语料库的论文摘要语步的对比研究[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21): 12.
- [8] 于晖. 语篇体裁分析: 学术论文摘要的符号学意义[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9] 刘胜莲. 中英语言期刊英语论文摘要的对比体裁分析[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 [10] 宣烨, 宣思源. 论城市服务业集聚与效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140.
- [11] Mary E Davis, Francine Laden, Jaime E Hart, et al. Economic activity and trends in ambient air pollution[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0(5): 118.
- [12] Kim Boekelheide, Bruce Blumberg, Robert E, et al. Predicting later - life outcomes of early - life exposures[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2(10): 12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101-07

新形势下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任成金, 杨洪騫, 李之鹏

(山东科技大学 自动化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高校辅导员面临着知识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工作方式时代化等新的挑战, 出现了价值感缺失、职业道德取向出现偏离、育人方式出现偏差等职业道德失范现象。而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滑坡: 信仰上出现多元化, 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价值观上突出自我, 功利主义思想严重; 考试作弊现象突出, 诚信道德缺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道德准则与构建的基本内容要素。因此, 辅导员应注意自我教育、率先垂范, 自觉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 学校应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通过尊重辅导员主体地位、关注辅导员价值诉求、完善道德评价标准等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社会则应积极营造辅导员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推进辅导员职业化进程, 倡导职业平等, 加大辅导员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 从而促进提高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建设。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职业道德; 功利主义; 道德取向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22

中共十八大报告突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明确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公民道德的基本价值准则, 这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势在必行。

目前关于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研究较多, 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研究并不多见, 主要有: 杜玉波^[1]提出辅导员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辅导员工作全过程, 要通过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和培训体系三方面提高辅导员职业素养; 朱铭^[2]则分析了高校辅导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指出高校辅导员是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 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角色, 高校要通过为辅导员角色发挥搭建平台和提供保障、增强辅导员的自觉意识和角色意识、加

强角色实践等措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播。本文拟立足于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为突破口, 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 寻求新形势下提高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的新举措, 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以期能够对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

1. 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对辅导员职业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 对辅导员职业道德要求也越来越高。

一是面临知识多样化的挑战。高校辅导员知识储备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

[收稿日期] 2014-10-27

[作者简介] 任成金(1979—), 男, 山东省高密市人, 山东科技大学讲师,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实现德育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反应敏捷,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对新思想、新事物接受快。相比较而言,辅导员平时工作较忙,很难抽出时间参加培训,储备新知识,原来掌握知识日趋陈旧,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与内容面临新知识的挑战,在网络应用、网上信息传播、网上舆情分析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大学生。

二是面临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挑战。高校并不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而是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场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娱乐主义和各种消费文化等,都在高校校园有所表现、在师生身上有所反映。中共十八大提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大群众尤其是高校师生热烈响应、积极践行。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提出到认同再到自觉践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方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近年在我国的泛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带来极大的挑战。而“90后”大学生作为先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烈渴望,同时也存在着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这对辅导员工作的开展和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高校辅导员思想道德建设成为时代要求。

三是面临工作方式时代化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促进公民自由平等政治权利诉求的增强。社会政治领域内的这些巨大变化反映到学校管理、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大学生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努力争取表现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敢于或愿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些都会带来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新变化,要求学校管理者和学生应通过协商或妥协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如果学校一味采用管理和约束的方式,不仅会压抑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领会其中民主、自由的要义,改变以往的威权管制模式,通过平等交流、细心沟通,以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式来处理新问题,以实现辅导员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辅导员工作由“事务型”向“学习型”的转变。

2. 目前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状况堪忧

目前虽然不少高校切实加强了基层辅导员队伍建设,包括提高待遇、加强考核、增加岗位、拓宽出口等,但仍然难以维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和发展的

持续性,导致不少辅导员职业道德失范,在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育人为本等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感缺失。在大多数人看来,辅导员对学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简单应付的多,充满热情的少;服从组织的多,心甘情愿的少;借作“跳板”的多,长期安心工作的少。^{[3](P212)} 繁琐、倦怠、迷茫、跳板成了这支队伍不少人员的真实写照。为了掌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实际情况,笔者在高校辅导员中开展了网上问卷调查(问卷1),涉及高校25所,辅导员200人。当被问及“您是否有转岗的打算或想法”时,明确表示转岗的有148人(占74%),选择要“转向业务课老师”的有114人(占57%);当被问及“您是否热爱辅导员工作”时,回答“一般”的占45%,选择“不热爱”的占20%。这表明被调查的辅导员大多缺乏职业认同和明晰的职业定位,辅导员成了琐碎繁重而又毫无价值感的角色,价值感的缺失成了辅导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的首要问题。

二是职业道德出现偏离。辅导员承担的不仅有管理工作,而且还有育人工作;他们是学生政治思想和学习上的导师,也是学生职业道德方面的导师。因此,辅导员只有自身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才能赢得学生和社会的尊敬。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部分辅导员修身养性不到位,榜样的作用不突出,难以令学生信服,不能赢得学生和社会的尊敬。在问卷1中,当被问“您愿意为学生事情牺牲休息时间吗”时,有70人选择了“不愿意”;当被问及“您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内容的了解情况”时,有10%的辅导员选择了“不了解”,有30%的选择了“一般”;当被问及“您能做到平等公正对待每位学生吗”时,有28%的辅导员选择了“不能”,有35%的辅导员选择了“看情况”。这说明部分辅导员的职业道德出现了偏离,职业态度发生了扭曲,在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奖学金评定、班干部选拔、助学金发放、研究生保送和入党推优等方面不能做到公开公正、秉公办事,从而造成学生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落差。

三是育人方式存在偏差。长期的辅导员工作生涯使不少辅导员出现了懈怠心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将管理活动和育人目标割裂开来,重管理、轻教育;育人方式以管理为主,管理手段显得粗暴简单,过分强调服从与秩序,缺乏坦诚相待和自由平等的沟通。强调秩序无可厚非,但如果凡事都以学校秩序为第一,那么学校与学生之间最重要的教育与受

教育的关系可能会被淡化。^[4]

3. 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发生了新变化

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主流状况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存在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信仰上出现多元化,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价值观上突出自我,功利主义思想严重;考试作弊现象突出,诚信道德缺失。

一是信仰上出现多元化,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长期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片面强调理论灌输,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激起了大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部分大学生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笔者以青岛高校600名大学生为样本进行了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问卷调查(问卷2)。在问卷2中,当被问及“您的信仰是什么”时,有42%的学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有44%的学生选择了“没有明确的信仰”,有6%的学生选择了“佛教”,还有2%的学生选择了“基督教”;当被问及“有人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时,有35%的学生选择了“同意”,有54%的学生选择了“部分同意”。这表明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令人堪忧,学校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存在缺失,以致造成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紊乱和社会主义信仰动摇。

二是价值观上突出自我,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在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上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多元多变的特点,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它既需要道德的维系,又对现有道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理想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反差,致使一些大学生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之间出现了断裂”^{[3](P201)},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入党动机不纯、学习动机功利化等成为摆在当前高校学生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问卷2中,当被问及“您认为以下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时,有61.11%的学生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38.89%的学生选择了“只要过上好日子,哪种制度都可以”;当被问及“您当前的学习目的是什么”时,有36%的学生选择了“找一份好工作”,有20%的学生选择了“满足求知欲”。这反映了大学生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忽视他人和国家利益,集体意识和国家观念淡薄。

三是考试作弊现象突出,诚信道德缺失。考试

诚信既是大学生道德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大量发生,折射出大学生诚信道德的缺失。梁漱溟^[5]先生曾经讲过,若在考试上舞弊行欺,则又是另一种错误,便属品性问题。大学生作弊被称为“大学流行病”,纵然辅导员多次进行考风考纪教育、组织签订考试承诺书、再三提醒警示,以及学校加强人力监考,仍然阻止不住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在问卷2中,当被问及“您在大学考试时是否作过弊”时,回答“是”的有359人(占59.83%),回答“有过作弊想法”的有210人(占35%)。大学生考试作弊群体化的倾向淡化了对考试作弊的耻辱感,销蚀了对考试作弊错误本质和危害性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考试作弊是一种失信行为,没有从道德品质和人格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当被问及“您认为作弊是一种道德失信吗”时,有近一半的同学认为考试作弊和道德诚信没有关系。可见,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出现了错位,道德感模糊、理想信念不坚定,对是非、真假、对错缺乏仔细考虑和明辨分析,因此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来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使其明辨是非、美丑、善恶,依然任重道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在辅导员队伍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直接关系到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学校的德育教育水平,关系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程度。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它奠定了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引领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并外化为社会实际,其是一种国家制度、一种社会发展模式赖以立足和演进的价值导向^[6]。这为当今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施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要落实到辅导员个人的践行上,落实到公民个体的践行上。在这一背景下,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就需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结合起来,要按照导向性、科学性、政策性的原则,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完备的职业道德规范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必要保障,因此要通过不断完善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规范,使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以保障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着社会和个人价值取向,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道德准则,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社会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评价辅导员道德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调整辅导员职业活动和维护人际关系正常运转的道德保障。虽然不同时期对辅导员职业道德有不同的要求,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始终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构成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准则演进的主线,加强和改进高校辅导员道德建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宗旨。

爱国,是基于个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行为的准则,主要体现为辅导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活动的方向,制约着其他方面道德素质的养成和发挥。思想政治素质是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的灵魂,是辅导员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它要求辅导员要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能够自觉学习并融会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的主旨精神。敬业,反映了辅导员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工作态度,是对辅导员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导地位肯定,强调其要尊重学生,热爱学生工作,给学生以人文关怀。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热爱学生、严谨治学等,是敬业这一标准的具体体现和现实要求。诚信,是指“重诚守诺”的人生态度,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根基,是调节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所谓‘诚’,就是真诚、诚实,‘内诚于心’,是‘信’的内在依据;所谓‘信’,是指守信、信用、信任,是‘诚’的外

在体现。”^[7]这就要求辅导员队伍要积极倡导和培育以诚信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由内而外的认知与认同,做到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这对辅导员队伍建设、对大学生诚信教育都至关重要。友善,是指亲近和睦,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它倡导辅导员要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公正严明、一视同仁。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是一种尊师爱生的良师益友式的关系,辅导员要关爱学生,关心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和友爱来影响学生,应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和人生导师。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规定了基本内容

中共十八大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来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新时期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构成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基本的内容。

关于辅导员的职业道德,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界定和内容概括。如安云凤等^[8]将辅导员职业道德规范概括为“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关爱学生、甘于奉献”,“尊重学生、平等交流”,“言行一致、和蔼可亲”,“一视同仁、公正严明”,“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六个方面;唐家良^[9]将辅导员职业道德概括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敬业爱岗、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淡泊名利、志存高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奋发进取”九个方面;耿乃国^[10]将辅导员职业道德概括为责任心、奉献心、上进心、务实心、真诚心五个方面。无论是安云凤“六个方面”的概括,还是耿乃国“五心”的总结,都与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都是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延伸和拓展。其中,民主意味着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平等交流;和谐意味着安定有序、融洽的师生关系;平等意味着同等地位和同等权利;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道德,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敬业是指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最基本体现;诚信指的是诚实与守信,既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也是辅导员道德建设的重要一环;友善在于与人为善,更意指爱护学生。可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容来建构和完善辅导员职业道德,是当前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需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结合起来,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这既需要辅导员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又需要学校重视大学生价值诉求、健全道德规范机制,还需要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

1. 辅导员应自觉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是实现核心价值观内化、培养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从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培育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辅导员个体的自觉追求,变“要我做”为“我要做”,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

一要自我教育。热爱学生、教书育人是师德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高校辅导员要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师德追求,就要善于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见识,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素养,从而不断提升职业道德水平。

辅导员知识丰富、人品高尚,是做到为人师表的关键,也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辅导员要以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做人之道,而且还要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一般来说,辅导员的学识、见识越多,人品越好,其人格魅力就越大;反之,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积累,辅导员在工作中就会陷入被动,对学生的吸引力就不大。因此辅导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在辅导员的多元文化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根本,这也是思想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辅导员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政治理论素养。辅导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真学习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分析时代形势,才能以正确的政治导向引导人,以先进的理论熏陶人,以高尚的品格塑造人;只有在“为谁育人”“育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认识,才能对自己的角色和职能有合理的定位和认同。

辅导员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是提升其道德水平的

关键。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是指辅导员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知、情感、期望、价值观和技能的感知。辅导员只有在职业认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职业理想,承担职业责任,增强职业荣誉感。职业认同与爱岗敬业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辅导员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辅导员的职业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生工作的不断实践中,在素养、学识和人格的不断提升中形成的。辅导员要在辅导员岗位上逐渐提高对辅导员价值的认识,不能仅将其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要做到“敬业”和“乐业”,对自己的职业有积极的自我感知,乐于在学生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要率先垂范。辅导员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力量,他们自身的道德、人格力量会影响在校大学生的品格修养。辅导员除了要掌握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科学的育人理念和职业道德规范之外,尤要注重带头践行。辅导员队伍中涌现出的道德楷模、先进典型对大学生有直接的示范作用,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共十八大强调学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这既是对学生培养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广大辅导员老师育人的根本要求。正人先正己,思己之过,正己则生威。辅导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的是辅导员群体对大学生的示范性作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师群体一直以来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教师群体今后如何更好地正面影响青少年学生、引领和带动社会其他群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激励”^[12]。

2. 学校应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加强师德建设,既需要辅导员本身的身体力行,又需要学校方面的利益支撑和政策支持。从学校方面讲,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辅导员的主体地位,关注辅导员的价值诉求,完善道德评价标准。

一应重视辅导员的价值诉求,尊重辅导员在辅导工作中的主体地位。辅导员承担着繁重的学生工作任务,耗费精力大,从迎新到送毕业生,从情感辅导到就业辅导,从思想政治教育到心理疏导,从日常行为守护到与家长沟通交流,事无巨细、无一例外地都落到了辅导员身上,但在培训进修、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等方面少有机会,从而导致辅导员职业倦怠,工作热情和工作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高校应切

实从辅导员的切身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重视辅导员群体的正当价值诉求,为辅导员群体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待遇问题上,学校应综合考虑,实行辅导员岗位分等级和待遇考核,并在现有待遇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倾斜,确保辅导员实际收入不低于同资历、同资质专任教师平均水平。学校应在考核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工作激励机制,给予辅导员更多培训机会,拓展辅导员的发展空间;应开辟社会交流渠道,完善辅导员挂职交流制度,形成学校与地方政府人才沟通和交流机制,开阔辅导员视野;应加大辅导员培养与锻炼力度,推荐其中的优秀人员到重要岗位任职,形成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

二应完善道德评价标准,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对辅导员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是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但是辅导员工作难以用单一的标准来考核。因为辅导员是用爱心、用责任做教育,这种爱心、诚心、责任心是难以量化的,辅导员的工作时间大多在8小时之外,工作的效果多在学生毕业后才能体现出来。对辅导员职业道德进行评价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量化考核机制,应在辅导员定量与定性考核、结果与过程考核、共性与个性考核、全面与重点考核、实践管理与理论修养考核之间进行综合平衡。评价辅导员职业道德的主要标准应是爱岗敬业,评价的关键是看辅导员是否热爱本职工作,是否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否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是否遵循了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评价既要讲原则性,又要讲灵活性,既要肯定其劳动成果,又要承认辅导员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对辅导员职业道德进行评价,既可以调节并制约辅导员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又可以不断反省和调整辅导员不符合社会要求及自身利益的行为。^[12]

三应完善制度安排,提高育人水平。辅导员道德建设准则与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和外化,对这些制度遵循和认同的过程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高校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以职业化要求为目标,研究制定辅导员职业道德准则,强化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刚性原则。

制度保障是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条件,因此高校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高校应全面梳理与学生管理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厘清工作分工

与业务交叉,以提高辅导员业务水平。高校应从辅导员选聘开始,围绕资格认定、业务培训、考核评价、职称(务)晋升等规定,形成职业化和专家化的辅导员培养机制;应制定和完善辅导员职业道德规范、辅导员职业道德考核评价机制。加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提升辅导员的发展空间。为此,应鼓励辅导员开展科研工作,提高其理论水平;应为辅导员提供合理的科研平台,设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题,设立辅导员专项科研成果奖励基金,定期举办辅导员论坛,引导辅导员注重调查研究,分析现实问题,撰写学术论文,发表研究成果;要为辅导员提供学历进修平台,鼓励辅导员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提高其学历层次。

3. 社会应积极营造辅导员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出台以后,教育部和各省市区连续出台了有关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文件,但从整个社会来看,辅导员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公众对辅导员工作存在诸多误解,对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认识并不到位,对其职业内容、职业理想、职业情感和职业规范等缺乏全面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推进辅导员职业化进程、淡化等级观念和营造积极氛围等指明了努力方向。

(1) 推进辅导员职业化进程,增强辅导员归属感。辅导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有利于明确辅导员的职业定位,增强辅导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顾明远^[13]教授曾经指出,社会职业有一条铁的规律,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有一种职业是人人可以担任的,则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辅导员虽然兼具教师和管理人员两种角色,但在实际工作中其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因此,首先要对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进行合理的定位,明确辅导员的角色、地位与职责,即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工作的专业教师,有条件的高校应设置辅导员专业,并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其次在准入门槛上,应坚持持证上岗,并建立多层次的辅导员队伍培训体系,实现培训的制度化、科学化和常规化;再次在成长发展上,尤其在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方面,对辅导员这一群体要有适当倾斜,应扩大处级辅导员、教授级辅导员的比例,打通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晋升通道;最后在职业道德上,要做到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公正无私、一视同仁。

(2) 倡导职业平等,提高辅导员社会地位。《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规定,我国职业分为1838种,“家”“师”“员”“工”等职业称谓不反映从业人员的职业地位。但在现实社会中,称谓是有等级的,后缀为“员”或“工”的社会地位低于“家”或“师”的,比如科学家、教师分别比焊工、辅导员的地位要高。在人们的心目中,辅导员这一职业是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的。在问卷1中,当被问及“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如何”时,大多数辅导员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是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弱势群体”。

针对这一现象,社会公众要淡化等级观念,营造人人平等的职业氛围,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断地灌输、熏陶,坚守正道,弘扬正气。社会公众要破除“官贵民贱”“上荣下辱”的落后思想,树立“上”不是荣而是责任和担当,“下”不是辱而是职责分工和工作需要;要淡化权力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虽然辅导员从事的工作千头万绪,是最基层的事务工作者,但是只要做好本职工作,他们同样会成为专家,从而与其他从业者在人格和地位上是平等的,对此社会舆论应积极倡导。

(3)加大辅导员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学校和辅导员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良好的社会氛围。要调动广大辅导员老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立德树人的自觉性,加强与爱岗敬业为核心的职业道德建设,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氛围。所谓社会氛围就是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和非功利性的教育观念。

在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就应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舆论氛围,大力宣传辅导员先进典型,介绍辅导员先进经验;应召开全国、各省辅导员工作会议,认真做好全国、各省优秀辅导员的表彰工作;要利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媒体广泛向社会宣传,通过开辟辅导员专栏,开展“寻找身边的感动”活动,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辅导员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地位,转变对辅导员的传统看法和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大学生思想

道德滑坡,以及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失范,导致了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的下降。中共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明确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为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应以此为契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辅导员职业道德建设,从辅导员、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提高辅导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途径,以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参 考 文 献]

- [1] 杜玉波.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辅导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J]. 中国高等教育, 2014(12):4.
- [2] 朱铭. 论高校辅导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角色定位[J]. 理论与改革, 2014(6):179.
- [3] 杜向民, 黎开谊. 嬗变与开新: 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12.
- [4] 李泽或. 科学与民主: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多视角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261.
- [5]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114.
- [6] 本书编写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75.
- [7] 娄勤俭. 诚信是文明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根基[N]. 北京日报, 2013-06-03(18).
- [8] 安云凤, 吴来苏. 高校师德教育与修养[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69.
- [9] 唐家良. 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与成长[M].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8:66.
- [10] 耿乃国. 高校辅导员工作理论与实务[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0-31.
- [11] 魏政. 坚持立德树人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 文汇报, 2014-09-11(8).
- [12] 冯留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探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17.
- [13] 顾明远. 教师的特点与教师专业化[J]. 教师教育研究, 2004(6):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2-0108-05

中美外语教育现状比较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启示

吴进善

-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2.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外语教育成果显著,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回顾中美两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程,从外语教育的政策与规划、课程标准和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的外语教育存在政策研究不足、规划高度不够,课程标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教育模式单一、教学方法过度西化等弊病。因此,应加强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制定目标明确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加大外语课程标准改革力度,出台科学的、系统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加速外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外语教育模式。

[关键词] 外语教育改革;中美比较研究;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9.27;H0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2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趋势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国民的总体外语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其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安全,外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战略意义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逐渐提出了许多新的外语需求,外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期^[1],外语教育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问题^[2]。如何认清并逐步解决外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作一回顾梳理,并从政策规划、课程标准和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现状进行比较,旨在学人之长、克己之短,以期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美两国外语教育发展回顾

从建国初期的“俄语热”到改革开放后的“英语热”,再到如今的“英语过热”质疑,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单一发展、逐步调整、文革受挫、稳定发展和创新发展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期至1958年,我国向苏联全面学习,全国“一边倒”地开展俄语教育^[3];第二阶段为1958—1966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开始有所调整,对英语和其他语种人才的培养逐步恢复;第三阶段为1966—1976年,“十年浩劫”使我国的外语教育受到重创,外语教学几乎停滞,直至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我国的外语教育才逐步复苏^[4];第四阶段为1978年至20世纪末,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中国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在“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外语”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出现了学习外语的

[收稿日期] 2014-11-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12400450419)

[作者简介] 吴进善(1982—),男,河南省安阳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外语教育、语料库语言学。

热潮,外语教育迎来了迅速恢复和稳定发展时期,外语在教育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外语专业队伍空前壮大;第五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中国的外语教育在进入鼎盛时期的同时,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大发展也引发了英语过热而汉语受到冷落、外语教育高投入低产出、“费时低效”^[5]等诸多质疑,学界呼吁我国的外语教育应该重新定位^[6],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外语教育,探索新型外语教育发展模式,外语教育发展趋于理性、追求创新。

美国的外语教育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二战前限制发展、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曲折发展、1980年代恢复发展、1990年代至20世纪末改革发展和21世纪初至今战略发展五个发展阶段。二战前,美国外语教育不受重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曾一度禁止使用任何非英语语言,禁止学校开设外语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满足战争需要,美国开始重视和研究外语教育问题^[7]。《国防教育法》(1958年)、《高等教育法》(1965年)等系列法案的颁布虽确立了外语教育的地位,但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后期,由于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社会问题,外语教育再次停滞。1978年,卡特总统调整了美国外语教育发展政策,使美国的外语教育在1980年代重新崛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8]。19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美国针对外语教育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对外语教育进行了改革,有效地加强了外语教育的地位。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国政府更加意识到外语人才的短缺会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开始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重视加强本国的外语教育,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在立法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外语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因国情不同,中美两国外语教育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但自1980年代以来,两国对外语教育重要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在外语教育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对我国的外语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二、中美外语教育对比

受各自国内、国际形势、教育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现状。下面笔者将从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外语教育课程标准和外语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现状进行对比,寻找差异,发现问题。

1. 中美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规划比较

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涉及外语教育全局,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诸多领域。外语政策与外语规划含义不尽相同,本文的外语政策指国家有关母语和外语,以及各语种之间的关系、地位的决策;而外语规划则指国家有关外语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

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强制性和单一性特征。实用性体现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是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国际的政治交往;强制性体现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实行自上而下的、由儿童至成人的“外语终身必修制度”;单一性则体现在事实上的英语一统天下,似乎中国的外语教育就是英语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根本就没有选择其他语种的余地^[9]。相比而言,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战略性、自由性和多元性特征。其战略性体现在,自1958年开始制定明确的国家外语政策以来,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就与其国家安全密切相关^[10]。“9·11事件”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家安全语言倡议》《K-16关键外语渠道法案》等10多项语言政策法案都是由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牵头或参与完成的。其自由性体现在,美国宪法规定,教育的权力在地方。美国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有是否开设外语课程的权力,学生也拥有选修与否的权力^[11]。学生选修外语与否取决于学生的兴趣和就业市场导向,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手段来鼓励和吸引学生学习“关键外语”。其多元性则体现在美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本国内在的多种族、多语言特征,以及外在的多边外交、全球反恐的战略需求,其外语教育并非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语种,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国防、反恐等多方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所需的通用语种和关键外语人才。

外语教育规划比较。我国中小学、大学和成人的外语教育管理工作分属不同部门,主管部门虽然在不同时期对于外语教育有政策性的指示和部署,但一直没有设立专门部门来统筹制定外语教育的长期规划^[3]。“通用语中何者为先,各语种按重要性应如何排列,各自应占什么比例,每个语种应该设立多少专业点,应培养多少学生,非通用语种应该设立多少,大中小学应如何连贯起来成为一体,在什么情况下外语可以作为教学语言,在社会上外语的使用

以及双语教育”^[12]等,这些本应全局考虑的规划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美国自“9·11事件”以后,倡议设立了国家语言管理权力部门,成立了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外语教育规划的决议和提案,并在美国国会、国防部、国家安全部、教育部、商业界等重要机构的支持和倡导下,发起了美国外语学习年、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等一系列有计划的外语学习运动,其内容之全面、计划之明晰,集中反映了美国外语教育规划对世界局势的战略回应,也凸显了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战略特征^[13]。

2. 外语教育课程标准比较

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其课程性质、课程目的、内容目的、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是管理和评价课程教学的基础文件,中美两国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必然会在其外语教育课程标准中有所体现。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从小学至大学针对各个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2001年7月,我国颁布了由教育部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编制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2002年又颁布了《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义务教育阶段)》,确定了小学至高中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提出了一个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等外语能力的综合发展目标。2000年4月,经教育部高教司审批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出台,明确提出了21世纪外语人才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2007年9月,教育部出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作为各高等学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该《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其听说能力,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美国现行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为《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ACTFL,1999)^[14]。该标准是由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和美国多个语种教师协会联合成立的“全国外语教育目标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语言学理论历时6年完成的。该标准主张外语教学的“一条龙”体制,不仅适用于幼儿园、中小学,而且还适用于大学外语教学。该标准包含基本理念、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抽样进步指标和学习方案五个方面的内容^[15],以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重视培养外语学习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强调外语对思维能力的促进作用^[16],具有课程目标终身化、课程实施人本化、课程

内容综合化、课程评价多元化四个特点^[17]。

与美国的外语教育课程标准相比,我国的外语教育课程标准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一是课程标准不统一。我国的外语课程标准是分阶段由不同部门来制定的,中小学的课程标准与大学的课程标准、外语专业与非外语专业的课程标准之间缺乏衔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供参照,而美国的国家课程标准是“一条龙”地涵盖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外语教育,标准统一,便于操作执行。二是各语种课程标准不均衡。美国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是一个跨语种的课程标准,由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个语种教师协会的专家参与制定,1999年修订时又增加了关于特定语言标准的九个新增部分。而我国的外语教育课程标准是以英语为主要语种来制定的,非英语语种的课程标准编制相对落后,除教育部2003年出台的日语、俄语课程标准外,很多小语种的课程标准并未出台。三是外语与其他学科缺乏融合。外语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整合有利于使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美国的国家课程标准提倡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整合,强调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美国国家课程标准中“教育目标”的第三条即为“贯连其他学科”。而我国外语教育虽然也提倡外语教育应培养复合型人才,却未在课程标准中有所提及,外语课程仍是一门以语言技能教学为主的孤立学科。

3. 外语教育模式比较

受中美两国外语教学政策,课程标准,以及教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是一个宏观概念,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教育模式分为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

教学模式比较。美国的外语教学模式较为多样,主要有传统模式、探索模式、沉浸模式和双向沉浸模式四种^[18]。传统模式主要运用于小学,这种模式将外语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学生在了解对象国文化的同时发展外语技能。探索模式强调学生对某种语言和文化的了解程度,并不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沉浸模式要求学生在校期间部分或全部用外语来学习,可以分为完全沉浸和部分沉浸两种。完全沉浸模式要求学生用外语来学习所有的科目,部分沉浸模式则只要求学生用外语学习部分科目。双向沉浸模式把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和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编在同一个班内(通常各占一半),以两种语言进行教学活动,两种语言各占50%的时间^[18]。

相比而言,我国的外语教学模式较为单一。近年来,国内虽然也开始提倡进行探究型学习、双语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的尝试,但主流教学模式仍是传统模式,外语与数学、语文等其他科目一样,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每周安排2~6个学时集中学习,在进行听、说、读、写技能学习的同时了解外国文化。

教学方法比较。中美两国在教学方法上各有其特点,集中体现在中国的“西方化”和美国的“综合化”。受教育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外语教师过分强调教师对课堂的“驾驭”能力,大都采取“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掀起了外语教学方法改革的热潮,“以教师为中心”逐步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视听法、任务法、认知法、功能法、情景法、交际法、折中法等教学方法被引入国内并走进中国的外语课堂。这无疑为中国外语教学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但是这些理念和方法都是在未经过消化、改造和吸收的背景下,就应用于中国的课堂教学实践的。这种“拿来主义”态度导致外语教学中出现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产生了诸多误区,出现了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西方化倾向^[19]。美国的教学方法改革起步较早。二战时期,美国亟需大量外语人才,而其传统的教学方法短期内又无法满足其军事需要,教学法改革便由此拉开序幕。自1980年代起,“交际教学法”和“全身反应法”被广泛采用。1999年《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的出台,促使美国外语教学法发生了本质转变,它规定了美国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动向,提出了整体的、交流的、发展的语言学习原则,“内容融合型”的综合外语教学法逐渐成为美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主要教学方法^[20]。

三、启示与借鉴

与美国的外语教育相比,我国的外语教育存在政策研究不足、规划高度不够,课程标准缺乏科学体系,教育模式单一、教学方法过度西化等多种弊病。对比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我们可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 加强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制定目标明确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外语教育规划,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21]。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不足、规划高度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策、规划的制定主体不明

确。为此,建议改革现有的外语教育多头分管模式,借鉴美国成立“国家外语中心”的做法,在原有的多个管理部门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统筹管理机构,从而进一步加强外语政策和规划研究,制定目标明确、带有全局性、前瞻性与战略性的国家外语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2. 加大外语课程标准改革力度,出台科学系统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

统一的课程标准有利于统一要求、统一内容,从而有助于统一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制定课程标准可以使学生的英语知识、技能、态度、能力等发展方面的要求具体化。主管部门应统筹规划,加大外语课程标准的改革力度,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出台一个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至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一条龙”式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并建立与课程标准相配套的外语能力认证体系,以此指导我国的外语教育,使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解决我国现行外语教学课程标准不统一、不均衡所带来的教学、评估等方面的混乱。

3. 加速外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外语教育模式

教育模式是外语教育成效的重要保障,教育模式决定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贯彻和课程标准的落实。鉴于目前中国外语教学模式“单一化”和教学方法“西方化”的弊病,建议广大外语教师和研究者在教学方法改革中进行理性反思,更多关注我国现实国情、文化教育传统、语言环境等非语言因素,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学途径,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加速中国外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外语教育模式。

综上,在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外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工具,其现实功用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我国现有的外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外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认清并逐步解决外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至关重要。本文仅从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课程标准和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模式进行了宏观比较和局部分析,更加具体、全面的多国外语教育比较研究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 [1] 李宇明. 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J]. 外国语, 2010 (1): 2.

- [2] 戴维栋. 我国外语专业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外语, 2009(5):10.
- [3] 胡文仲. 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5):163.
- [4] 曾玲琴, 戴立黎. 中美外语教育改革的比较与启示[J]. 教育探索, 2010(9):147.
- [5] 胡壮麟. 中国英语教学中的“低效”问题[J]. 国外外语教学, 2002(4):3.
- [6] 屠雨迅. 我国外语教育应该考虑重新定位[J]. 求是, 2004(6):50.
- [7] 江世强, 庾鲜海, 梁彬. 中外外语教育的比较及其启示[J]. 美中外语, 2007(6):1.
- [8] 刘文宇, 王慧莉. 当代美国外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的演变[J]. 现代教育管理, 2010(7):111.
- [9] 张治国. 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语言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10] 鲁子问. 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J]. 社会主义研究, 2006(3):115.
- [11] 梁中贤. 中美外语教育比较[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1):19.
- [12] 胡文仲. 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245.
- [13] 贾爱武. 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4):13.
- [14] ACTFL.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M]. Kansas: Allen Press Inc., 1999.
- [15] 肖建芳. 美国外语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 中小学外语教学, 2002(5):5.
- [16] 韩宝成, 常海潮. 中外外语能力标准对比研究[J]. 中国外语, 2011(4):39.
- [17] 周芬. 《中国英语课标》与《美国外语学习标准》的比较研究[D]. 成都:西华大学, 2009.
- [18] 李正栓, 索磊. 美国外语教学模式给我们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7):21.
- [19] 张绍杰. 对舶来教学法说“不”——我国当今外语教学现状考察与反思[J]. 中国外语, 2007(3):4.
- [20] 董玲. 美国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剖析[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1(3):44.
- [21] 张绪忠, 王晓辉. 我国语言规划中外国语言因素的缺失及应对策略[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128.